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雄壮的故事

脚写英雄史诗

第六册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难忘的故事

雾满龙冈千嶂暗

1930 年 10 月，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刚一收场，便匆忙调集兵力，进攻苏区和红军。蒋介石命令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组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11 月 2 日，鲁涤平在何键一部的配合下，以 7 个多师的兵力，向锦江南北地区集中。

这时，红一方面军约 4 万人，主力正在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活动。当得悉国民党军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围剿”情况后，前委书记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的方针，红军先向苏区内退却，依靠苏区人民和有利地形，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再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于运动之中。总前委在罗坊会议上通过了这一方针，并决定主力东渡赣江。总前委、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对红军和苏区人民作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实行坚壁清野，部署游击战争等。11 月上旬，红军主力东渡赣江，到达崇仁、宜黄、永丰、新淦之间地区，发动群众，筹措给养，开展战前练兵。

11 月 5 日，国民党军分三路纵队向赣江以西红军原活动地区进攻，结果扑空。鲁涤平害怕红军取樟树、临川，遂以第 3 纵队留在赣江西岸，以第 1、第 2 纵队东渡赣江，寻求红军主力作战。

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红军除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迟滞、疲惫、消耗、迷惑敌人外，主力逐次向苏区中部的东固、龙冈地区转移。11 月 18 日至 20 日，国民党军分别进抵吉安、永丰、乐安、宜黄一线，仍不见红军踪迹，被迫转为“清剿”。

12 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亲自组织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召集党政军高级官员会议，声称赣南为红军主力所在地，“此一股一经扑灭，其余自易解决”。因此，急调在武汉的第十九路军进入江西参战，另调福建的 2 个师又 1 个旅，向闽赣边界推进，堵击红军。这样，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的总兵力达到 11 个师又 2 个旅，共 10 万余人。为了加强指挥，蒋介石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志得意满，指挥各路大军从北、西、东三面向苏区推进。

12 月 16 日，国民党军开始向苏区中心区进攻。在红军小部队和人民武装的袭扰、阻击下，至 21 日其新编第 5、第 18、第 50、第 24、第 8 师分别进到东固、招携、草台岗、三坑等地。为了不失时机转入反攻，红一方面军于 12 月 21 日集中至黄陂、麻田地区隐蔽，并派出第 35 师到兴国东北地区活动，以监视和吸引西面之国民党军。

24 日至 28 日，国民党军 5 个师已先后深入苏区腹地，在红军和人民群众的袭扰和打击下，兵力分散，补给困难，疲劳沮丧。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心集中兵力，首先歼灭最接近红军集中地的第 50 师。红军曾两次在小布附近设伏，但因该师未脱离源头阵地，未达到预期目的，只好撤回原地等待时机。

12 月 28 日，鲁涤平命令深入苏区的部队向宁都以北的黄破、小布、麻田地区的红军发动总攻。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第 1 纵队司令兼第 18 师师长张辉瓒求胜心切，以 1 个旅留守东固，率师部和 2 个旅在友邻的配合下，于 29 日进占龙冈。红军闻讯立即分兵两路秘密向龙冈开进，求歼孤军冒进的国民党军第 18 师主力于运动中或立足未稳之际。

30 日晨，张辉瓒以其第 52 旅为先头，率师部及第 53 旅随后，由龙冈向五门岭前进。9 时许，第 52 旅行至小别以西正在登山，突然遭到居高临下的

红 3 军第 7 师迎头痛击。张辉瓒遂以 2 个旅、4 个团的兵力猛攻，均被红军击退并陷入了红军的包围。16 时，红军发起了总攻。国民党军左冲右突，拼命反击，均不得脱。战至黄昏，第 18 师主力被歼，张辉瓒亦被生擒。

国民党军第 18 师主力被歼后，深入苏区的其他部队惧怕被歼，纷纷撤退。红军乘胜于 1931 年元旦转兵向东，追歼由源头东撤的谭道源第 50 师。1 月 3 日，第 50 师在东韶地区被红军歼灭 1 个多旅，残部狼狈逃往临川。

此役，国民党军损兵折将，丢盔弃械，被歼 1 个多师 1.5 万人，损失武器 1.2 万余件。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并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为了歌颂红军的英勇和胜利，并为第二次反“围剿”作动员，红军领袖毛泽东挥动生花妙笔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一首：“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龙冈战斗距今 60 多个春秋了，这脍炙人口的绝妙好词读之仍令人倍感亲切，激动不已！

粟裕挥师搏敌顽

凡是熟悉毛泽东诗词的同志，肯定会记得毛泽东那大气磅礴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毛泽东这里豪迈地宣告捉了张辉瓒的不是别人，正是粟裕及其所部。

1930 年 6 月中旬，红军在长汀进行了整编，红 4 军、红 6 军、红 12 军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为红一军团），朱德担任总指挥，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粟裕被任命为红 12 军第 5 支队支队长。

粟裕带领部队在峡江转来转去，等待领导层开会决定行动。当时，敌人正在准备对根据地进行“围剿”，中央要红军去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毛泽东、朱德则认为应从实际出发，回到根据地内积极准备反“围剿”。粟裕十分支持毛泽东、朱德的意见。

一天,粟裕接到了 11 月 1 日由毛泽东以总前委书记和政治委员双重身份和朱德总司令署名的命令，命令部队东渡赣江，进入东固地区，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粟裕很是高兴。部队进到东固地区，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反“围剿”的准备。

不久，蒋介石以 8 个师 10 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一次军事“围剿”。

按照毛泽东制定的撒开两手诱敌深入，歼敌于革命根据地内的方针，红军决定收拢部队，东渡赣江，向小布、黄破一带集中。在小布召开的苏区军官歼敌誓师大会上，毛泽东为了使大家好记易懂，亲笔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对其战略指导思想作了高度概括。粟裕看到这副对联极为佩服，认为它精辟地概括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把它看作克敌制胜的法宝，认真琢磨，仔细研究，努力把它运用于自己的指挥作战实践。

临战前，粟裕受命担任由红 22 军缩编而成的 64 师师长，暂归红 12 军指

挥。该师武器装备较差，除去几百支土造的“单打一”，其余都是梭镖，因而被戏称为 12 军的“梭镖大队”。

在毛泽东直接指挥的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中，粟裕的一个得意之作，就是率领本师指战员，活捉了敌军师长张辉瓒。正是由于活捉了张辉瓒这一巨大胜利，激发了毛泽东的诗情，写出了烩炙人口的诗篇。

1930 年 12 月，蒋介石调集 10 万人马以鲁涤平为总指挥，“围剿”中央苏区。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向根据地中部退却。敌人以每日 35 公里的速度，分多路、多梯次向苏区猛扑。毛泽东、朱德在多路敌军中,选择了张辉瓒的第 18 师和谭道源的第 50 师作为歼灭目标。但设伏几次，都落了空。

这时，敌主力张辉瓒部 2 个旅，约 1.4 万人，已被红 12 军第 35 师诱至革命根据地腹地龙冈，并有东进君埠的意向。毛泽东决定于龙冈、君埠间设伏，在敌人前进中消灭它。

这时，粟裕得悉了张辉瓒部即将进入龙冈地区的情报。为了实现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证实情报的准确性，他决定化装亲自去侦察。

主意打定，粟裕立即从师部侦察排中挑选了两名战士，穿上缴获来的敌军制服，迎着张辉瓒部的来路走去。走了半天，便碰上了张辉瓒的部队。

“口令？”树丛里忽然闪出一个站岗的敌军。

“清剿！”粟裕镇定地回答。

站岗的敌兵放下枪，却依然面有疑色地问：

“你们是从哪来的？哪部分的？”

“我们是 50 师的，你们是 18 师张师长的部队吧？”

“你们怎么走得这么慢？落在我们后头有大半天的路程。”

粟裕回答说：“我们是去后头送信的，还以为你们早过了龙冈呢。”

粟裕从容的神态使敌兵彻底打消了怀疑。那士兵胆怯地问道：

“听说龙冈那边有共匪，是不是真的？”

“哪有什么共匪？”粟裕笑道，“我们早上才从那边过来。你们 18 师是不是被共产党吓怕了？”

进村之后，粟裕见一个敌军军官坐在一块石头上抽闷烟，边抽边唉声叹气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就主动靠上去和这个军官聊天。

“我们好像见过？”粟裕道，“我是谭师长派来和你们 18 师联络的。”

敌军官一点不加怀疑，发牢骚道：“大家都是跟着鲁总指挥卖命的，今天见了，明天还不知睁不睁得开眼！”

从敌军官的神情中可以看出，张辉瓒虽然反共气焰嚣张，但部下的士气却并不太高。

聊天中，粟裕探听到张辉瓒已决定要加快速度往前推进，只是走不走龙冈，还没最后确定。

侦察回来后，粟裕立即把探听来的情况当面向毛泽东和朱德作了详细的汇报，并建议针对张辉瓒骄狂自大、求胜心切的特点，派出一支小部队作为诱饵，把张辉瓒引向龙冈，红军在龙冈设伏，歼灭张辉瓒的第 18 师。

毛泽东和朱德十分欣赏这一建议，当即派出一个营的部队去作诱饵，与张辉瓒部接触后，立即向龙冈方向撤退，把敌军引进龙冈。

粟裕根据毛泽东的意图，率 64 师，随红 12 军担任左路包抄任务。

12 月 29 日夜间，伸手不见五指，天空只有几颗稀疏的星星眨着眼，老

天帮忙，粟裕率左路部队乘着夜暗人不知、鬼不觉地提前出发，秘密西开，于拂晓前 4 时，经袁湖，插向龙冈西南，隐蔽在龙冈南端，水西西端的盲公山。

天边刚刚露出一线曙色。遥望远方，但见雾锁群峰，霜染枫叶，一条狭长的山谷在众山环抱中若隐若现，位于其间的龙冈小镇被树丛包围，加上雾重，尚不甚分明。它的南面是一片大山密林，无路可通；东面是黄竹岭。毛泽东、朱德的指挥部就设在黄竹岭后的小别山上。粟裕不禁为毛泽东率总部选择了这样好的一个伏击战场而暗暗高兴。他紧紧盯住龙冈向西通往南垄的大道，那就是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

龙冈四面环山，群峦叠嶂，山深林密，雾气弥漫，是个打埋伏的好地方。12 月 29 日，张辉瓒果然被引入龙冈，进入红军的包围圈。30 日上午，天空飘起蒙蒙细雨，10 时，毛泽东向埋伏在龙冈四周的红军下达了战斗命令。刹那间，藏龙隐豹的龙冈群山中枪炮声大作，莽莽古林顿时变作杀敌的战场。

下午 2 时左右，战斗基本结束，敌 18 师的 1.4 万余人全部被歼。毛泽东派了两名骑兵通讯员去问主攻师师长粟裕，张辉瓒捉到了没有。

粟裕信心十足地对通讯员说：“ 张辉瓒就藏在那边山里，我们师正在全力搜索。你们先回去一个向毛泽东同志报告，说张辉瓒马上可以抓到，留下一个人等抓到后立即回去报告。 ”

在场的同志见他这样干脆利索地把毛泽东派来的通讯员一分为二，都对他的干练十分佩服。

不多久，龙冈满山遍野都响起了红军战士兴高兴烈的喊声：

“ 张辉瓒捉住了！张辉瓒捉住了！ ”

毛泽东高兴万分，连声夸道：“ 好，粟裕捉了张辉瓒，还是粟裕有办法！ ”

毛泽东在夸赞粟裕的同时，脑子里已经轻轻哼成了《反第一次大“ 围剿 ”》这首词。

鄂豫皖苏区反“ 围剿 ”

1930 年 10 月，蒋介石连取得对冯玉祥、阎锡山战争的基本胜利后，即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兵力，组织对各苏区的大规模“ 围剿 ”。

11 月上旬，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奉蒋介石之命，调集 7 个师又 4 个旅，近 10 万人的兵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 围剿 ”，豫鄂皖边区“ 绥靖 ”督办李鸣钟担任总指挥。“ 围剿 ”计分三步实施：第一步完成“ 圆箍式 ”的包围；第二步攻占苏区内的交通要道及城镇；第三步实行分区“ 清剿 ”。参加“ 围剿 ”的各部随即开始向鄂豫皖苏区周围集结。

此时，红 1 军对国民党军的“ 围剿 ”企图尚不知晓，正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率第 1、第 2 师由豫南罗山潘新店南下，执行中央赋予的“ 威逼武汉 ”的任务，并准备向长江沿岸发展，打通与活动在鄂东南的红军第 15 军的联系。11 月中旬，红 1 军主力进攻姚家集、黄安未克，转向麻城方向寻找战机。下旬，奔袭谢店、新洲，先后歼国民党军 1 个营和 1 个旅部、2 个团，尔后转到罗田以西的但店地区进行休整。12 月初，北上商（城）南与红 3 师会合，以打击侵入皖西的国民党军。

12 月上旬，首次“ 围剿 ”正式开始。敌 10 万大军分三路向苏区包围压缩。而苏区内仅有地方部队 6 个教导队和 6 个县的特务队，共 300 余支枪，

另有半脱产的补充军约 2 万人。在“围剿”突然开始的紧急情况下，党中央特派员曾中生当即在黄安以北七里坪召开紧急会议，建立以曾中生为书记兼军委主席的中共鄂豫皖特别区临时委员会和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以统一领导反“围剿”斗争，并决定在罗山、孝感、黄陂地区，黄安、麻城地区，以及光山地区，分别建立第 1、第 2、第 3 路指挥部，指挥地方部队、补充军和广大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人；同时，尽快与红 1 军取得联系，以便集中主力突攻敌人的弱点，以转变战局，创造新的局面。这时，原在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活动的红军第 15 军，经皖西、豫南转到了黄麻地区，并即参加了反“围剿”作战。12 月 16 日，红军第 15 军一举突入河口镇，歼国民党军第 44 师一部后主动撤出。接着，在七里坪阻击从光山、罗山南下的国民党军第 30、第 31 师，激战两昼夜，予敌杀伤后，向商（城）南转移，准备会合红 1 军，在外线作战。转移途中袭占麻城以北的福田河，歼灭当地反动武装数百人，缴获弹药、物资一部。各路指挥部亦率领地方武装，利用苏区有利地形，时隐时现，割电线，摸岗哨，截辎重，打击小股分散的敌军和反动民团，积极开展袭扰活动，迫使国民党军不敢轻易冒进和分散“清剿”。

这期间，红 1 军军长许继慎、政治委员曹大骏正率领该军在皖西发起攻势作战。12 月 14 日攻克金家寨，歼国民党军 1 个营及民团千余人；16 日攻占麻埠、独山和叶家集；18 日在苏家埠韩摆渡等地歼敌 2 个营，并一度包围六安，威逼霍山。21 日，红 1 军主力集结于麻埠地区待机。红 1 军的这些军事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军的警觉和“关顾”。陈调元忙令第 46 师和警备 2 旅全力防守，伺机反扑。李鸣钟也命令 2 个旅从商城进占金家寨、叶家集，企图从东西两面夹击红 1 军。29 日，第 46 师等部共 6 个团分 3 路从六安、霍山向麻埠地区进攻：中路 2 个团从苏家埠经独山前进；右路 1 个团由韩摆渡经石婆庙前进；左路 3 个团自诸佛庵前进。面对气势汹汹的三路来兵，红 1 军沉着应战，决定乘其兵力分散之际，在运动中予以各个击破。30 日，红 1 军以 1 个师的兵力在东香火岭、同兴寺分别歼灭了中路的 2 个团。同时右路的 1 个团则在石婆店被红 1 军全歼。正当红 1 军以主力在运动中歼灭中、右两路国民党军时，其左路的 3 个团乘隙进至麻埠外围，其中一部已突入镇内，驻守该镇的军直属部队当即将其击退，双方形成对峙。在外围作战的其中 1 个团闻风即刻回麻埠配合军直属部实施反击，将其击溃。此时，进占叶家集、金家寨的李鸣钟部 2 个旅见势不利，便分别向固始、商城撤退。接着红 1 军主力向豫南进击，途中截击李部 1 个旅，歼其 1 个团。而苏区的军民面对强敌入侵，团结一心，实行坚壁清野，并开展游击战与之周旋，使入侵之敌陷于困境，当其获悉红军主力西返时，被迫向城镇据点收缩。至此，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被打破。红军共歼国民党军 4 个团又 4 个营，击溃 4 个团又 1 个营，毙俘伤 5000 余人，缴枪近 3000 支。

1931 年 3 月中旬，何成浚、李鸣钟又调集 8 个师另 2 个旅共 10 万人的兵力，采用追堵兼施的战术，对苏区实施第二次“围剿”，计划于 2 个月内“肃清”苏区内的所有红军。具体部署是：以第 30 师（欠 1 混成旅）、和 31 师（欠 1 混成旅）和第 33 师组成“追剿”部队，分由河南省的光山、龙升镇和湖北省的黄安、宋埠出发，以七里坪为目标，专寻红军主力作战；另以第 53 师于河南省的罗山以东竹竿铺、寨河集地区，第 31 师混成旅于河南省潢川，第 30 师混成旅于河南省商城，新编第 25 师于河南省固始、方集、叶家集地区，第 46 师（附暂编第 2 旅）于安徽省的六安、霍山地区，第 13

师于湖北省的麻城、黄陂、罗田地区，第 44 师于湖北省的小河溪、花园、孝感地区，第 6 师第 16 旅于平汉铁路信阳至武胜关段，分别组成各线“堵剿”部队，配合“追剿”部队作战，并在所在地区进行“清剿”。

首次反“围剿”结束后，红军进行了补充、整编，红 1 军与红 15 军合编为红军第 4 军，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余笃三，整个苏区的主力红军已发展到 1.5 万余人。红 4 军的 3 个师集结于商城县，准备南下恢复湖北省的蕲春、黄梅、广济苏区。但计划未及实施，国民党军便开始了第二次“围剿”。4 月上旬，“堵剿”部队共 7 个团，向苏区进犯。其中有 5 个团进占麻埠，准备进攻金家寨；另外 2 个团分别驻扎于霍山、独山。中共特委、军委在敌情骤变的情况下，果断地放弃了南下作战的计划，决定以军委警卫师和红 1 师的 1 个团，配合地方武装在新集、七里坪地区监视、牵制“追剿”部队；集中主力红军首先打击进入皖西麻埠、独山的国民党军。25 日，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红 4 军以第 12 师进占东、西香火岭牵制麻埠的“堵剿”军，集中第 10、第 11 师各 2 个团进攻独山镇。进攻开始后，红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很快攻占了马家大尖、黄伯档等外围阵地，并歼守军一部。接着，红军又利用独山镇分兵外援、镇内空虚之机，向独山镇发起进攻。激战 4 小时，全歼守军 1 个团，毙伤俘 2000 余人，缴枪 1200 余支。此役使麻埠守军也成惊弓之鸟惟恐被歼，退回霍山。

在红军主力东进皖省与“堵剿”军作战之际，国民党军“追剿”部队大兵压境，占领了新集、七里坪等地，留在该区的红军警卫师等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不断袭拢、打击，迫使“追剿”军撤回罗山、光山地区。国民党军随即调整部署，将“追剿”军主力向潢川、商城之间地区集结，企图协同其皖西部队合击红军主力于金家寨、麻埠地区；并以 2 个师的兵力在泼皮河、新集、中途店、福田河至滕家堡一线堵截红军。就在国民党军改变部署，将“围剿”重点转向皖西之时，主力红军则迅速西进，并在新集以北的浒湾地区，重创“堵剿”军 1 个旅，歼其近千人，余部溃逃。5 月下旬，红军又转兵南下，攻占黄安城南桃花镇，歼守军 1 个营，并设伏歼灭驰援的国民党军 1 个多团。与此同时，苏区地方武装向光山南部反动民团进击，先后攻下团山、扶山、雾山、邱家店、阳家土店、龚家寨等围寨。国民党军在苏区内四处扑空，处处挨打，被迫于 5 月底收缩兵力，转为守势。至此，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被打破，鄂豫皖苏区得到巩固和扩大，红军亦发展到近 2 万人，战斗力显著提高。

1931 年 9 月，国民党军又准备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到 11 月底，集结在苏区周围的部队已达到 15 个师，其中豫东南地区 4 个师，鄂东地区 7 个师，皖西地区 4 个师，此外，在河南的第 4 师和南京的警备师准备调往武汉，第二十路军准备集结信阳，随时参加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但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浪潮空前高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加剧。因此，这次“围剿”的行动迟迟未能开始，各部队仍处于分散防守的状态。针对此种情况，鄂豫皖军委决定乘国民党军的新“围剿”尚未准备就绪之际，主动发起攻势，以破坏其“围剿”计划。据此，红四方面军依据苏区，集中兵力，运用“围点打援”，调动国民党军于运动中加以各个击破的作战原则，从 1931 年 11 月到 1932 年 6 月，红军连续取得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 4 次战役的胜利，共歼国民党军近 40 个团 6 万余人，给其以沉重打击。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计划遂告破产。

红军和苏区得到了很大发展，主力红军已达 4.5 万余人，地方武装也有很大发展；苏区发展到拥有 6 座县城，26 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共 350 万人口的地区，创造了鄂豫皖红军和苏区的极盛时期。

1932 年 6 月，蒋介石亲任豫鄂皖 3 省“剿匪”总司令，以 40 余万人的兵力组成左、中、右 3 路军，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其中，中、右两路军共 30 万人“围剿”鄂豫皖苏区。中路军司令部设于河南省信阳（后移至湖北省广水），蒋介石兼任司令官；右路军司令部设在安徽省六安，司令官由豫鄂皖 3 省“剿匪”副总司令李济深兼任。中、右两路“围剿”军采用“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战法，企图将红四方面军逐出鄂豫边境，而后由北而南将红军压迫于长江沿岸加以歼灭。

此时，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却陶醉于黄安、苏家埠等 4 次战役的胜利，低估了国民党军的实力，无视客观情况的变化，热衷于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拒绝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提出的暂时停止进攻，将红军主力集结于适当地区休整待机，预作反“围剿”准备的正确建议，坚持不停顿进攻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强令红军先进逼罗山，破坏平汉路，消灭罗山、信阳、广水一线的国民党军，继而沿平汉路南下，消灭宋埠、黄破一线的国民党军，威逼武汉。接着，又命令红军南下夺取麻城，继续实现其威逼武汉的冒险计划。红军主力两攻麻城未果，耗时近月，极大地疲劳、消耗了部队，致使反“围剿”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

8 月 7 日，国民党军开始大举进攻。10 日，其主力中路军第 2 纵队 3 个师由湖北省宣化店向黄陂站、七里坪急进；第 6 纵队有 2 个师从茅店、夏店直扑河口镇，另 1 个师从长轩岭直通高桥河。眼见黄安危急，张国焘遂被迫决定撤围麻城，令红军主力仓促驰援黄安，企图在黄安以西击溃国民党军，一举粉碎“围剿”。11 日，红军主力先在冯寿二、冯秀驿地区迎击第 6 纵队，激战 3 日，双方形成对峙。其时，第 2 纵队 3 个师已迫近七里坪，威胁红军主力的侧翼安全。红四方面军总部鉴于再战不利，即率主力转向七里坪倒水河以东阻击第 2 纵队的进攻。15 日，红军主力经勇猛反击，歼其担任主攻的 4 个团大部，迫使第 2 纵队主力在七里坪西北据险防守，双方形成相持状态。这两次战役，红军虽毙伤国民党军 5000 余人，但自身伤亡也极为惨重，且未能扭转整个战局。17 日，第 6 纵队 2 个师由黄安北出，企图夹击红军，红军主力随即撤出战斗，转移到檀树岗地区，以另寻战机。

22 日，敌第 2 纵队得到 1 个师的加强后，撤离七里坪北上，行进途中避开檀树岗一带险要地势，绕道黄陂站向宣化店集结，拟经陡山河向第 1 纵队靠拢，尔后两个纵队会攻苏区的政治中心——新集。张国焘却错误地认为国民党军此举是溃退，而非调整部署的主动撤离，并命令红军主力北上攻击第 1 纵队。27 日，红军主力刚到新集以北，第 2 纵队 4 个师即从西面扑来，红军立即在胡山寨地区进行阻击，激战 5 天，毙伤第 2 队纵 2000 余人，迫其转为防守。9 月 6 日第 1、第 6 纵队分别从北面和南面向红军逼近，并同第 2 纵队一起，形成对红军三面包围之势。在此情况下，红军鉴于敌众我寡，相峙不利，决定撤离豫东南，向皖西北转移。第 2、第 6 纵队随即实施平行追击，第 1 纵队和右路军各纵队则分头堵击。新集、商城、金家寨、独山、麻埠、罗田、英山相继失陷。9 月底，红军主力南下，拟攻英山，因未获战机，遂分两路向黄安、麻城地区转移。

10 月 8 日，红军主力抵达黄安城以西河口地区，不幸与“进剿”军 6 个团的部队遭遇，激战数小时，毙伤其 2000 余人。次日，国民党军又投入 1 个师的兵力，向河口东北的红军阵地侵犯，红军连续打退其七八次冲击，毙伤其近千人。战斗中，红军伤亡重大，红 25 军军长蔡申熙、第 11 师政治委员甘济时壮烈牺牲。此时，第 2、第 3 纵队等部又从东、南、北三面逼近。面对此情，张国焘已完全丧失了粉碎国民党军“围剿”的信心。10 日，张国焘在黄柴畈召开分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针，决定第 17、第 75 师及各独立团在苏区坚持斗争，方面军主力转移外线作战，伺机打回苏区。12 日，方面军总部率 2 万余人从广水、卫家店间越过平汉铁路，开始了脱离苏区的战略转移。

这次反“围剿”作战，苏区军民英勇奋战了两个月，终因张国焘战略指挥上的错误而失败。

湘鄂西苏区反“围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在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的同时，对湖南、湖北两省边界的洪湖苏区也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围剿”。

1930 年 10 月，洪湖苏区的发展已达到相当规模，共拥有监利、沔阳、潜江、公安、石首、华容、南县等 7 座县城及沿长江两岸大片乡村，纵横达数百公里。11 月，国民党军第 10 军军长、湘鄂川边区“清乡”督办徐源泉指挥 6 个师又 7 个旅的兵力，采取分区围攻、步步为营的战法，对湘鄂西苏区进行“围剿”，并把重点置于洪湖苏区。由于时值红二军团远离苏区进行南征作战，苏区兵力不济，南县、华容、监利、潜江、沔阳等县城相继失守。

为了打破国民党军之“围剿”，中共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兼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主席周逸群，决定集中各县枪支，组成赤色警卫大队，设立江左、江右两个指挥部，分别指挥江左军、江右军，并组织苏区群众配合作战，同时将红军团的少量部队及部分伤病员组成独立团，充当反“围剿”的骨干力量。

1931 年 1 月 1 日，徐源泉部向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以第 48 师等部共 5 个旅又 1 个团的兵力，分别自潜江、岳口、仙桃、新堤、监利等地出动，企图将江左军歼灭于柳家集、瞿家湾地区。在赤色教导军的有力配合下，江左军利用苏区的复杂地形，采用夜袭、伏击、围困等战术，广泛开展游击战，积极打击进犯之国民党军。沔阳赤卫大队等部 3000 余人阻击从仙桃出动的国民党军 1 个多旅的部队，并以 4000 余人实施反击，给其以重大杀伤；大同湖地区群众武装 5000 余人，向占领大丰口的国民党军 1 特务团实施反击，一度夺回大丰口；监利赤卫大队、赤色教导队在福田等地区阻击国民党军 1 个旅的进攻达 10 日之久，随后又集中 2000 余人偷袭湖北警备旅，予其以重大杀伤。东荆河两岸的潜江武装群众也有力地打击了进犯之敌。随后，江左军除留少数兵力在苏区内坚持斗争外，大部兵力分别转到苏区外的沙湖以东地区、汉川的刁汊湖地区、江陵县境内的白露湖一带继续打击敌人。与此同时，为了积极配合江左军的作战行动，红军独立团及江右军先后在华容地区歼灭国民党军 1 个营又 2 个连，并收复了华容城。在苏区军民的有力反击之下，国民党军虽占领了监利、沔阳、潜江地区，但未能实现其全歼江左军的“围剿”企图。

1931 年 3 月 1 日，“ 清乡 ”督办徐源泉又以 4 个师的兵力向苏区发动了第二次“ 围剿 ”。徐部第 48 师第 142 旅及第 143 旅一部分自公安、郝穴向藕池、石首进攻；新编第 11 师主力自安乡向高基庙进攻，一部自南县向华容进攻。在藕池、石首等地相继失守的情况下，中共湘鄂西特委决定江南江北所有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力争保住江南苏区，恢复江北苏区，并准备开辟洞庭特区，作为坚持江南斗争的新的依托。具体部署是，独立团和特委机关先后北渡长江，打击侵占监利、沔阳、潜江地区的国民党军，江右军一部进至洞庭湖西岸地区，建立洞庭特区，一部掩护群众撤到华容以东的东山地区。当月下旬，徐部进占焦山河、调弦口等集镇。4 月初，徐部从其第 48 师第 142 旅、第 19 师、新 11 师和第 15 师第 44 旅等部，分别从调弦口、华容、岳阳等地向东山地区合围。江右军一部及华容游击队在三葑市、松板桥等地进行了顽强阻击，但未能阻止住国民党军的进攻，激战 10 余日，除少数游击队留下坚持斗争外，一部分骨干和地方干部转移到江北，东山地区失陷。

在此期间，北渡的红军独立团在江左军的密切配合下，积极作战，4 次攻占朱河，歼灭国民党军 1 个团的大部，并两次攻占峰口，歼守军 1 个营，击溃国民党军新 3 旅 1 个团。至此，江北苏区已恢复大部。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特委对全区武装进行了适时的调整改编：独立团扩编为红军第 3 军第 9 师（辖第 26 团）、组成湘鄂西警卫团、并组建教导团、沔汉独立团、江左各县组编警卫营。整编后，部队经短期休整，即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4 月中、下旬，先后在老新口歼灭徐部 2 个营，击溃其 2 个团，缴枪 500 余支，收复了龙湾、熊口、汊河口、大丰口等地。5 月初，由于蒋介石与两广军阀间矛盾日趋尖锐，徐部相继调往长沙。红 9 师乘机展开攻势，于 6 月初接连在三官殿、沙岗、普济观、郝穴、汪家桥等地歼灭国民党军 2000 余人，缴枪 1000 余支。5 月间，湘鄂西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周逸群，在岳阳县贾家凉亭附近遭国民党军伏击，不幸牺牲。这次反“ 围剿 ”作战，苏区江北地区除监利、沔阳、潜江等县城外，已全部恢复 ；江南地区收复了东山地区，并开辟了洞庭特区，迫使国民党军收缩于石首、华容等城镇。

1931 年 9 月初，“ 清乡 ”督办徐源泉利用洪湖苏区遭受严重水灾之机，又调集其第 19 师、新 11 师、新 7 旅，在地主武装的配合下，向苏区发动了第三次“ 围剿 ”。此次“ 围剿 ”的重点是洪湖苏区的华容县东山地区。而其时红军主力的分布是：红 3 军第 7、第 8 师在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苏区；红 9 师主力正在向襄河以北出击，以执行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决定，开辟潜江、京山、天门地区；红 9 师第 25 团在洪湖苏区江北坚持斗争，江南仅有游击队 300 余人。在这不利态势下，湘鄂西临时省委虽积极领导江南游击队和人民群众进行顽强抗击，但终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而被迫突围转移到江北地区。国民党军进占东山地区后，对苏区进行了血腥镇压，残酷迫害苏区干部、群众，苏区顿时血流成河，哀鸿遍野。10 月上旬，红军第 25 团同原江南游击队一道渡江，以反击东山之守军和恢复江南苏区。21 日拂晓，红军和游击队袭占九佛岗，接着又乘势击溃石堰、毛家巷之守军，并跟踪追击到华容城东的状元街，毙俘国民党军 200 余人，缴枪 100 余支。23 日，又在烟墩、大王厂、三郎堰等地，向第 19 师及新编第 11 师一部展开进攻，激战两日后，突然撤出战斗返回江北。不久，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又在江南地区组成游击大队，经过极其艰苦的斗争，到年底，江南苏区逐步得到恢复。

1932 年 3 月，党中央派夏曦到洪湖苏区，成立了以夏曦为书记的中共湘

鄂西中央分局，从此，王明“左”倾路线在湘鄂西苏区开始逐步贯彻。分局不顾红军在连续作战后急需休整和国民党军已组织新的“围剿”的实际情况，要求红军乘胜展开进攻，并强调转变到大规模平地战、城市战，为夺取中心城市而斗争。命令红军打了几次得不偿失的消耗战，使红军蒙受了一定的损失。接着，分局又在苏区的党和红军中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肃反。肃反的扩大化，使大批优秀干部被捕被杀，从而严重地削弱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

6 月，蒋介石在武汉成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并兼任总司令，调集大约 50 万兵力，组成左中右三路大军，对鄂豫皖、湘鄂西两苏区发动了第 4 次大规模“围剿”。其中左路军 10 万余人，何成浚、徐源泉任正、副司令官，徐还兼任该路军总指挥，他们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方针，对湘鄂西苏区进行分区分期的“围剿”。7 月 6 日，左路军开始实施其“第一期进剿计划”：以第 13 师 6 个团、第 44 师 6 个团、第 48 师 5 个团、第 41 师 1 个团和独立第 37 旅 3 个团分别编为 4 个纵队，另以 6 个团为总预备队，向襄河以北地区进攻；以川军第 21 军 10 个团编为 2 个纵队，向襄河以南地区进攻；以第 51、第 41、第 34、第 33、第 82 师和新 3 旅、独立 38 旅各一部以及第 21 军的其余部队，担任牵制任务。首期“进剿”旨在围歼襄河以北苏区的红军。15 日，“进剿”正式开始，左路军第 4 纵队由岳口向张截港、泗港等渡口推进，企图控制渡口，阻止红 3 军南渡襄河；集中第 1、第 2、第 3 纵队分别由景家墩、皂市、白马庙向京山地区合击红 3 军。为了避免与国民党军正面作战，红 3 军首长贺龙、关向应率部由京山地区向西转移。国民党军旋即集中兵力穷追不舍。红 3 军为摆脱追兵又掉头东进，以一部兵力撤至襄河南岸，主力再次进至京山、应城、皂市、天门之间一带活动。26 日，红 3 军被迫撤至荆门东南地区，后又转到潜江县熊口一带，整个襄北地区失陷。

8 月中旬，左路军推出了“第二期进剿计划”，对兵力部署也作了新的调整：第 3、第 4 纵队为左翼军，由岳口进攻洪湖苏区中心；第 1、第 2 纵队留襄北地区担任“清乡”；川军的 2 个纵队为右翼军，在东荆河西岸担任堵截任务；海军一部封锁长江，以防红 3 军南渡。此举目的旨在摧毁洪湖苏区中心区。面对国民党军的如此部署，夏曦又由冒险主义转为消极防御，命令红军在苏区内构筑碉堡，以期固守阵地，保住苏区，并令红 3 军第 7、第 8 师向沙市、草市进攻，以牵制国民党军。8 月 13 日，红 8 师进攻，袭入草市，歼守军 500 余人；而红 7 师对沙市的进攻却告失利，被迫撤到龙湾、熊口地区。

随着白庙以西东荆河以北地区的相继失守，湘鄂西苏区机关所在地瞿家湾的形势也愈益严峻。但夏曦却一意孤行，断然拒绝贺龙、关向应等提出的集中主力到外线机动作战、在运动中歼灭国民党军的正确意见，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夏曦指挥红 7 师、警卫师和地方武装，在苏区构筑碉堡，分兵把守，固守东荆河南岸地区；一路由贺龙、关向应指挥红 3 军主力，深入敌后，先打击国民党军右翼军，尔后打击襄北国民党军。24 日，红 7 师在东荆河南岸仓促反击受挫，数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左翼部队攻占了峰口、府场两个要点。接着，该部又向新沟嘴、杨林关实施围攻，尽管红 7 师依托阵地，奋勇抗击，但伤亡惨重，被迫撤出战斗。不久，左翼军又攻占柳关、瞿家湾、小沙口等地，至此，洪湖沿岸地区全部陷落。夏曦遂率湘鄂西中央分局、红 7 师、警卫师以及独立师一部先后向江陵地区转移。

与此同时，贺龙率领的红 3 军主力，从浩子口转到川军侧后的荆门地区，并同尾追的 8 个团周旋 10 余日，未能找到歼敌机会，于 9 月中旬进至京山地区。面对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红 3 军主力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积极机动的战术，多次打击追兵，保存了基干力量。10 月，红军两路部队会合后，转至鄂北大洪山地区，洪湖苏区完全丧失。在国民党“进剿”军的优势兵力进攻下，湘鄂边、巴兴归、襄枣宜等苏区也同时丧失。由于敌众我寡和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红军终究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

为营步步嗟何及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遭到失败，前线总指挥张辉瓒被俘后在东固被苏区人民公审与镇压，鲁涤平向蒋介石辞去南昌行营主任等职，不敢再同红军较量。可是，蒋介石自恃兵多将广，更加丧心病狂，于 1931 年 2 月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南昌行营主任，组织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实行主力分路推进，互相策应的战法，妄图消灭红一方面军，摧毁中央苏区。

3 月下旬，蔡廷锴第十九路军，王金钰第五路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连同第一次“围剿”失败后继续留在中央苏区周围的部队，总兵力达 20 万人，分别在兴国、万安、泰和、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城、黎川、南丰、康都、建宁等地集结部署就绪。

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按照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方针，领导红军和苏区人民，进行了反“围剿”的准备。将苏区划分为 10 个游击区，规定各游击区以独立团、警卫营等地方武装领导赤卫军、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执行扰敌、堵敌、袭敌、诱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任务。红军除以一部兵力在苏区北部边缘，配合地方部队监视国民党军外，主力移至广昌、宁都、石城地区，进行反“围剿”的临战训练。苏区各级政府动员、组织人民群众坚壁清野，积极准备支援红军作战。

4 月 1 日，国民党军兵分四路大举进攻。各路国民党军在红军一部和地方武装的阻击、袭扰下，进展迟缓，至 23 日才进至江背洞、富田、严坊、招携、横石、广昌等地。

红军决定先打弱敌第五路军，然后向东横扫，在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等地扩大苏区，征集资材，以便于打破敌人下一次“围剿”。据此，红军主力 3 万余人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于 4 月 23 日向退却终点龙冈、东固地区隐蔽集结，进行战前练兵，准备求歼敌人一部。与此同时，向苏区逐步推进的国民党军，不断受到红军和赤卫队、少先队的袭击，被搞得疲劳不堪。

5 月 15 日前后，国民党军第五路军进至富田东南地区，向东固前进，第十九路军一部向城冈前进，第二十六路军进至东韶等地，第六路军在广昌、建宁、石城地区“清剿”。

这时，红军主力已在东固地区秣马厉兵、以逸待劳 20 余日，终于找到了战机，第一仗准备歼击由富田向东固前进的国民党军第五路军右翼部队。

16 日，第五路军右翼第 28 师和第 47 师 1 个旅正在运动中，突然遭到红军主力东西两面夹击，经一昼夜激战，大部被歼于富田、东固之间地区，残部逃向水南。逃向水南的国民党军，因原在潇龙河架设的便桥被赤卫队拆除，

便转向白沙逃窜，于 19 日在白沙被红军歼灭一部，余部逃向永丰。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第 54 师亦撤往永丰；第十九路军撤回兴国，随后又撤到赣州。

两仗获胜，红军士气更加旺盛，便以锐不可当之势，向东卷击。5 月 21 日，红军在中村附近同第二十六路军第 27 师第 81 旅接火，并于次日向该旅发起攻击，一举夺占中村，歼其大部，第 27 旅余部窜回乐安。当晚，红军东进至南团。国民党军第 28 师不敢迎战，慌忙由东韶等地逃往宜黄。

此后，红军日夜兼程，向东疾进。这时，国民党军第六路军不敢在原地停留，匆匆向广昌城收缩兵力，接着纷纷向南丰撤退。其第 5 师刚进至广昌城未及撤离，红军已直逼城下，经 27 日终日激战，广昌失守，被歼一部，余部仓皇逃向南丰。红军占领广昌，吓得归第六路军指挥的第 56 师，急忙自闽赣边界龟缩进建宁城坚守自保。5 月 31 日，建宁城为红军一举攻克，歼国民党守军 3 个多团。至此，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此役，红军在半个月内连打 5 仗，横扫 700 里，歼敌 3 万余人，缴枪 2 万余支，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毛泽东豪情满怀，以如椽之笔写下了气吞山河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的壮丽词篇：“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钧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长驱直进奈我何

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二次“围剿”被粉碎，又紧锣密鼓地于 1931 年 6 月组织第三次“围剿”。蒋介石赤膊上阵，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纠集 23 个师又 3 个旅共 30 万人，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先分进合击红军主力，再严密进行“清剿”。

其部署是：以何应钦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一、第二路进击军第 3、第 4 军团共 7 个师，从南城方向进攻，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以陈铭枢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一、第二军团和第三路进击军共 7 个师，从吉安、永丰、乐安方向深入苏区，实行“进剿”与“清剿”；以第 10 师为总预备队，位于临川。另以 9 个师又 1 个旅，担任“清剿”和防堵。并组建空军临时指挥部，指挥 5 个航空兵队，配合陆军作战。从 7 月 1 日起，各路“围剿”军开始行动。

这时，红一方面军约有 3 万人，正展开于闽西、闽西北和赣南等地，发动群众，开辟苏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于敌人新的“围剿”虽有预见，但未料到来得那么快。当判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开始后，决定继续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待敌人深入根据地中心区，再集中兵力反击。

红军遂以 3 个师在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以南地区，1 个师在南丰以南和东南地区，迟滞敌人，主力迅速向苏区中心回师，适机转入反攻。7 月 10 日前后，红军主力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从闽西北出发，绕道壬田，于 22 日前到达于都以北地区，同红 3 军、红 35 军和红 7 军会师。继而转至兴国西北地区。

国民党军进入苏区 20 余日，犹如“瞎子”、“聋子”，情况不明，乱闯乱撞，一直找不到红军主力，到 7 月底才发觉红军主力在兴国地区，并判断

红军可能西渡赣江，遂以主力分路向西南急进，企图迫红军背水作战，一举而消灭之。

7 月 31 日，红军得悉国民党军正向兴国方向行动，其右侧后富田、陂头、新安等地兵力薄弱，便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以主力隐蔽北移，突破富田一点，向东横扫，置深入赣南苏区之敌于无用武之地，待其回头北向时，再择其易打者歼灭之。当晚，红军开始向富田前进，当发现第二路进击军 2 个师已到达富田，即改变原定计划，并于 8 月 4 日返回高兴圩地区，另寻战机。

此时，各路国民党军纷纷逼近，其第 1 军团、第一路进击军、第 4 军团、第二路进击军，战斗力较强，而正向良村、莲塘前进的上官云相第三路进击军战斗力较弱。

红军以红 35 军、红 12 军第 35 师和 2 个独立师，协同地方武装将第一、第二路进击军和第 4 军团引向万安、良口；将第 1 军团牵制在崇贤、东固之间地区；集中主力采取中间突破的手段，求歼第三路进击军，再进击龙冈、黄陂，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各个歼灭。

5 日，红军主力从兴国、崇贤两地国民党军之间 20 公里的空隙中秘密东进，6 日午前到达莲塘附近。当日晚，红军同向良村、莲塘前进的第三路进击军接近。7 日拂晓发起攻击，战至 9 时，全歼国民党军第 47 师 1 个旅又 1 个营。接着，又向良村进击，途中又歼敌 57 师 1 个团，该敌余部逃往良村。红军跟踪追击，攻入良村，歼敌第 54 师主力。

良村战斗后，红军以红 3 军佯攻龙冈，主力东进黄陂，围歼国民党第 8 师。8 月 11 日中午发起攻击，迅速突入村内，歼守军 2 个团。接着乘胜追击，又歼其 2 个团。红军连战皆捷，已从被动中脱出。尔后，红军转入山区休整。

直到这时，蒋介石才知红军主力已由兴国西北地区东进，判断红军可能北出临川。于是，命令第一、第二路进击军和第 1 军团挥师向东，企图围歼红军于宁都以北地区。8 月 15 日，国民党军采取密集大包围态势，蜂拥扑向红军集中地君埠以东地区。毛泽东、朱德从容不迫，以红 12 军主力伪装红军主力，向乐安方向佯动，将国民党军主力引向东北方；红军主力 2 万余人于当晚秘密西返兴国地区。红 12 军利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将国民党军主力一部拖了近半个月，掩护了红军主力的西移行动和休整。8 月底，蒋介石发觉上了毛泽东、朱德的当，令主力西进。红军主力继续西移，转至兴国、万安、泰和之间地区，继续休整，以逸待劳。

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穿梭般地奔波，两个月始终找不到红军主力以决胜负，反而损失了 3 个师的兵力，斗志愈加涣散，士气更为低落。蒋介石痛心疾首，不得不下令结束“围剿”，实行总退却。而红一方面军主力经过半个月休整，袜马厉兵，广大指战员磨拳擦掌，决心追歼敌人。

9 月 7 日，当国民党军蒋鼎文第 4 军团，由兴国撤至高兴圩以北地区时，红 3 军和独立第 5 师迅速出击，在老营盘截歼第 9 师 1 个旅。与此同时，红军主力在高兴圩予第 60、第 61 师以沉重打击。15 日，红军主力又在方石岭截歼第 52 师及第 4 军团各一部，俘敌 5000 余人，缴枪 4500 余支，马 200 余匹。至此，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歼敌 17 个团共 3 万余人。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

1930 年 11 月至 1931 年 9 月，中央红军在朱德、毛泽东领导下，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连续打破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三次大规模“围剿”，共歼国民党军 8 万余人，国民党军被迫在较长时期内处于守势。

1932 年冬开始，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陆续调集 40 万大军，组织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专程到南昌亲自兼任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司令，指挥此次“围剿”行动，决定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歼灭于黎川、建宁地区。

国民党军兵分三路向中央苏区进击。中路军为“进剿”军，由蒋介石嫡系 12 个师组成，担任主攻任务，陈诚为总指挥；左路军由驻福建的第 19 路军等部队组成，共 6 个师又 1 个旅，蔡廷锴任总指挥；右路军由驻赣南、粤北的广东部队组成，共 6 个师又 1 个旅，余汉谋任总指挥，其中左、右两路军均为“清剿”军，担任就地“剿办”，并策应中路军的行动；第 23 师为总预备队；此外，还有 4 个师又 2 个旅分别在南城、南丰、乐安、崇仁、永丰等地担任守备。第 3、第 4 航空队以南昌为基地，支援作战。与国民党军的 40 万兵力相比，中央红军所辖的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和红 11、红 12、红 21、红 22 军，总计兵力才约 7 万人，至于武器装备上的差距则更为悬殊。

国民党军中路军总兵力约 70 个团，16 万人，组成 3 个纵队：罗卓英任第一纵队长，指挥第 11、第 52、第 59 师，向宜黄、棠阴地区集中；第二纵队长吴奇伟指挥第 10、第 14、第 27（后任守备）、第 90 师，向抚州、龙骨渡地区集中；第三纵队长赵观涛指挥第 5、第 6、第 9、第 79 师向金溪、浒湾地区集中，并以一部出资溪；第 43 师为预备队。担任“进剿”任务的上述部队限于 1933 年 1 月 6 日前集结完毕。但部队行动迟缓，直至 2 月中旬尚未全部到达指定地域。而此时，红一方面军则以备战姿态集结于金溪、浒湾、黄狮渡地区。红军根据中共临时中央关于不等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布置完成，就集中一切力量，首先粉碎抚河国民党军全部，而后各个击破增援之敌的指示，决定将闽浙赣苏区第 10 军、闽西苏区第 12 军和赣南苏区第 21 军调归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1 月下旬，第 10 军南渡信江，与红一方面军会合，随即同第 31 师合编为第 11 军。第 12、第 21 军也先后到达将乐以北和宜黄、乐安、崇仁地区，这两个军北调后，闽西和赣南地区分别成立了第 19 军和第 23 军。红军在金溪以南地区两次准备以运动战寻歼国民党军第 14、第 90 师等部，均因国民党军行动谨慎而未果。

2 月 4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决议，再次要求红军在国民党军部署未定之际，实行进攻作战击溃之，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丰。南丰乃国民党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国民党军第 8 师主力约 5 个团部署在该城及其周围地区，1 个团在里塔圩和新丰街防守。9 日，红军开始向南丰地区开进。11 日，红 22 军占领里塔圩，国民党军退集南丰城。新丰街之守军因归路被红军截断，退至南城。12 日晚，红三、红五军团各一部向南丰城外围阵地发起进攻，战至次日晨，未能突破防御。战斗中，红三军团第 3 师师长彭鳌不幸牺牲。担任中路军总指挥的陈诚，获悉红军围攻南丰后，一面令南城第 24 师立即派队驰援南丰，抑留红军于南丰城下；一面令中路军各部队迅速向南挺进，寻找红军主力进行决战。红一方面军朱德司令员和周周恩来政治委员，根据中路军的行动部署，当即决定改强攻南丰为佯攻，主力转移至南丰、里塔圩以西地区，待机打援。22 日，红军得悉国民党中路军以第 1 纵队

准备在宜黄、乐安地区迂回红军后方，而以第 2 纵队主力集中南城，1 个师前出至新丰街，企图在第 3 纵队策应下，与红军在南丰地区决战。周恩来、朱德鉴于国民党军兵力密集，在南丰地区与之决战于红军不利，毅然决定撤围南丰，采取退却步骤，以红 11 军伪装主力，在里塔圩和新丰街之间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以迷惑对方；方面军主力则陆续秘密转移到苏区东部的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灭国民党军。此次主动及时退却，不仅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且为进一步打击“进剿”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红军主力由南丰附近地区主动撤退后，“进剿”军一时成了丈二和尚，摸不清红军之去向，误以为红军主力退向黎川地区，一部退向广昌。同时南丰守军又惧怕红军再次围攻，呼救之声不断。面对此等军情，陈诚遂作出权宜之策，于是命令第 1 纵队于宜黄以南地区集中，然后出广昌、宁都，堵截红军归路；第 2 纵队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侧击黎川、建宁；第 3 纵队由金溪地区南下，从正面向黎川方向进攻，企图合击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为此，第 1 纵队的第 52、第 59 师准备由乐安地区分经蛟湖、霍源东进黄陂，同由宜黄南下的第 11 师会合。

兴许陈诚此时正为其高超指挥之术而得意忘形之际，兴奋于即将获得“剿匪”头功，既可解救南丰之守军，更可全歼红军之主力。而运筹于帷幄之中的红一方面军首长朱德、周恩来则已找到了破敌之策。鉴于中路军第 1 纵队与第 2、第 3 纵队相距较远，态势孤立，且第 52、第 59 师由乐安向黄陂开进所必经的登仙桥以东地区，山高林密，便于大部队隐蔽集结，是伏击战的理想之地，且该路军又临近红军集中地，为红军歼灭该部提供了绝好的良机。因此，方面军首长决心集中主力，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在固岗、登仙桥以东，河口、黄陂以西地区，选择有利地形，以伏击战歼灭第 52 师和第 59 师。具体战斗部署为；以红一、红三军团和红 21 军为左翼队，隐蔽集结于金竹、大坪地区，待第 52 师进至蛟湖、桥头一线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行军纵队发起攻击，歼灭该师；以红五军团和红 22 军为右翼队，隐蔽集结于横石、侯坊一线，准备占领黄陂、霍源地区，歼敌第 59 师，并保障左翼队翼侧安全；以江西军区独立第 4 师、第 5 师分别在永兴桥到扬坊之线和上下源地区活动，积极钳制国民党军，并保障右翼队翼侧之安全；以红 12 军为预备队，随红五军团跟进。

25 日，方面军首长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争取反“围剿”首战的完全胜利，给“进剿”军以迎头痛击；号召各部队利用战前或作战的间隙做好政治动员和宣专鼓动工作，提高部队士气。26 日，各部队先后进入预定地域，严密封锁消息，密切观察敌情，静候国民党军钻进伏击地域，准备打个漂亮的歼灭战。

同日，国民党军第 52、第 59 师由乐安分两路东进，当晚分别到达太平圩、罗山街一带。27 日，第 52 师按第 155 旅、第 154 旅（欠第 309 团）、师直属队、第 309 团行军序列，沿登仙桥、大龙坪、蛟湖、桥头之线向黄陂前进；第 59 师按第 177 旅、师直属队、第 175 旅、独立团序列，沿固岗、西源、霍源向黄破前进。行进中的两师之间有摩罗嶂大山相隔，联络协同均不方便，困难成堆。加之时值细雨浓雾之日，能见度极差，连 10 米之外的人物都难以辨清。第 52 师沿途不时受到苏区游击队袭扰，行动缓慢，并始终误以为红军主力远在南丰、黎川地区，行进中疏于戒备，对隐蔽于行进道路两侧高地的红军主力竟丝毫未曾察觉。午间时分，第 52 师先头部队进至桥头附

近，红一军团之第 7 师立即以一部兵力向蚊湖攻击，将第 52 师的行军纵队拦腰切断。与此同时，该军团之第 7、第 9 师主力向进至大龙坪的第 52 师师部猛攻，该军团的第 10、第 11 师向进至小龙坪的第 52 师后卫部队发起攻击，红 21 军则神速穿插到登仙桥附近地域，截断其退路。历经 3 个小时的激战，红一军团歼灭了第 52 师师部、第 154 旅之第 309 团等部，并俘其师长李明。取道大龙坪、坪口、跃龙坪向黄陂前进的该师第 155 旅第 312 团，也在跃龙坪遭到歼灭性的打击。而该师前卫第 155 旅主力进至桥头附近后，从激烈枪炮声中得知大龙坪方向和黄坡方向发生了战斗，但却因情况不明，决心难定，加之不断遭到沿途苏区游击队的袭扰，遂被迫停止前进，占领阵地。傍晚 18 时，红三军团赶到，随即将该部合围于桥头。28 日 8 时，红三军团向桥头的第 155 旅发起猛攻，将其逐次歼灭；同时，以一部兵力进攻蛟湖的第 154 旅主力，与红一军团的一部密切协同，于 11 日全歼该旅。

红军右翼先头部队于 27 日中午到达黄陂、秀源一线，发现国民党军第 59 师正从霍源一带向黄陂前进。右翼队首长当即命令红 22 军之第 64 师向霍源方向急进，抢占有利地形，并在国民党军到达前占领黄陂西北一带高地，红 15 军则在霍源以南占领阵地，力争将第 59 师全歼于黄陂、霍源地区。13 时，红 15 军与该师前卫第 177 旅接触，激战数小时，击溃了该旅。战斗打响后,第 59 师师长陈时骥一面令后卫第 351 团主力和独立团一道在西源以及以西地区转入防御，一面亲自率领第 175 旅主力增援前卫部队。战至黄昏，双方形成对峙。红军右翼队首长视情当即决定以小部监视国民党军，主力集结休息，并调整部署，准备次日再战。28 日 8 时，右翼队向第 59 师发动全线进攻。经过整日战斗，将该师主力部队大部歼灭，并在红三军团一部的配合下，于霍源地区切断了该师的退路。师长陈时骥见败局已定，遂率残部数百人乘夜暗向蛟湖方向逃窜，企图与第 52 师会合，当逃至蛟湖附近时，发现第 52 师已被歼灭，于是只得转向乐安方向仓皇逃窜。3 月 1 日上午，该师残部行至登仙桥东北地区时，被红一军团歼灭，师长陈时骥被活捉。留下西源的该师后卫第 351 团大部和独立团在国民党军第 11 师接应下逃向河口。

国民党军第 59 师主力被歼后，其中路军第 1 纵队的红 11 师主力已达河口、南源地区。红军准备乘胜继续围歼该部，但因第 2、第 3 纵队兼程来援，再战于红军不利，方面军首长当即决定将红军主力转移至小布、路口、东韶地区休整待机，以准备继续歼灭来犯之国民党军。

黄陂战斗结束后，“进剿”军仍集中在黄陂、蛟湖地区搜寻红军主力。由于苏区军民严密封锁消息，国民党军仍似睁眼瞎子一般，判不明红军之去向。3 月中旬，陈诚鉴于黄陂地区作战失利，遂将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并对作战部署作了如下调整：以第 2 纵队为前纵队，第 1 纵队余部及第 3 纵队第 5、第 9 两师为后纵队，第 3 纵队第 6 师在抚州守备、第 79 师在宜黄地区担任预备队，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方向进攻，企图攻占广昌，寻歼红军主力于广昌地区。16 日，中路线前纵队到达新丰市、侯坊、草台岗一线，后纵队位于东陂、黄陂、蛟湖地区。由于这两个纵队靠拢一起，行动谨慎，不便分割歼灭，红军歼敌一翼的计划未能实现。

为了分散敌人，创造战机，方面军首长决定以红 11 军进到广昌西北地区，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积极活动，吸引敌前纵队加速前进，以拉开其前后两个纵队之间的距离。“进剿”军总指挥陈诚，对红 11 军等部在广昌及其西北地区的活动，误认为是红军主力，便当即命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前进，并

将后纵队第 5 师改归前纵队指挥，以加强其进攻力量。

黄陂战斗后，红一方面军经过休整补充，士气正旺。为求歼由宜黄南部地区进攻广昌的国民党军一部于运动之中，从 3 月 15 日起，方面军主力便陆续由原集中地出发，进至徐坊、大坪、东边岭、横石、高溪一带，迫近草台岗、徐庄地区隐蔽待敌。草台岗、徐庄一带，山高林密，道路崎岖，国民党军重装备难以发挥威力，飞机也难以进行空中支援，反之，装备轻便和擅长于山地运动战的红军，却易于发挥其优长。再则，该区又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在此预设战场可谓明智之选择。20 日，“进剿”军前纵队进至甘竹、罗坊、洽村一带；后纵队之第 11 师进至草台岗、徐庄一线，第 59 师残部在第 11 师后跟进，第 9 师进至东破附近，前后两个纵队相距将近 50 公里，后纵队态势孤立，力量又比较薄弱，再一次出现了红军求歼运动中或立足未稳之敌的有利战机。

方面军首长决心抓住这一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歼灭后纵队的第 11 师于草台岗、徐庄地区，尔后相机各个歼灭其他进攻之敌。具体部署为：红一、红三军团，红 21 军和江西军区独立第 5 师为左翼队，先消灭草台岗附近之敌，尔后进攻并消灭东肢之敌，彭德怀、滕代远担任左翼队指挥。红三军团于东边岭、亮溪附近由西南向东北进攻草台岗之敌；红一军团于大坪、徐坊之线由西向东进攻铁石坳附近之敌，并截断东破敌第 9 师与草台岗之敌的联系；红 21 军于王坑、邱坪附近由西向东进攻东陂之敌；独立第 5 师于吴城、秀山由西北向东南佯攻五里排之敌，并保障红军左翼队左翼安全。红五军团、红 12 军和宜黄两个独立团为右翼队，以主力进攻草台岗、徐庄之敌左侧背、以一部从摇篮寨钳制东陂之敌，右翼队指挥由董振堂、朱瑞担任。红五军团由端溪地区沿落马山、霹雳山进攻徐庄、雷公嵊之敌，红 12 军主力由王埂山、三角寨一带侧击侯坊、徐庄、雷公嵊之敌，以一部并指挥宜黄老独立团由摇篮寨钳制东陂之敌，宜黄新独立团进至新丰市西南地区阻击敌前纵队回援，保障右翼队右翼之安全，右翼队与左翼队的战斗分界线为由东边岭到东陂大路之线，道路含左翼队。红 22 军为总预备队，配置在郭家地附近，战斗打响后随红一军团跟进；必要时由林彪、聂荣臻指挥。

20 日黄昏，敌后纵队第 11 师陆续到达徐庄以南地区，第 59 师残部进抵雷公嵊附近，第 9 师在东陂担任掩护。第 11 师因山路崎岖，地形复杂，夜间行军困难，便在霹雳山一带露营。不久，该师前卫与红五军团一部接触后，全师就地转入防御，以第 32 旅占领霹雳山、龙咀寨、黄柏山阵地，以第 31 旅 2 个团占领龙咀寨以北及黄柏山、草台岗南北之线，师部及预备队 1 个团在徐庄。

20 日夜，红军各部队按战前部署先后进入攻击阵地。21 日拂晓，红三军团首先发起攻击。红 1 师在界上地区展开向霹雳山之敌进攻，红 2 师和红 7 军由各城下、茅亭下一线向黄柏山之敌进攻：红 3 师为军团预备队在界上待命。红一军团第 10、第 11 师在张山附近地区展开，向黄柏山之敌进攻；红 21 军由大公田、西岭地区向东陂之敌进攻，切断国民党军第 9 师与第 11 师的联系，保障主力围歼第 11 师；担任预备队的红 22 军在张山附近待命，并以一部向东破警戒。与此同时，红五军团的第 15 军、第 39 师及红 12 军分别向霹雳山、雷公嵊和摇篮寨之敌发起进攻；红军右翼队预备队第 38 师进至焦坊待命。10 时，红三军团第 1 师突破霹雳山敌阵地，激战中，红 1 师师长彭绍辉率部冲锋，身负重伤。红军攻占霹雳山后，残敌向龙咀寨溃逃。军团长

当即命令预备队第 3 师加入战斗，与第 1 师协力向龙咀寨攻击，并以 1 个团加强对黄柏山之敌的攻击。此时，黄柏山战斗异常激烈，红军与国民党军多次展开肉搏。红 3 师进入战斗后，红一军团首长见黄柏山与龙咀寨之敌，分别为第 10、第 11 师和第 1、第 3 师所吸引，中央空虚，即以第 9 师从中央穿插进去，支援黄柏山、龙咀寨红军的作战。15 时，红军占领龙咀寨。红一军团为迅速解决战斗，继以第 7 师投入黄柏山方向的作战。激战至 17 时，国民党军第 11 师全部阵地均为红军突破。红军各部队乘胜追击，歼灭该师大部，并击伤其师长萧乾。在红军攻歼第 11 师时，第 59 师残部和第 9 师的 1 个团在罗卓英的督令下，曾积极进行援救，在雷公嵊南端和大排地区遭到红军严重打击。第 11 师被歼后，敌中路军各部队纷纷后撤。至此，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大规模“ 围剿 ”基本被打破。

在国民党军中路军向苏区“ 进剿 ”期间，蒋介石曾令其左路军和右路军积极策应中路军作战。但这两路军同蒋介石的矛盾很大，均图自保，加之不时遭到苏区军民的袭扰，始终未能起到预期的配合作用。

此次反“ 围剿 ”作战，共消灭蒋介石嫡系部队 3 个师，俘 1 万余人，缴枪 1 万余支，活捉 2 名师长，毙、伤 16 名师、旅、团长，取得重大胜利。此次反“ 围剿 ”，是在王明“ 左 ”倾路线统治下进行的。但是，由于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着深刻的影响；由于周恩来、朱德适时从南丰撤围，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从被动中取得了主动。在国民党军多路进攻的情况下，红军以少数兵力钳制敌之数路，集中主力，运用大兵团伏击的方法，残击敌之一路，取得黄陂、草台岗两战的胜利，从而胜利地打破了此次“ 围剿 ”，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

第五次反“ 围剿 ”失败

1933 年 5 月，蒋介石在美、英、德、意等帝国主义支持下，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 ”，亲自指挥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 围剿 ”。这次“ 围剿 ”，国民党军集中 100 万人的兵力，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 50 万人，并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方针，企图逐步压缩革命根据地，寻求红军主力决战，最终达到消灭红军，摧毁苏区的目的。

国民党军的部署是：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 33 个师又 3 个旅，分第一、第二、第三路军，由北向南对中央苏区进行主攻。以第三路军 18 个师又 1 个旅，充任主力，在第一、第二路的策应下，依托碉堡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红军主力作战；总预备队 3 个师位于抚州附近；北路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 2 个师扼守赣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配合西路军维护赣江交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 11 个师又 1 个旅，构筑碉堡线，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等地，阻止红军向南活动，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空军 5 个队配置于南昌、抚州、南城，掩护和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另外，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等部 7 个师又 2 个旅，扼守闽西和闽北地区，阻止红军东向；浙赣闽边守军 5 个师又 4 个团及西路军 9 个师又 3 个旅，在“ 围剿 ”闽浙赣和湘赣、湘鄂赣苏区的同时，又负有阻止红军向赣东北和赣江以西机动的任务。

中央苏区经过四次反“ 围剿 ”，版图已有 30 多个县的范围，政权建设与

经济建设都取得了很大成就，红军发展到 8 万人，赤卫队等群众武装亦有很大发展。第五次反“围剿”前夕，中共临时中央完全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否定了他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在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迫在眉睫时，不组织苏区人民和红军作反“围剿”准备，却令红军继续在闽西北地区和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区，对国民党军实行不停顿地进攻。

9 月 25 日，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28 日，北路军占领黎川。中共临时中央继续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要求红军在苏区外战胜敌人。这时，苏联情报机关派到东北做情报工作的李德辗转到达中央苏区，在博古的支持下当上了党中央的军事顾问，他以“太上皇”自居，实际上掌握了中央军委的领导权。

中革军委为了恢复黎川，命令红军第三军团等部从将乐、顺昌地区北上，进攻国民党军驻守的硝石，恢复黎川；命令第一军团等部主力，由永丰、乐安地区东移，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之间的国民党军，保障第三军团等对黎川地区的国民党军的进攻。10 月 6 日，红三军团于洵口歼灭国民党军一部。接着进攻硝石数日不克，红一军团主力也未能阻止南城国民党军的东援。13 日，红三军团被迫撤出战斗。这时，国民党军在硝石至资溪桥之间地区集中 7 个多师的兵力，企图在完成碉堡封锁线后，吸引红军主力攻击。中革军委不知扬长避短，命令红军进入国民党堡垒区中去打攻坚战，歼灭敌人。从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中旬，红三军团等部在进攻国民党军重兵扼守的资溪桥、潭头市、浒湾等据点的战斗中，以及红一军团等部在国民党堡垒区的作战中，均受到很大损失，被迫后撤。至此，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非但没有御敌于苏区之外，反而损兵失地，完全陷入了被动地位。

这时，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要求红军处处设防，以阵地防御阻止敌人的“围剿”。正当红军部署防御时，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同蒋介石决裂，愿联共反蒋，蒋介石慌忙从北路军中抽调 9 个师，去进攻第十九路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红军主力应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威胁国民党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区地带寻求作战。但是中共临时中央拒不采纳这一正确建议，以红军主力去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

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第十九路军后，随即将入闽部队编为东路军，协同其北路军、南路军，于 1934 年 1 月下旬重新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从 1 月下旬到 3 月下旬，红军在阵地防御及反击战中，遭受重大损失，丧了元气。4 月上旬，国民党北路军和东路军进抵康都至泰宁一线，接着以 11 个师进攻广昌。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集中红军主力 9 个师的兵力保卫广昌，同国民党军拼消耗，特别在延福嶂和大罗山等阵地上反复厮杀，战况尤其惨烈，在 18 天的作战中虽予敌以很大杀伤，自身伤亡 5000 多人，广昌失守。以后，红军接连失利，苏区日益缩小。

7 月上旬，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展开全面进攻。北路军 14 个师向兴国、宁都、石城推进；东路军 6 个师向长汀推进；南路军 3 个师向会昌、于都推进；以 3 个师集结于南丰、广昌地区为总预备队。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仍不敢实行敌进我退、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作战原则，而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以红军主力分别配置在兴国、古龙冈、头陂、驿前、连城、筠门岭等地区，抵御国民党军的进攻。8 月，红三军团及红五军团一部在高虎垴、万年亭等战斗中，虽予敌以重创，自己亦受到较大伤亡，被迫放弃全部阵地。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等部在温坊地区以运动伏击歼东路 1 个多旅，已无法改变被动局面。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不仅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反而使红军陷入了人少地蹙的困境。9 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

10 月上旬，北路军和东路军加紧对兴国、古龙冈、石城、长汀进攻，南路军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企图占领上述各地，进而占领宁都、于都、瑞金，以消灭红军。这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等惊慌失措，决定放弃中央苏区。据此，中革军委于 7 日下令地方部队接替各线防御任务，主力红军撤到瑞金、于都、会昌地区集中。

10 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共 8.6 万余人，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长征。正如一首《临江仙·广昌折兵》词所描述的那样：“五次战争悲自起，分兵抵御师疲。三军苦斗虎威施。厮杀福嶂暗，死守大罗凄。

血肉横飞神鬼怒，为何常陷重围？将帅不忍杜鹃啼。城池易帜稠，无计湘西移。”

脚写的英雄史诗

中外多杀伐，开天颂长征。
雄关路万里，沙场战果丰。
四渡红河水，欢歌荡碧空。
语赠天下士，当学世中龙。

这首五言诗《长征路》，是一位研究红军长征的战史工作者重走长征路时写的，从中人们不仅可以看到红军长征是悲壮的，而且更是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独一无二的英雄举动。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先后从长江南北各苏区，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工农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跨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杀退数十万国民党军的重重围追堵截，纵横转战 14 个省，以其神勇无比的大无畏精神，胜利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的战略基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建立了一座不朽的雄伟丰碑。

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大转移，是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和不利形势下，被迫进行的。1933 年 9 月，蒋介石调集近 100 万军队，300 余架飞机，对苏区工农红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指挥这次围剿作战，仅对中央根据地就集中了 50 万军队，构筑层层封锁线，企图与红军决战，消灭红军，彻底摧毁苏区。此时，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剥夺了毛泽东对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权，反对毛泽东创造的“诱敌深入”运动战的作战方针，致使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遭到严重失败。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时，掌握中央领导权的博古和军事指挥权的军事顾问李德，采取了军事冒险主义方针。在洵口遭遇战偶然获胜的情况下，不顾整个军事态势和敌强我弱实际，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作战方针。在敌军的强大攻势下，红军接连失利，苏区日益缩小。1934 年 4

月，中央红军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损失非常严重。这时，李德等仍主张分兵把口，东堵西击，疲于应付，红军越拼越少。广昌失守后，形势急转直下，日趋严重，10 月初，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进攻，迅速占领了兴国、宁都、石城一线。至此，红军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已无可能，于是被迫退出苏区，开始了战略转移。

长征开始时，博古、李德等又实行了军事行动上的逃跑主义路线，在放下行李才能打仗的思想指导下，一味消极避战，把大转移视为大搬家，把长征变成长跑。10 月 10 日，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 8.6 万人从江西瑞金出发，准备突破敌军封锁，进入湘西地区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蒋介石接连部署了四道封锁线，追堵中央红军。中央红军在突围转移中，携带着大量辎重，在转移的小道上拥挤不堪，艰难行进，行军速度极其缓慢。根本无法去摆脱敌人，形势愈加被动。

经过苦战，突破敌三道封锁线后，我军面临更危急形势，蒋介石急调 40 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防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借湘江险阻，企图消灭中央红军。

11 月 25 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强渡湘江的命令。经一周激战和强渡，渡过湘江，突破敌军第四道封锁线，但中央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8 万多人拼得只剩下了 3 万余人。而且并未摆脱蒋介石围追堵截。红军面临着全军覆灭的危险。

在濒临绝境的危急时刻，广大干部战士对“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愈来愈不满和怀疑。12 月 15 日，中央红军占领了贵州黎平，在此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研究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为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立即向贵州前进。1935 年 1 月强渡乌江，打下遵义，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红军由危急和失败转向光明和胜利的转折，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党。

之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5 月，终于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5 月下旬，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以顽强的毅力，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大雪山，于 6 月 16 日，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根据全国的形势，提出了创建川陕苏区的战略方针。然而，张国焘拥兵自重，坚持向西康或青海、新疆等偏远地区退却，企图独树一帜。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35 年 6 月 26 日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尔后又决定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左路军经阿坝北上，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经班佑北上，中革军委、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右路军历尽千辛万苦，通过茫茫草地，8 月底到达班佑地区；左路军先头也进至阿坝地区。此时，中共中央一再致电张国焘，让其加速前进，然而，张国焘却拒绝北上，并要求右路军南下，发电报企图危害党中央。在此紧急时刻，为粉碎张国焘的分裂阴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果断决定率右路军一部即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

9 月 17 日，红一方面军红 1、3 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六盘山，于 10 月 19 日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至此，中共中央

及红一方面军主力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此前，在 1934 年 11 月离开鄂豫皖苏区的红 25 军，为配合红一、四方面军北上，终止威逼西安的行动，于 1935 年 7 月从西安南的丰裕口出发，9 月 16 日到达陕甘苏区永坪镇，同西北红军第 26、第 27 军会师，并合编为第十五军团。

坚持分裂主义路线的张国焘，率领红军左路军二过草地，在疲劳、缺粮断弹、极度疲困情况下，连续转战，使红军大量减员，于 4 月进入西康省甘孜等地区，这时左路军和右路军一部 8 万余人仅剩 4 万余人。

位于湘鄂川黔苏区的红二、六军团，面对国民党军 130 个团的“围剿”，于 1935 年 11 月 19 日从湖南省桑植地区出发，退出苏区开始长征，于 1936 年 3 月 28 日突破重围，到达盘县地区。此时，遵照红军总司令部的电令，分两路西进，于 7 月初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并组成了红二方面军。

张国焘在连遭挫折和中央连电催其北进的情况下，被迫取消伪中央，同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张国焘率部到达西北地区后，又拒不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而后向宁夏发展的指示，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西进，拟渡过黄河去青海和甘南，在中央一再催促和广大指战员的抵制，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计划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张国焘才被迫同意红四方面军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师。1936 年 10 月 9 月，红一方面军在会宁同红四方面军会师。10 月 22 日，红二方面军在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历时两年的长征胜利结束。

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红军在国民党军数十万军队围追堵截，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极端危险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是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的政治和军事路线领导下取得的伟大胜利。她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是中国工农红军震惊世界的伟大创举。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的胜利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是红军将士驱动自己的双脚，用鲜血与生命谱写的英雄诗章，并且为人类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长征精神。

红二、红六军团的湘西攻势

湘西攻势是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的长征行动，并创建新苏区而发起的进攻作战。1934 年 10 月，红 3 军与红六军团在贵州木黄会师之后，红 3 军便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红二军团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军团的作战行动。此时，中央红军已从苏区突围，正沿粤赣边境向湘南前进。“追剿”红六军团的湘桂两省国民党军迅速东调，参加围堵中央红军，而留在湘西地区的仅有新编第 34 师等部，致使湘西地区兵力异常薄弱，并给红二、红六军团发起攻势提供了一难得的良机。

10 月下旬，红二、红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的指挥下，从黔东出发，向湘西地区发动攻势，经西阳占永顺。11 月 13 日，新编 34 师 3 个旅逼近永顺城。红军弃城北移，设伏于龙家寨以北十万坪谷地。15 日 16 时，追敌 2 个

旅进入红军伏击圈，红军立即发起猛攻，激战 2 个小时，歼其大部，并乘胜追击，又在龙家寨附近击溃新 34 师的另 1 个旅；共俘国民党军 2000 余人，缴枪 2000 余支。接着，红军又重占永顺城，并先后占领了大庸、桑植等城，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贺龙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军区司令员。

12 月初，中央红军已从全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并继续向西转移。为了策应其行动，红二、红六军团以一部兵力在永顺、桑植、大庸地区，从事建立苏区的工作；主力向南进袭沅陵未克，即沿沅江东进，在桃源县以北的浯溪河歼灭刚由湖北调来之敌独立第 34 旅 1 个团又 2 个营，并乘胜占领桃源，包围常德城。20 日主动撤围，攻占了慈利县城。1935 年 1 月初，红军返回大庸、永顺地区休整，湘西攻势以胜利而告终。

此次攻势作战，共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 4 个旅，控制了永顺、大庸、桑植县的大部和龙山、保靖、桃源、慈利、常德县的一部，并在部分县建立了人民政权和地方武装，初步建成了湘鄂川黔苏区。此战的胜利，还迫使国民党军由“追剿”中央红军的湘军中抽调 3 个师，由江西抽调 1 个师，驰援湘西，从而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

黎平兵转高原地

中央红军离开通道以后，兵分两路进入贵州境内。贵州属云贵高原，地瘠民贫，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之说。人民群众在军阀、地主的重重压迫与盘剥下，过着饥寒交迫，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穷苦的老百姓被称为“干人”。1934 年 12 月 15 日，中央红军突破黔军防线，占领黎平、老锦屏地区。16 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一、红九军团进至柳霁地域，准备渡过清水江，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时，蒋介石已在湘西部署重兵，张网以待，就怕红军不就范。

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研究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博古、李德仍然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创造新的根据地的错误方针。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敌人兵力薄弱的地区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建议，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至遵义西北地区。”决议号召广大指战员，“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

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端正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从此，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重新开始进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策圈，并开始恢复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正如一首《忆秦娥·黎平转兵》词所说的那样：“山河泣，大军强渡湘流急。湘流急，杀声盈野，怨言难抑。黎平兵转高原地，统帅重把奇谋觅。奇谋觅，纵横云贵，往来无敌。”

在此之前，军委第 1、第 2 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为了充实作战部队，撤销了红八军团建制，除营以上干部外，其余编入红五军团。从而，精简了机关，提高了红军机动作战能力。

19 日，中革军委依据中共中央黎平会议决定的新的战略方针，部署中央红军分路西进。红一、红九军团为右纵队，当占领剑河后，沿清水江南岸向施秉前进。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及红五军团为左纵队，经台拱（今台江）以西地区向黄平前进。中革军委还电令红二、红六军团在常德地区积极活动，以调动湘军，当湘军北援时，应乘机向永顺、黔东急进，以便牵制在铜仁的薛岳部队及在印江、思南的黔军。并电令红四方面军组织新的攻势，以便牵制川军，策应中央红军西进。

20 日，中央红军昼夜兼程西进。右纵队红一军团经剑河于 25 日攻占施秉、镇远。红九军团由老锦屏出发，随红一军团后跟进，由剑河北渡清水江，配合红一军团夺取镇远。左纵队红三军团由黎平地区出发，经南加、南哨地区，于 24 日进抵台拱以南。军委纵队由黎平出发，24 日到达南哨附近，红五军团随军委纵队之后，24 日到达剑河。

红军转兵贵州，使国民党军在湘西同红军决战的计划落空，各路敌军被迫改变部署。桂军主力停止在黔桂边界，1 个师由古宜（今三江）进抵溶江。“追剿军”刘建绪部第 16、第 62 师准备开往常德进攻红二、红六军团，第 63 师在通道以西“清剿”；第 15 师由会同、广平“追剿”红军；“追剿军”薛岳部第 23 师、第 53 师开往会同，其主力集中于芷江、洪江，并向铜仁、新晃、玉屏、天柱一带防堵，一部向镇远、施秉方向前进。黔军集中 6 个团于施秉、黄平组织第二道防线。

中革军委为争取先机，决心消灭黔军一部，迅速抢渡乌江。28 日，右纵队红一军团占领余庆、老黄平。左纵队红三军团占领黄平，军委纵队进到施秉，红五军团到达台拱。接着，各部继续向乌江前进。至 12 月底，红一军团到达乌江右岸，并立即开始侦察渡江地点，筹集渡江器材，积极准备渡江；红九军团在施秉以东的紫荆关阻击追敌；红三军团到达瓮安附近；军委纵队到达猴场；红五军团进至老黄平。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在 10 多天的时间里，连战皆捷，占领了数县。部队得到休息，取得了补充，士气渐振，行军中又听到了欢声笑语。

这种令人乐观的形势，却使博古、李德产生了就地休整，再进军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打算。他们要推央政治局黎平会议的决定，并企图说服周恩来站在他们一边。周恩来不同意他们的主张，认为即便要修改，也得经过政治局会议，不能几个人说改就改。于是，又召开了猴场会议。

1935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红军渡过乌江以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 2 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并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决议还指出：“利用我们所争取得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并进行整顿补充的工作。特别加强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在充实战斗连的原则之下，应缩编我们的部队，军委纵队必须继续缩小，以适合新的作战环境。”决定还强调：“保持同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密切的通信联络”，“使他们以积极的行动，

来配合我们的反攻。”为了加强党中央对军事指挥的领导，防止军事指挥员的某些错误，决定还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

与猴场会议的同时，红一军团以第 1 师第 1 团为右路、第 2 师第 4 团为左路渡江先遣团，分别由回龙场、江界河实施抢渡，突破敌人乌江防御。随后，红三军团在茶山关渡过乌江。至 6 日，中央红军各军团和军委纵队渡过乌江。国民党军乌江江防司令林秀生率残部，星夜逃向遵义地区。

遵义会议正航向

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到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在王明“左”倾路线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指导下，继续遭受重大损失。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及广大指战员，从革命战争的实践和经验教训中认识到，苦战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左”倾冒险主义排斥毛泽东正确领导和军事路线的结果，因此强烈要求讨论失败的原因，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一些曾经支持过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严酷的事实面前，逐步地改变了态度，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这表明纠正王明“左”倾错误，解决当时最迫切的军事指挥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央红军占领遵义，把国民党几十万“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获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条件。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红军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李德，以及担任翻译的伍修权。会议的中心议题：一、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北渡长江，到川西或川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博古主持会议并在会议上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对军事上的错误作了轻描淡写的检讨，着重为其错误辩解。他强调党中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是正确的，把第五次反“围剿”不能胜利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苏区物质条件差，党对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与日常斗争的领导没有显著进步，瓦解白军工作的薄弱，各苏区红军配合不够等。在他看来，在客观上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根本不可能粉碎的，在主观上红军是无法粉碎的。

周恩来作了报告，详细说明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战术，撤离根据地的原因，重点指出了主观因素上的错误，对李德、博古不点名地进行了批评，并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在会上作了发言，批评了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深刻地、切中要害地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及其表现，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退却时的逃跑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长征中的重大牺牲。他批评李德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

出发，只知纸上谈兵，瞎指挥。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战略战术上的堡垒对堡垒、分散兵力等方面的错误。

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战略战术，深刻地批评了军事教条主义的错误。强调指出，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红军作战的形式只能是游击战和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中，红军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用这种决战防御战胜了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但是，红军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博古和李德以单纯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以分散兵力作战的方针代替了集中优势兵力作战的方针。广昌战役后，在打破“围剿”已不可能的情况下，仍然同敌人拼消耗，削弱了红军的力量。在后来的突围中，又实行了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大搬家式的行动，使红军继续遭受严重损失。

决议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发展惩办主义、压制不同意见等粗暴的恶劣作风。决议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创造新的根据地，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变军委的领导方式。

决议根据全国的形势，确定了党和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指出目前中心的问题，是用一切力量战胜云、贵、川的以及蒋介石的军队。红军要发挥运动战的特长，正确地、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争取战斗的胜利。在中央苏区和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党必须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以适应新的环境。决议号召全党同志，反对一切张皇失措与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实现党的总路线而奋斗。

这次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关，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会后，政治局常委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3 月，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但有关军事命令和训令，仍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下达。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并为胜利完成长征、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这次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组织上的严重错误，而没有进一步联系和讨论政治路线问题。这样做适合当时多数同志的认识水平，既解决了红军的迫切问题，又团结了同志，为解决党内矛盾和分歧树立了榜样。后来，朱德缅怀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时兴奋地写道：“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际任飞扬。”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指挥 3 万红军纵横驰骋在云贵川广大地区，同数十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周旋，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经过四渡赤水战役，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使红军从被动变为主动，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书写

了极其光辉的篇章。

土城脱险渡赤水

黎平会议后，红军突破乌江，占领遵义，在这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这时，红军人数大减，蒋介石仍威逼不舍，大有一举剿灭红军之势。毛泽东可真谓“受命于危难之时”。

1 月 19 日，毛泽东骑着一匹高头白马，带领红军踏上新的征程。在中央纵队前面，毛泽东、朱德、洛浦并辔而行，周恩来、博古紧随其后，此时红军前进的方向是：按照遵义会议定的计划，分三路纵队向赤水方向急进。

蒋介石老奸巨猾，猜到了红军的意图，决定坚决阻止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或东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决计将红军“围剿”在长江以南地区。于是，制定了“川江南岸围剿计划”，竭力阻止红军会师。

他令湘军、鄂军各一部围攻红二、红六军团；令川军、陕军各一部对付红四方面军。以重兵在中央红军周围组织了一个大包围圈，妄图“合剿而聚歼之”。其部署是：

以薛岳兵团周浑元、吴奇伟 2 个纵队共 8 个师，尾追中央纵红军进入贵州，在控制贵阳、息烽、清镇等地后，继续北上；黔军王家烈部 3 个师渡乌江尾追中央红军；桂军廖磊部 2 个师进到贵州独山都匀一带，以图策应，从南向北追击红军。以川军潘文华为总指挥，组成“四川南岸剿匪军”：刘湘派出 12 个旅 36 个团沿长江沿线布防，封锁长江阻止红军北上进入川南；第 5 师开赴合江待命；又调上官云相 2 个师从河南向重庆、綦江推进，堵击红军北进。以湘军刘建绪的 4 个师、鄂军 1 个师另 1 个旅进至黔东，沿乌江东岸布防，防红军东返。以滇军孙渡部 3 个旅和 1 个团向昭通、毕节开进，防堵红军西进。

蒋介石调重兵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围拢而来，40 万匪军铁桶一般围逼红军。

濒临险境，方显英雄本色。蒋介石给毛泽东创造了充分展示军事指挥才能的用兵机会，在长江以南、赤水河两岸地区，毛泽东遇险不惊，巧用奇兵，走出步步举世绝伦的妙棋，化险为夷，创造出了战争史上一个个杰作。

赤水河，源于云南，向东至贵州茅台南之鲁班场折向北，经茅台、土城、赤水县城西汇入长江。红军此时在赤水以东、长江以南的一个狭小的三角地区，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然而，这里崇山峻岭，便于隐蔽行动企图。

红军分成三路向赤水方向急进，在于迷惑蒋介石，使蒋难以准确判明红军意图。借以寻找时机，选择敌人布防薄弱处渡江。

右纵队红一军团突破黔军侯之担部阻拦，于 24 日进抵土城，其前锋占领赤水城东南的旺隆场、复兴场；中央纵队攻占了三元汤、习水；左纵队进占土城东南回龙场、周家场等地。红军力图迅速北进攻占赤水县城，为全军北渡长江进军川南打开通道。为此，中革军委决定，乘南面之敌薛岳部主力尚在乌江以南之际，以红一、红九军团各一部阻击赤水、习水南进之敌，并攻占赤水县城；红三、红五军团以积极进攻手段歼灭土城镇东北地区向红军进逼的敌军 4 个团，保障红军下步顺利渡江。

1 月 27 日，毛泽东令红一军团的林彪率军北上，夺取赤水县城；由彭德怀、杨尚昆率一部担任消灭土城东南之敌的任务。 28 日晨 5 时，战斗打响，这时突然发现情报有误，原来以为土城方向川军是 4 个团约六、七千人，实际上是 6 个团万余人，而增援部队源源涌来，使红军陷于一场恶战之中，目前也只有咬牙啃下这块硬骨头，不然，敌人进逼上来，北面赤水县城没攻取，身后有赤水河，红军将陷入极其被动地位。

毛泽东面对当前敌情，目不转睛地盯着地图，连续抽烟。他的视点落在赤水县城上，忽然，他转过身来，命令道：红一军团急速从赤水县城撤出战斗，返回增援土城方向。

朱德深知毛泽东的意图，目前最要紧的是先顶住土城方向进攻之敌，以解燃眉之急。不然，赤水城就是攻下来了，也来不及组织过江。他知道土城阻击战的重要性——是红军寻找回旋余地，摆脱被动的重要战斗，他早已按捺不住了，请求毛泽东说“让我去前线指挥作战吧！”毛泽东知道上前线意味着什么，立即说到：“前面危险，你不能去。”

朱德这下可急了，他把帽子一摘，站起来，对毛泽东说：“得啦，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只要遵义会议开出了新天地，区区一个朱德何足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毛泽东深知朱德的脾气，更了解他的指挥才能，望着朱德，敬佩地点了点头。

总司令挂甲亲征，所有的中央领导和其他人员 200 余人列队土城镇，都前来送行。朱德被这壮烈场面感动了，眼含热泪，不住地说：“不必兴师动众，不必兴师动众，礼重了，礼重了！”毛泽东紧紧握着老战友的手，激动地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昆仲手足情。祝老总多打胜仗，多捉俘虏，凯旋而归。”

朱德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大踏步奔向前方硝烟弥漫的战场。

朱总司令亲临前线，给前线将士极大鼓舞，战士们在朱德指挥下，连续冲锋，奋勇拼杀，顶住了敌军一个又一个进攻，几次敌人冲到眼前，双方展开肉搏战，鲜血染红了山岗。可敌人太多了，杀退一批，又上来一批，红军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地同敌人战斗，和敌人成胶着状态。看来，敌人想把此地作为同红军决一死战的战场。

在朱德指挥红三、红五军团英勇拼杀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令陈赓率干部团立即从侧翼发起冲锋，干部团的将士个个武艺高强，作战勇敢。以泰山压顶之势冲向敌阵，敌军终于被打退了。

朱德为干部团勇猛迅速的动作所感动，不住地说，“好样的，多谢罗！这里没事啦，继续往前打。”

毛泽东一直在观察前线官兵行动，看到干部团巩固住了阵地，高兴地称赞：“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然而，敌我力量悬殊的危急态势并没解除，毛泽东意识到，这样打下去，将是一场危险的战斗，我军决不能在此与敌拼消耗，进行决战。他当机立断，对中革军委其他领导说敌军增援源源不断，等敌人都集中到这里来局势将更加危险土城不能打了。

当晚，毛泽东召开了政治局领导成员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果断地提出：迅速撤出土城战斗，渡赤水河西进，并分工朱德、刘伯承仍负责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指挥架设浮桥，陈云去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

资。

周恩来带领工兵干部和作战参谋，来到赤水河边，勘察赤水河，确定架设浮桥地点和掩护部队过河的阵地。连夜指挥工兵在赤水河上架设了一座浮桥。与此同时，朱德又指挥部队在深溪渡口夺得了敌人一座浮桥。

下半夜，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天阴沉沉伸手不见五指毛泽东率领红军悄悄地赶到渡口，开始渡河。1 月 29 日，中央红军除以少数部队阻击敌人外，主力分 3 路西渡赤水河。为轻装前进，红军将一部分火炮沉入赤水河中，轻装前进，行动更加自如。红军过了赤水，摆脱了与敌死打硬战的被动局面。从此，毛泽东潇洒自如、运筹帷幄、疑兵布阵、调动敌人的指挥艺术在战争的舞台上更加精彩地展开了。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重。摆在 3 万红军面前的最迫切问题，就是如何摆脱国民党 40 万军队的围追堵截，争取主动，不然，就不能实现北渡长江，进军川西或川西北的战略方针，就无法保存军力，待机反攻，就难以求得尔后的胜利和发展。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新的战略方针，一反在第五次反“ 围剿 ”中阵地战的原则，指挥红军在云、贵、川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运动战。

土城战役，由于敌情不明和轻敌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再战不利，主动撤出战斗。据此，中革军委决定，由原定经土城、赤水直趋西北渡江的路线，改为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的计划。从此，开始了红军战争史上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

1 月 29 日，中央红军分三路从元厚（猿猴）场、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这时，川敌 8 个旅分路向红军追截，并沿长江两岸布防；薛岳兵团和黔敌也从贵州分路向川南追击；滇敌 3 个旅正向毕节、镇雄急进，企图截击红军。2 月 2 日，红一军团先头第 2 师进攻叙永不克，后卫第 1 师在三岔河遭敌截击。此后，在西进中，红一军团又先后遭敌截击。红三军团也在天堂坝与川敌 2 个团发生战斗。

鉴于敌人已加强了长江沿岸防御，以优势兵力分路进逼，红军从泸州上游渡江已不可能，中革军委遂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方针。并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川敌，改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集中。

此时，蒋介石为了加强“ 追剿 ”，下令将第 1 兵团改为第一路军，何键为总司令，刘建绪为前线总指挥，除以一部在湘西“ 围剿 ”红二、红六军团外，以一部策应第二路军行动以薛岳兵团和滇黔两省军队组成第二路军，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线总指挥，辖 4 个纵队，以吴奇伟 4 个师为第 1 纵队以周浑元 4 个师为第 2 纵队，以滇军孙渡 4 个旅为第 3 纵队以黔军王家烈 5 个师为第 4 纵阿，与川军潘文华部一起，专事“ 围剿 ”中央红军。并于 5 日责令各路军跟踪穷追，妄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接着，各部敌人蜂拥而至，向红军逼进。

为避强击弱，脱离川敌与滇敌之侧击，中革军委决定，争取渡河先机，准备与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迅速东渡赤水河，向敌人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展战局。据此，红军各部于 2 月 11 日分 3 个纵队，

由扎西地区突然掉头东进，于 18 日至 21 日分别由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向敌人兵力比较空虚的桐梓地区疾进同时以红五军团的 1 个团伪装主力向温水开进，以吸引追敌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完全出敌意外。川军 3 个旅慌忙由扎西附近地域向东追击，但是已落在红军后面 3 至 4 天的路程，这为红军攻占桐梓、娄山关赢得了充裕时间。黔军急忙抽调遵义及其附近的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第 1 纵队第 59 师、第 93 师由黔西、贵阳地区于 24 日向遵义开进，妄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

24 日晚，红 1 团袭占桐梓，黔军 2 个连弃城逃跑。次日下午，红军第 13 团在红花园与黔军 1 个团遭遇，将其击溃，该敌退守娄山关，红军乘胜追击，攻占娄山关部分阵地，歼敌一部。这时，进入娄山关地区之黔军 3 个团，企图凭险阻红军南下，掩护遵义，以待薛岳部来援。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以红军一部阻滞四川追敌主力，坚决消灭娄山关之敌，乘胜夺取遵义城，以开展战局。为此，红一、三两军团及干部团统归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于 26 日迂回攻击娄山关、黑神庙之敌，坚决消灭之；红五、九军团主力 26 日移至官店，其 2 个后卫团分别在温水与新罗坝两地阻击川敌，保障主力部队攻歼娄山关地区之敌。

26 日，王家烈在蒋介石务必确保遵义的严令下，以 3 个团固守娄山关、板桥地区。红军于当天拂晓对敌第一线 2 个团发起猛烈攻击，经激烈战斗，攻占了娄山关的制高点——点金山。

娄山关位于遵义、桐梓两县交界处，雄踞大娄山脉的最高峰，是川、黔交通的要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敌人为夺取失去的阵地，组织了多次反扑，均被击退。接着，红一、红三军团分别从两翼向敌后方阵地黑神庙、板桥迂回，断敌退路。残敌惧歼，仓皇向遵义逃窜。红军乘胜追击，在遵义以北的董公祠、飞来石地区击溃黔军 3 个团的阻拦，28 日重占遵义，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一线高地。王家烈率残部犹如丧家之犬，向忠庄铺方向溃退。这时，敌第 1 纵队第 93 师已进入忠庄铺地区，一部到城南的洛江桥；第 59 师已进至新站，正向忠庄铺开进。中革军委决心乘援敌孤军冒进，而尾追之敌又被阻于娄山关以北的有利时机，集中全力求歼援敌。

28 日上午，敌第 59 师主力和第 93 师 1 个团向红花岗、老鸦山攻击，黔军 2 个团沿公路东侧向北攻击，配合第 59 师行动；第 93 师主力和第 59 师 1 个团在忠庄铺地区为预备队。11 时许，敌吴奇伟纵队首先以 1 个团向红一军团红花岗阵地进攻，被击溃后，又以主力向老鸦山进攻，经激烈争夺，敌暂时攻占了老鸦山制高点。沿公路前进的黔军，因屡遭重创，行动迟缓，红一军团主力乘机从水师坝地区迂回敌人侧后，迅速击溃黔敌的抵抗，直插忠庄铺吴奇伟指挥部。在红军猛烈攻击下，吴奇伟率第 93 师残部约 1 个团向滥板凳方向逃窜；王家烈率残部向打鼓新场方向溃逃。红军不给敌人喘息之机，跟踪猛追，并以一部取捷径先敌占领了滥板凳。吴奇伟弃甲曳兵，狼狈不堪，率先逃过乌江，不等全部人马过江，即下令截断江桥的铁索，把残部弃在江北，成了红军的俘虏。此时，滞留在老鸦山地区的第 59 师见指挥官已逃之夭夭，被迫转入防御。黄昏，红军干部团从正面投入战斗，红一军团一部从红花岗迂回攻击敌侧后，红三军团全力反击，夺回了老鸦山制高点，敌第 59 师开始向西南溃退。红军衔尾追击，歼其大部。在进攻遵义的战斗中，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牺牲。

遵义之战，红军在 5 日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歼灭和击溃敌人 2 个师又 8 个团，毙伤敌 2400 余人，俘敌约 3000 人。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是中革军委和毛泽东正确指挥的结果。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获得了物资补充，严重挫败了敌人，特别是打击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气焰，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国民党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使国民党军在一段时间内不敢轻进。

鉴于此役与湘江之役的巨大反差，红军指战员一扫失望的情绪，欢呼雀跃，情不自禁地把毛泽东称为“毛大帅”，活着的“诸葛亮”。毛泽东的心情也为之一振，诗兴勃发，写下了长征开始以来第一首格调高昂、音韵激越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红军遵义大捷后，蒋介石焦虑不安。3 月 2 日，他飞往重庆，亲自策划对红军新的围攻，妄图采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南北夹击的战法，将红军消灭于遵义、鸭溪地区。为此，他令川军 3 个旅由桐梓向遵义地区进攻；上官云相部 2 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南下遵义。第 2 纵队 3 个师进至仁怀、鲁班场地区，暂取守势；第 1 纵队 4 个师位于乌江南岸隐蔽待机；第 3 纵队 4 个旅进至大定、黔西地区防堵；第 4 纵队一部集结打鼓新场、土城等地，阻红军向西发展。同时，命令第 53 师由镇远向石阡推进，湘军 3 个师沿乌江东岸筑碉，阻红军东进。

3 月 5 日，中革军委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敌向东，主力则由遵义地区西进，寻歼敌第 2 纵队。红军多次寻战，敌人只守不攻。尔后，红军一度欲歼黔敌于打鼓新场等地，因情况变化亦未得手。

红军在遵义西南地区活动近一个星期，使敌人产生了错觉。蒋介石认为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政方针未定的表现”，“今后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遂督令各部加紧推进。

3 月 15 日，红军集中主力对鲁班之敌第 2 纵队进攻，由于 3 个师挤在一起，攻击未能奏效，而援敌已经靠近。为争取主动，红军遂转兵西进。16 日，红军在茅台附近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接着，攻占镇龙山，击溃川敌一部的拦阻，进至大村、两河口等地。

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故急忙调整部署，令其所有在该区的所有部队向西北，以川南为目标进行追堵，妄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

据此，中革军委当机立断，秘密迅速坚决地出敌不备折而向东，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为了迷惑敌人，红军以 1 个团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主力则由镇龙山地区秘密北上，然后突然转向东进。3 月 21 日晚，红军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即四渡赤水，并从敌重兵的右翼分路向南急进。进至遵义至仁怀大道北侧，准备在运动中歼灭追敌一部，以开展战局。

3 月 24 日，蒋介石飞抵贵阳，亲临督战，妄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由于敌人大军云集，不易分歼，中革军委遂以红九军团暂留马鬃岭地区，积极向长干山、枫香坝之敌佯攻，引敌北向；主力则乘敌人尚未查明红军企图之际，继续分路向南急进。28 日，红军主力由鸭溪、白腊坝之间突破敌人封锁线，于 31 日南渡乌江，进至息烽西北地区，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把敌人

重兵集团抛在乌江以北。

红军南渡乌江后，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狗场、扎佐，前锋直逼贵阳。这时，敌人在贵阳及其周围只有正规军 4 个团，势单力薄。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睡不安席，食不甘味，焦急万分，一面命令各部队火速开贵阳“保驾”，一面下令守城部队死守机场，并准备了轿子、马匹、向导，随时准备逃跑。同时要各国教士和一切外国人，离开贵阳前往安顺。

为了进一步使敌人判断失误，红军主力还在清水江西岸，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以少许兵力东渡，向平越方向积极活动，同时在清水江架设浮桥，虚张声势，伪装东渡模样。蒋介石果然又一次中计，认为红军将东渡清水江，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遂令大军进行追堵。4 月 7 日，红军主力被红军吸引到贵阳以东及乌江沿岸。中央红军在广阔的战线机动作战，使敌军摸不清红军的方向，扑朔迷离，“追剿”计划屡屡落空，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红军“或东或西，时进时退，使我们不易判明他们的企图。”

此后，中央红军又乘虚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待敌人追至金沙江边时，红军已安然过江，他们除了拣到红军丢弃的破草鞋外，一无所获，只有面对滔滔不息的江水，望而兴叹！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下，以 3 万多人的劣势兵力，在 3 个多月中纵横驰骋于川滇黔地区，四渡赤水，威逼贵阳，巧渡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从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国民党军数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滇黔边的反革命计划，夺取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为红军进军川西北创造了条件。这是毛泽东平生的“得意之笔”，是其高超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是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王动的光辉范例。

对于毛泽东和红军的这一“杰作”，60 年来，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与讴歌它，其中有战史、小说、诗歌、戏曲和影视等，仅诗词便不胜枚举，如：“大军西去陷重霾，折将亡兵甚可哀。遵义城头旌帜舞，娄山关上曙光皑。擎天巨手迎狂浪，撼地英雄斗独裁。四渡赤河开画卷，长征万里史诗来。”以及“虺江四渡自惊心，袖里珍奇妙入神”，“惑敌布疑跨赤水，军威重整渡川江”，“金沙赤水奇兵出，从此神州涌巨澜”，“雄关踏遍频频捷，赤水回旋出出奇”，“金沙赤水神兵跃，毛公指向顽军却”等等，充分展示了它在战争史上的崇高地位和不朽价值。

红军强渡嘉陵江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经过反敌“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以及广昭战役，消灭敌人近 10 万人，巩固与扩大了苏区。1935 年 3 月，红四方面军为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巩固和扩大川陕苏区，决定发起嘉陵江战役。

嘉陵江发源于陕西省凤县嘉陵谷，系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自四川南部县以北的上游，水流湍急。国民党川军邓锡侯第 28 军和田颂尧第 29 军共 52 个团布防于广元至南部长约 300 公里的西岸，企图凭借嘉陵江以及剑门关天险，扼住红军西进的道路。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根据国民党军的部署特点，决定集中主力，选择守敌防御薄弱部位，实施多路而有重点的突破，尔后向两翼及纵深发展，进占嘉陵江、涪江之间广大地区，争取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

具体部署是：以红 30 军实施主要突击，从苍溪以南塔子山附近突破，消灭敌人守军后向剑阁方向发展进攻，并协同红 31 军消灭剑门关守军；以红 31 军从苍溪以北鸳溪口突破，尔后消灭剑门关守敌，并迅速向广元、昭化方向发展，主要打击邓锡侯部，并阻止甘南国民党军第 11 师南下，保障右翼安全；以红 9 军于阆中城以北涧溪口突破，再以一部协助红 30 军发展进攻，另一部消灭南部守军，保障左翼安全；以红 4 军为第二梯队，相机支援第一梯队，待第一梯队渡江成功后于苍溪渡江，一部协同红 9 军消灭南部县守军，主力向梓潼方向发展。

渡江战役发起前，红四方面军各部进行了充分准备，并于 3 月 5 日、11 日攻克仪陇、苍溪两城，扫清了渡江障碍。28 日晚，强渡嘉陵江战役开始。红 30 军一部在苍溪城南塔子山附近秘密偷渡，迫近对岸时，被守军发觉，突击部队在炮火支援下强行登岸，全歼守军 1 个营，夺占滩头阵地。29 日拂晓，红 30 军相机投入战斗，攻占西岸飞虎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并击退援敌 1 个旅。与此同时，红 31 军在苍溪城北鸳溪口强渡成功，迅速夺占险要阵地火烧寺，击溃守军 1 个旅，直插剑门关。红 9 军一部在阆中城北涧溪口顺利渡江，并攻占阆中。第一梯队占领西岸要点后，不待敌人喘息，迅速向守军纵深及两翼发展进攻。第二梯队红 4 军从苍溪渡江加入战斗。红 9 军一部击溃守军 2 个旅的阻击后向南猛插，在红 4 军一部配合下，攻占南部县城。红 30 军及红 9 军另一部攻占剑阁后,红 30 军一部和红 31 军攻占战略要地剑门关，全歼守军 3 个团，接着。日夜兼程，于 4 月 3 日攻占昭化县城。

川军遭此严厉打击后，第 29 军退守射洪、盐亭、三台，第 28 军主力退缩广元及其以北地区，另一部布防梓潼、江油、中坝等地。据此，红四方面军决定集中兵力歼灭梓潼、江油地区之敌，并伺机向川甘边发展。10 日，红四方面军主力攻占梓潼，包围江油县城，前锋直逼战略要地中坝。邓锡侯慌了手脚，亲率 10 个团，在飞机掩护下援救江油。红四方面军留一部继续包围江油，大部部署于江油以南打援。14 至 15 日，红军在江油以南击溃援军 10 个团，接着，连克中坝、彰明。红 30 军一部溯白龙江而上，于 10 日攻占青川，继又挥戈北上摩天岭，歼胡宗南部 1 个营，14 日攻占平武。红 4 军一部于 21 日攻占北川。至此，嘉陵江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历时 24 天，共歼国民党军 12 个团约 1 万人，攻克县城 8 座，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自梓潼，北抵川甘边纵横各 100 公里的广大地区，为红四方面军向川甘边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从战略上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

在红四方面军主力强渡嘉陵江期间，张国焘决定撤出川陕苏区。方面军后方机关、中共川陕省委机关、第 33 军和地方武装及部分地方干部，陆续撤到嘉陵江以西，仅留下 300 余人，在刘子才、赵明恩带领下坚持斗争。在张国焘的指使下，撤离苏区时不适当地实行“坚壁清野”，给人民的财产造成了损失。留在川陕苏区的部队，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英勇不屈，坚韧不拔，同敌人展开了持久的斗争，红旗始终不倒，坚持到抗战全面爆发。

从此，红四方面军主力开始艰苦曲折的万里长征。

川西鏖兵七十天

就在徐向前总指挥率领四方面军主力于 1935 年 4 月上、中旬攻打彰明和

江油中坝等地，横扫涪（江）嘉（陵江）流域敌人的时候，留在后方的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对革命形势作了极其悲观的估计，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指挥东线红军和后方机关“大搬家”，跟着渡江西进。

他们迟迟上不来，部队只好在嘉、涪一带地区停留，难以北上甘南发展。

蒋介石，自认为是徐向前的老师，如今输在了学生手里，觉得大丢脸面。他看到红四方面军在嘉、涪一带停留，认为机会来了，忙命胡宗南趁机作了周密的部署和充分准备。他要在这儿再和学生斗一斗法，看看谁高明。

蒋介石此时当然不会知道红四方面军内部的情况，不知道是张国焘的错误使他赢得了时机。但是，蒋介石的布置，加上张国焘的错误，不仅使红军失去了战机，破坏了红军原定迂回碧口，抄胡宗南后路，进取甘南的作战计划，而且使整个方面军陷于失去根据地依托的不利处境。

邓锡侯回到绵阳后，一面以防空空虚，连电蒋介石、刘湘呼援；一面约集所部师长黄隐及孙震和孙部的师长王铭章、曾宪栋等在绵阳开会，首先判断红四方面军的行动。经过反复研究，一致认为：

红军似想调动白河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南下，以便乘机北出陇南或汉南，向西北行动，打通国际路线。这一行动是川军共同的愿望，应给红军以便利。但红军控制了江油、中坝以上的涪江，亦可能由安县、绵竹直趋川西平原，在这一人口集中、物资丰富地区扩军、补给。这一行动与川军各部矛盾较大，应全力阻击。

会议讨论认为：屯区为藏区，汉藏历代相仇，断定红军不会走此“绝路”。会议更没料到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在懋功会师。但以屯区为邓军防区的重要部分，有森林、金矿等财富，且土门易守难攻，封锁土门，亦可防止红四方面军由茂县南出彭（县）崇（宁）或汶（川）灌（县）直下平原。因而会议决定：以一部封锁土门隘路口。

邓锡侯对第 1、2 路军作了如下具体部署：

由第 28 军抽调一部兵力封锁土门、干沟，第 28 军主力和第 41 军全部沿土门以下、北川河右岸构筑阵地，阻击红军直下川西平原。

电调隔离在广元受杨荣向指挥的第 28 军撤离广元，开放红四方面军北出陕南的通路，同时增强北川河谷兵力，阻击当面红军南下川西平原。

邓锡侯、孙震把有意开放广元这一点，说成是为了集中兵力阻击当面的红军，把封锁土门、全力守备北川河的作战方案，正式向刘湘和蒋介石的参谋团呈报。而刘湘和参谋团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表示加以支持。

刘湘此时对红四方面军的判断与邓、孙大体相同。此时刘湘已将省政府由重庆搬至成都，更需要屏蔽川西平原。即令许昭宗纵队尾随红军之后，不可逼得太近；向北不得超过剑阁、重华，便利红军离川北上。第 6 路军王缵绪部，逐次向罗江、绵竹转移，部署二线阵地，保存实力，让邓、孙在北川河谷与红军对阵，待邓、孙支持不了的时候，以许绍宗部尽全力阻止红军下坝。

蒋介石的参谋团到 4 月下旬，也没有料到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在藏族的高山地区会师。

一、命邓锡侯特别加强土门、干沟的封锁。邓、孙两部以全力扼守北川河谷，从土门至青莲渡构筑坚固阵地，指定由邓锡侯统一指挥。第 1 路军总指挥部移驻绵竹，第 2 路军总指挥部移驻安县。

二、以中央军胡宗南部攻击白河以南地区的红军，进出青川、古城和平

武乡之线，堵住红军，不让其向甘南和陕北，务将红军抑留在川境，西侧利用横断山脉，作成袋形阵势，以图消灭红军。

三、迫使刘湘主力由昭化、梓潼向南坝、中江正面，从袋口越涪江，替其火中取栗，在涪江、北川河三角地区歼灭红军。

根据以上形势，红四方面军为打破蒋介石的合围，迎接中央红军，决定西出土门，迅速占领岷江流域的松潘、茂县（今茂汶羌族自治州）、理番（今理县）、汶川地区作立脚点，实现两方面军的会师。

红 30 军 88 师和红 9 军 25、27 师等部队，在徐向前总指挥的亲自率领下，于 5 月初由江油地区进入北川河谷。

从北川进入岷江流域，要经过山谷交错的山区。山的高度由东向西逐渐增大，自徐师岭及其以北至龙溪堡、高山堡，便形成横断东西、绵亘相连的高山山脉，不少地方是悬岩绝壁，且是深山老林。真是“一山来了一山迎，只堪入画不堪行”。只有土门、干沟、土地岭，才有一条长隘路通向茂县。红军西向岷江地区，北川、土门的一条长隘走廊是必经之路。

红军西进之时，正是初夏，天热多雨，山路崎岖泥泞，江河水位增高，北川河、湔江和它的数条支流，看起来河面很窄，但水深流急。两岸又多为悬崖峭壁，人一般难涉水过去，又很少见渡船，河上大都是铁索桥和竹索桥。这不仅给部队展开兵力发动进攻形成自然障碍，就是大部队行军也十分艰难。

由红 30 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领的 89 师由平武，红 4 军一部从彰明出发，进入北川河谷，向墩上守敌发起进攻，击溃敌陶凯所部 1 个团。然后又在东狱官一带歼敌李炜如所部 1 个团，追击逃敌于凉风垭。于是红军打开了突破口。

5 月 3 日后，徐向前总指挥率方面军主力到达北川河谷，即与先头部队会合，然后展开兵力，以 9 军 25 师和 30 军 88 师作为主攻部队，开始向漩坪、伏泉山一带的守敌展开激烈进攻。

5 月 4 日，红军以优势兵力，包围了盘据在伏泉山上的敌李炜如旅。

这一带的山多呈马鞍形和锯齿形，山头与山头相隔不远，火力可以互相呼应。敌人依仗有利地形，从山脚到山顶，层层设防，又以密集的炮火封锁，一时硬攻难以得手。

88 师政委郑维山和师长熊厚发商量后，决定以 268 团从正面进攻吸引敌人。以 265 团迂回到敌侧后，从敌人认为无法攀登而守备薄弱的一条狭谷绝壁摸上去，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乘势夺取制高点。

265 团接受任务后，由团政委黄英祥带领第 1 营在前，郑维山和团长邹丰明带第 2、3 营跟进。天黑后从敌人防御阵地之间的一条峡谷洼地往上摸。这个地方没有路，尽是密密麻麻的灌木梢子林，或是峭岩。

战士们有的脸被荆棘划破了，手被石笋刺伤了，有的甚至滚到山沟里去，但谁也不呼叫，悄悄地爬起来再往上攀。这样整整用了四五个小时才爬上山顶，凌晨 3 点钟到达主峰。

敌人还在睡梦中，一部分就被红军的手榴弹、大刀送上了西天。敌人压根没有想到，在他们营、连、排层层设防的阵地上，又是半夜三更，会有飞兵自天而降，也闹不清究竟来了多少人。

在混乱的敌群中，只见到处是臂系白布的“夜老虎”（白布是红军夜间的联络标志），到处是闪着亮光的大刀。惊恐的敌人无心恋战，纷纷丢枪弃

炮，四处溃逃，有的跌下悬崖，有的挂在山涧大树上，呼叫救命。

红 265 团一举攻下伏泉山主峰阵地后，一面组织兵力坚守阵地，一面以一部分兵力由山顶向下进攻，配合山下 268 团和 263 团等兄弟部队，对残敌实行两面夹击。

一霎时，山上山下都是红军的红旗和喊杀声，敌人难以招架，争相夺路溃逃，敌伏泉山阵地全部落于红军之手。

接着，红军攻击千佛山敌阵地。

千佛山主峰海拔 2900 米，是北川河谷南侧的最高点和“四川北边屏障”的中心支柱，山势险峻，战略位置重要。突兀高耸的山顶上有一佛祖庙，左右是万仞绝壁，半山腰有一天然石洞，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千佛山主峰守敌是川军豢养的“金堂帮”头目赖金亭，他带着由各地反动民团拼凑起来的“剿共”自卫团和帮会分子，盘据在佛庙，扼守住“天门洞”，配合川军封锁红军前进之路，气焰十分嚣张。

开始，红军从正面仰攻，几次不克，伤亡了一部分干部战士。10 日黄昏后，红军派出一支精干的突击队，携带短枪、大刀、手榴弹，借夜暗由“天门洞”侧后的悬岩攀摸上去，突然出现于敌后，一举歼灭敌人 1 个排，拿下“天门洞”。后续部队也一鼓作气攻上山顶，占领了佛祖庙。

敌人大部被生擒，一些负隅顽抗的被当场击毙，还有不少敌人在惊慌逃命中，从庙后跳崖跌死。

5 月 7 日，国民党军第 6 路军王缵绪之一部进攻彰明城，受到守城红军的反击。王缵绪调游动于安县、绵阳的独立第 2 旅田钟毅部驰赴彰明。田旅于 9 日午后到达彰明城附近，在该地原有第 4 旅王纯一部受用统一指挥。红军工事筑在城的外围，以城为中心，西面依托涪江，形成半圆形阵地。

田旅侦察地形后，作如下部署：第 2 团为右翼队担任城北和城东的攻击，王纯一的 1 个团为左翼队担任城东南的攻击，以第 1 团为预备队，位置于右翼队后山梁上。

10 日拂晓，先由左翼队发起攻击，最初进展较快，至城垣附近与红军形成相持。7 时，右翼队谢团开始进攻，中午攻至城下；此时，空军飞机两架临空作战，向城内红军投弹轰炸，由于威力不大，没发生多大影响。

午后，红军数次出击，最初进展较快，至城垣附近形成相持。

傍晚时分，战斗转趋激烈，谢团第 1 营营长被击毙。当夜红军主动渡涪江撤退，拂晓前全部撤完。

是役，川军被击毙营长 1 人，伤亡官兵 200 余人。

在千佛山东面一线，红 4 军、31 军等部队几经激战，打退和击溃了从茶坪方向赶来的敌增援部队，先后攻占了巴罗山、皇宫山、大坪山等据点要地。

至此，漩坪、伏泉山到墩上、千佛山的阵地连成一气，北川狭谷通道基本上被红军所控制。

攻占千佛山主峰的第二天，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令 31 军一部从桃坪方面赶上来接防，88 师同 25 师、27 师等部队，疾速转兵西趋，夺取土门要塞。

如果说千佛山、伏泉山是成都坝子的“北边城墙”，那位于茂汶、北川、安县交界的土门，则如同坚固险要的“城门”。连绵群峰耸立于北，观音梁子、上下横梁子屏障于南，确为易守难攻之地。

坐阵土门的国民党军第 28 师副师长兼 13 旅旅长陶凯，早在江油中坝战斗中领教过红军的厉害，这次受领封锁土门的任务后，设置了三道防御阵地，

第一阵地重叠配备各种火力，多为路易式机枪和迫击炮，形成密集交叉火力网。

红军经过侦察摸清敌情后，决定集中兵力先攻取敌人的主阵地观音梁子。徐向前总指挥亲临前线指挥，决定 5 月 15 日拂晓发起攻击。攻击部署是先以 265 团 1 个营突袭敌主峰阵地，25 师 2 个团担任正面主攻，27 师一部和 88 师 268、265 团迂回敌南侧，实行包抄。

战斗从一开始就十分激烈。

265 团夜袭一举成功，其他部队按计划行动。山谷里，顿时枪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交织在一起。两小时后，敌前沿阵地被红军突破。红 263 团奉命扼守阵地，阻止敌军。其他部队乘胜追歼敌人。

只见红旗所指之处，部队跟着到达。虽有不少同志倒下，但无一人后退。红军有个营长，一直冲在队伍前面，腿部中弹负伤后，仍不让战士抬下山，坚持伏在一块石头上指挥战斗。268 团有个年仅 15 岁的小司号员，身矮体弱，爬到半山腰时累得喘不过气来，便由一个高个子战士背上，跟随进攻部队前进。

在嘹亮的号声中，红军指战员如虎添翼，纷纷冲向敌群，同敌展开短兵相接的白刃战。鏖战至中午时分，几架敌机临空投弹。因山间多林木岩石，部队易于隐蔽，敌机难以投准目标。有 1 架看上去很小的敌机，为寻找目标，在红军阵地上空超低空飞行，战士们纷纷举枪射击。郑维山从通信员手中接过小马枪，也朝敌机射击。不知是被红军击中还是飞机发生故障，那架敌机嚎叫着撞在对面一座山上堕毁了。其他敌机狂轰滥炸一阵之后，便从山头掠过，朝南飞去。

午后 2 点左右，红军攻占观音梁子主阵地。敌人连续反击，均被击溃。

16 时许，我军兵分两路攻取土门。一路翻越冷水坪，出大沟；一路自老君山直指雨淋磴。这一攻势如同伸出两条铁臂，把包括土门在内的敌军右翼阵地团团围住。这时，占领墩上、桃坪等地的红军部队也赶来支援。形成了两路夹击敌人之势。防守土门右翼阵地的敌人，共 5 个团由陶凯亲自指挥。战斗一经打响，敌阵地即被突破。红军迅速分割包围，守敌各不相顾，纷纷乱窜奔逃。

土门这一带地方，多老林丛，古树荆藤，人钻进去，很不好寻。有的地方，尽是密密麻麻的箭竹林，只有砍竹开路才能前进。敌人分散钻入竹林丛中，这样就很难成建制地全歼敌人，抓获更多的俘虏也困难。

战斗持续到第二天早上，红军终于全部摧毁敌人土门封锁线，陶凯率残部狼狈逃窜。敌人苦心经营的土门封锁线被摧毁，整个北川土门通道掌握于红军手中。

5 月 15 日晚，川军第 6 路军张竭诚旅向月儿门移动，于渊旅向大坝场移动。

在同一晚上，蒋介石的参谋团严电刘湘饬第 1、2、6 各路军限 5 月 17 日总攻伏泉山、千佛山红军阵地，进出漩坪、土门之线，重新封锁土门，截断红四方面军向岷江流域西进。

邓锡侯、孙震、王缵绪不敢怠慢，立即在安县会商，以变化太快，时间太促，决定推迟一日，在 18 日拂晓总攻，全线同时开始。

5 月 18 日拂晓，川军全线发起总攻。白家林正面之第 6 路军第 3 旅第 9 团团长王三友因正面狭窄，不能展开 2 个团，乃以第 8 团在前，第 9 团在后，

采用纵深配备的轮番攻击，9 时攻至白家林，在红军猛烈火力射击下，黄柏光第 8 团畏缩不前，第 9 团接替第 8 团，11 时攻下白家林。敌第 2 营占领右前方元宝山，王三友率 2 个营正面继续攻击大垭口，约在 14 时接近大垭口鞍部。

红军在侧射火力掩护下，进行反攻。敌第 8 团伤亡惨重，团长王三友先是腿部受伤，15 时，王三友腹部中弹殒命，正面 2 个营溃下，跳岩跌死跌伤者甚多。接着，红军集中火力攻击敌第 2 营，2 营随之溃退。

敌第 9 团除团长被击毙外，伤亡官兵约 900 人以上。

川军第 2 路军王铭章正面的攻击并不激烈，也无进展。

第 1 路军游广居所部因正面红军兵力大，而大坪、皇宫山阵地突出，不敢再进，而对当面红军阵地放了一些枪，佯作攻击，基本上并未出动。只有卢济清指挥傅汝洲、陈相楷 2 个团攻击包箩山，当面金竹丛生，无路可行，一面砍竹开路，一面前进，进至山腹，面对悬崖，高不可攀，上面也无红军，落得隔山观战，一直见到刘兆藜的第 9 团溃败，才退回原阵地。

第 6 路军张竭诚旅，经过半日战斗，攻下大石坝，推进至鹦哥嘴红军据点阵地前，就地相持。于渊旅钻山谷迂回，至次日晚一度到干沟，受到红军由水茶店和土门的夹击，伤亡数百，狼狈退回。

川军 18 日总攻，实际只有第 6 路军进攻，而拥有 11 个旅的第 6 路军也只有 3 个旅进攻，除张竭诚旅略有进展外，刘兆藜旅惨败，于渊旅以在干沟被击退告终。

由于川军土门封锁阵地被击破，红四方面军主力长驱西进，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蒋介石的参谋团才发现南北红军意图在于在天、芦以北山区会师。于是命令邓锡侯所部离开茶坪，转移岷江流域堵截。

5 月 21 日拂晓，许绍宗以暂编第 2 师彭韩部和杨晒轩旅之任建勋团，利用江中沙碛作跳板，在江油城的掩护下，由阳亭坝强渡。另一部利用三合场溪作好船筏准备，向中坝强渡。经一度战斗，红军主动撤退。8 时左右，两渡河点的川军先后到达右岸。9 时许红军主动撤江油之围，川军占领塔子山，困在城内 41 天的杨晒轩才与任建勋取得联络。

留在伏泉山、千佛山一线坚守阵地的红 4 军、31 军、33 军，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凭险据守，与敌人浴血拼搏。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等领导，亲临前沿阵地组织指挥，鼓舞士气，扼守阵地，掩护后续部队和党政机关全部顺利通过北川狭谷。

土门战斗，历时 70 余天，吸引了多军十几万人，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行动。

其后，红四方面军由李先念率领部分部队西出迎接中央红军。6 月 15 日和 18 日两支红军终于在达维、懋功会师。

直罗镇战役开新局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胜利到达陕甘苏区，接着同红十五军团会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一、第十五军团，全军共 1 万余人。

革命的大本营转至西北，靠近苏联和蒙古，接近抗日前线，这对国民党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国民党军“西北剿总”决定，以 5 个师的兵力，首先构

成沿葫芦河的东西封锁线，并打通洛川、鄜县（今富县）同延安之间的联系，构成沿洛水的南北封锁线。尔后采取南进北堵、逐步向北压缩的方针，将红军消灭于洛水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10 月 28 日，西线国民党东北军第 57 军 4 个师由庆阳、合水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于 11 月 1 日占领太白镇。南线东北军第 67 军第 117 师由洛川北进鄜县。

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国民党军一两个师，再视机转移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打破敌人的“围剿”，并向洛川、中部、宜君、宜川、韩城和关中、陇东一带发展。11 月 7 日，红一军团由甘泉地区进至鄜县西北的老人仓、秋林子地区，红十五军团攻占了直罗镇以东的张村驿、东村等据点，并以一部兵力围攻甘泉，以调动东北军东进。

11 月 19 日，东北军第 57 军以 1 个师留守太白镇，主力沿葫芦河向直罗镇、鄜县前进，先头第 109 师进至黑水寺、安家川地区，军部率 2 个师进至张家湾东西地区。红军拟乘该军第 109 师突出冒进、骄狂失慎的有利时机，将其歼灭于直罗镇地区。

直罗镇是由甘肃合水通向陕西鄜县大道上的一个村镇，位于葫芦河南岸，南北群山连绵，中间系一条狭长的河谷。这里山势并不险峻挺拔，但道路很坏，车辆不能通过，步兵和驮马行军，只能成一字长蛇阵，不便于大部队展开。

20 日 16 时，国民党军第 109 师在红军警戒部队的节节阴击下，被诱入直罗镇。该师师长牛元峰充任东北军辎重司令多年，没有指挥过多少战斗，接任师长不久即到庐山受训，满脑子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他敢于率部走险路，孤军冒进，在占领直罗镇之前，即拟电向总部和军部报捷，谎称他已占领直罗镇。一到直罗镇，他没有指示部队构筑工事，加强警戒，而是杀鸡、宰牲，庆祝“胜利”。红军当夜将其包围。21 日拂晓，红一军团由北向南，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向直罗镇发起猛攻。国民党军从酣梦中惊醒，十分慌乱，狼奔豕突，均不能脱。牛元峰向军部挂电话，电线已被红军切断。红军很快攻入镇内，国民党军负隅顽抗者被击毙，有的不战而降。第 626 团团长石世安见大势已去，自戕身亡。第 627 团团长郑维藩因伤势过重殒命。牛元峰带领残兵败将突围，像无头苍蝇到处乱撞，最后退到镇内一个小高地的土围子里，准备继续突围。战斗至 14 时，国民党军大部被歼。此时，东西两路援军迫近直罗镇。

红军遂以少数兵力围困第 109 师残部和阻击由鄜县西援的第 117 师，主力向西迎击由黑水寺向直罗镇增援的第 57 军主力。该部害怕被歼，于 23 日下午沿葫芦河西撤，红军跟踪猛追，在张家湾地区歼其 1 个团，其余退回太白镇。由鄜县出援的第 117 师，亦不敢恋战，仓皇逃回鄜县。

23 日晚，牛元峰残部饥不得食，四出寻找死马肉用野火烤后充饥。牛元峰垂头丧气地走到各连动员，说什么今天到了最后关头，只有大家一心，协力拼命突围，除了死里求生，别无他途。午夜时，牛元峰率第 625 团等 500 余人开始突围，并将指挥不灵、心虚胆怯的第 267 团副团长李洁堂枪决，以整顿士气。先头突围的部队一下土围子，便各奔东西，四散逃命。接着，其他突围部队在红军的攻击下，像一窝蜂似的到处乱窜，无法收拾。牛元峰突出土围子时，身边只有四五十人，向西落荒而逃。

24 日拂晓，中元峰残部在沿途零星军民的袭扰下，人员星散，最后牛身边仅剩下副官 1 人，并且精疲力竭。这时，红军一支小部队已经追来，“缴

枪不杀”的声音听得十分清晰。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肯做俘虏的牛元峰将自己的勃朗宁手枪交给副官，并命令副官将其打死。副官沈叔明接过手枪照牛元峰脑后打了一枪，牛饮弹身亡。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红军歼敌 1 个师又 1 个团，俘敌 5300 余人，缴枪 3500 余支，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这次战役，为中国共产党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从而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战斗中，原红八军团政委黄甦牺牲。

土地革命战争中的机会主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八七”会议批判与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后，党内又接连出现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以及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党和红军同这些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克服了他们的错误，保证了党的事业和革命战争的不断发展与胜利，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

1927 年 8 月 9 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肯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提出在一切可能暴动的地方，立刻准备暴动，推翻军阀政权，建立无产阶级及农民政权等正确主张。但它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否认革命处于低潮，因此只强调进攻，没有注意必要的退却。在批判右倾错误时，没有防止“左”的倾向，从而助长了“左”倾情绪的发展，对某些武装起义产生了不良的影响。11 月 9 日，中共临时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通过了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现实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并规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要求各地普遍举行城市暴动，应“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这给党的事业和各地武装起义，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制定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中国共产党于 1928 年 6 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的革命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革命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起义，而不是立即举行全国性起义。坚决反对强迫工人罢工和盲目实行暴动。大会进一步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批判和纠正了“左”倾盲动主义。

1930 年夏，国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红军和革命战争发展的变化。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消耗了反动派的力量，客观上为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造成了有利条件。红军经过 3 年艰苦曲折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进剿”和“会剿”，全国主力红军已发展到 7 万人，地方武装近 3 万人，组建了 17 个军，为红军实行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创造了条件。同时，苏区也有很大发展。但是，从全国总的形势来看，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并未有改变。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对中国革命

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认识不足，片面夸大形势有利的一面，加上强烈的复仇情绪和对革命速胜的渴望，使党内存在着的“左”倾思想又一次抬头，最后形成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

早在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两个《通告》及指示信中，就陆续提出了“以群众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集中农民的武装，编成正式的红军，使“全国革命高潮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等“左”倾口号和政策。1930年2月，党中央向全党发出70号《通告》，提出党在目前的政治路线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党应集中力量，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以后又接连发表文章或讲话，召开会议，提出更加系统的错误主张，并部署贯彻执行。

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实际领导下，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认为“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面前了”，中国革命一爆发就会“掀起世界的大革命”，而中国革命高潮就是全国范围内的“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提出：“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并规定了组织政治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和兵士暴动，猛烈扩大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路线。这标志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已取得统治地位。

中共中央为了实现“左”倾冒险主义政治路线，在军事上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命令红军进攻敌人控制的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要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组织行动委员会，强调组织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李立三还强调立即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集中统一指挥全国武装起义。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使党和红军受到了严重损失。毛泽东领导的苏区和红军对立三路线没有机械执行，使红军不但免遭损失，而且还有很大发展。

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

红军和苏区接连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以及“九·一八”事变激起的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造成了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新形势。在胜利和形势有利的面前，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头脑发热，全身膨胀，他们打着“拥护国际路线”和“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号，在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中央的统治，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左”倾路线，它统治中央4年之久，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危害。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由王明起草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过分夸大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断定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要求苏区的党和红军“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要“红军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不要再重复胜利后休息”。这个决议，不仅在政治上发展了王明“左”倾路线，而且在军事上重提夺取中心城市的冒险主张。

1932 年 1 月 9 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进一步发展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对形势作了完全脱离实际的估计，规定长江以南的红军，“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长江以北各地的红军，积极进攻，“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这个决议，完全否定了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标志着王明军事冒险主义战略正式形成。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其主要特征是思想上的教条主义，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行动上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他们完全排斥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制定的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用所谓正规战代替人民战争，以消极防御的方针代替积极防御的方针，以阵地战、消耗战代替运动战和歼灭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进攻中实行冒险主义，搞御敌于国门之外，让红军攻击敌人碉堡林立的坚固阵地；防御中实行保守主义，搞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六路分兵，全线抗击；退却中实行逃跑主义，不作充分准备，仓促转移，视大转移为大搬家，把长征变成长跑。结果中央红军苦战一年，损兵折将，丢掉了苏区，在长征初期继续遭受严重损失，通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红军由开始时 8.6 万人锐减至 3 万余人。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导致临近和其他苏区形势危殆，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

在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红一方面军到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计划，到敌人统治薄弱的贵州，建立新的根据地。1934 年 12 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决定红一方面军西渡乌江，到川黔边建立苏区，避免了红军覆灭的危险。1935 年 1 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遵义会议，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结束了他们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正确轨道，从而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为尔后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胜利完成长征，开创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 年 6 月，红一方面军在懋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两军指战员欢呼雀跃。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调集大批军队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蒋介石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误国政策，一面“围剿”红军和镇压抗日救亡运动，一面对日妥协退让，卖国求荣。国民党政府，通过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出卖了华北大部主权，同时，按照日军的要求，把驻河北的东北军于学忠部调往西北“剿共”。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为解决两军统一指挥问题，实现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保证。但是，张国焘并不满足，自恃人多枪多，向中央讨价还价，借口红军“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按兵不动，并声称下解决这些问题，便“无法顺利灭敌”。

中共中央拒绝了张国焘关于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要求，但为了照顾两军的团结，并肩北上，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同时，决定将红一方面军的军团改称军。后来，中共中央在沙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拒绝了张国焘增补红四方面军干部 9 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8 人）的意见，决定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为了迅速北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还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红 1、红 3 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红 4、红 30 军组成，由中央率领，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的红 9、红 31、红 33 军及红一方面军的红 5、红 32 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朱德为总指挥，张国焘为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右、左两路军分别从毛儿盖、卓克基北上。

左、右两路军通过茫茫草地，分别到达阿坝和班佑地区后，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水涨，不能北上，并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 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企图危害中央。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即报告毛泽东。党中央立即决定率红一方面军的红 1、红 3 军单独北上，并致电张国焘：“ 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9 月 12 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批判了张国焘南下川康边的退却逃跑主义和分裂红军的错误，号召“ 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 ”。

尔后，党中央率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六盘山，胜利到达陕甘苏区，后又经过东征、西征两役和对东北军、西北军统一战线工作，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苏区，发展了红军，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和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张国焘公然违抗党中央的命令，率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两个军，再过草地南下，在卓木碉另立“ 中央 ”，决定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并下令通缉他们，公然走上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道路。在张国焘南下错误方针指导下，红四方面军等部在川康僻地苦战数月，受到严重损失，部队由南下时的 8 万多人剩下 4 万余人。在南下碰壁的情况下，经过党中央和当时在红四方面军中的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任弼时、贺龙等人的促进张国焘在取消伪中央后，才同意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但仍主张北上西进甘、青、新，另创一局面，继续同中央分庭抗礼。后来，由于多方的斗争，终于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 为荣卖国独裁狂，督战临潼气嚣张。华清池畔枪声起魄飞魂散急踰墙。 ”“ 将军捉蒋世人惊，促使和平谈判成。张陷牢笼杨殉国，青松千古树英名。 ”

这两首七绝诗，反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经过和伟大历史作用，赞颂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英雄气概和非凡举动，并为他们的不幸遭遇鸣不平。

在寇深祸急，民族危亡的情况下，蒋介石于 1936 年 12 月 4 日到达西安，逼迫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第十七路军领导人杨虎城进攻西北红军，否则将张、杨部队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张学良、杨虎城为了民族大义，连日对蒋介石“苦谏”，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遭到严词拒绝。9 日，西安学生万余人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提出“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张学良表示在一星期内用事实来回答学生的爱国热忱。

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实行“兵谏”，在西安拘留了蒋介石及其随行军政要员 10 余人，并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切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接着，张学良宣布撤销西北“剿总”，停止一切“剿共”行动，并调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主力于西安附近，以扼控西安，应付时局。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蒋介石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压力，无视国家民族危亡，实行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的结果。同时，也是国民党内部主张全国团结一致的抗日进步力量，同主张联日反共的反动势力尖锐斗争的极端表现。

西安事变后，南京立即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联席会议。决定孔祥熙任行政院代院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剥夺张学良各种职务，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孔祥熙、宋美龄连夜由上海赶回南京，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亲日派头目何应钦亲任“讨逆军”总司令，调动大批军队进逼西安，企图扩大内战并乘机取代蒋介石的地位。新的大规模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全国各救亡团体、广大人民特别是西北地区人民，坚决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之举，强烈要求惩治蒋介石。

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肯定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推动抗日的。决定采取不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暂时不发表宣言。同日，《红色中华》发表西安事变的消息后，苏区广大军民高度赞扬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大智大勇和爱国举动；红军指战员怀着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深仇大恨，要求严厉惩罚蒋介石。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分析了国内形势后，决定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尽力促进事变的和平解决。14 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指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应发动民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学良之八项抗日要求，停止内战的军事行动，把全部军队开赴晋绥前线抗战，保卫晋绥，并要求南京即刻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解决救亡大计。”

同时，中共中央应张、杨的邀请，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为中共中央代表，于 12 月 17 日起陆续到达西安，同张、杨及其他爱国人士共商国是，协助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支援东北军、西北军抗击南京政府“讨逆军”可能的进攻，中央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 28 军向大水坑附近地区出动，以监视和钳制胡宗南军的行动；并根据张、杨的建议，派陕北地方红军接替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收缩兵力后遗留的防务。15 日，陕北地方

红军进驻延长，18 日进驻延安，掩护友军侧翼，监视陕北地区蒋系军队的行动；陕甘宁军区独立师等部，进驻三岔、毛居井、豫旺堡和曲子以南地区，同驻守固原、庆阳等地的东北军靠拢，协调行动；并准备在“讨逆军”向西安进逼时，全部红军迅速南下，协同友军迎击“讨逆军”的进攻。

中共代表到西安后，同张学良、杨虎城等爱国人士反复磋商，统一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和同蒋介石谈判的条件。同时，决定红军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以一部兵力抗击和钳制由天水地区向西安进攻的顾祝同西集团军，集中主力在西安以东地区，同由潼关方向西进的刘峙东集团军作战。随后，红军进行了部署和行动，严阵以待，准备配合友军与“讨逆军”决战。

以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等经过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达成六条协议。蒋介石为了获得自由，被迫接受了谈判达成的协议，宋子文承诺保证实行。24 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当面口头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5 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

惯于食言自肥的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翻脸不认人，审判、监禁张学良，并纵容何应钦再次调集 25 个师，重新进逼西安，压迫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接受其“陕甘善后整理办法”。从 1937 年 1 月起，内战阴云再次笼罩陕甘上空。在此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仍然本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方针，一面致电蒋介石、南京政府和全国各团体党派，促蒋履行诺言，撤兵释放张学良；一面经由中共代表协商杨虎城作好应战准备。

由于陕甘宁苏区的发展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三方军队的迎战准备，加之各方舆论的影响，蒋介石未敢轻举妄动，指派其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和西安方面进行了多次谈判。至 2 月，按蒋介石的条件达成协议；东北军移驻豫旺地区，第十七路军驻防渭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和陇海铁路沿线；政治问题由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解决。

西安事变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始终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竭诚维护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团结，本着进则同进、退则同退、不谋独异、和衷共济的态度，诚恳对待友军。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在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宵衣肝食、唇焦舌敝地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促进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重要贡献。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国家民族危亡之时，深明大义，力挽狂澜，不顾个人和身家性命，发动“兵谏”，为争取全民族合作抗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英雄壮举，丰功伟绩，将永载青史！

许世友挥师开道过草地

1936 年 7 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分成三路纵队，陆续开始北上，与党中央会合。

这次北上，目的很明确，是为创造与巩固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与红一方面军相呼应，坚决抗日，扩大民族革命战争，争取全中国苏维埃的胜利。因而，广大指战员兴高采烈，精神焕发，勇气倍增。

这次北上，四方面军已是第三次过草地了。

为了保证几万人的部队顺利通过草地，四方面军派许世友率领骑兵师提前于 6 月 27 日出发，为部队侦察道路，筹集粮食。许世友，是红四方面军的著名战将，解放后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以其特殊的经历、特殊的性格而闻名

全国。这时，他率领骑兵师 3000 多名骑兵，扬鞭催马，穿山越岭，踏上征程。

骑兵师 3000 多人马，在许世友的率领下，出动了！

嘹亮的军号声，战马的嘶鸣声和“哒哒哒”的铁蹄声，交织成一支动人的乐曲。驰骋的战马，威武的骑兵，耀眼的马刀，构成了一幅万马奔腾的图画。

许世友，这位在中国现代革命战争史上颇具特殊色彩的将领，骑在奔驰的战马上，思考着如何完成筹粮任务。他深知北上征程的艰险，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前两次过草地的苦难经历，使许世友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于是暗暗下决心，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付出多大的代价，一定要筹集到更多的粮食，保证主力部队通过草地。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断了他的沉思，侦察科长向许世友报告：前面不远就是色曲河地区。

他们策马穿过山沟，眼前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景：藏民帐篷像繁星撒落在色曲河两岸；绿油油的草地恰似墨绿柔软的地毯，微风吹过，又如抖动起来的绿色绸缎；一群群牦牛和白花花的肥羊，低着头漫不经心地吃草。

“我们的前方就是大粮仓！”队伍中突然响起一阵此起彼落的欢呼声，骑士们不约而同地纷纷策马飞奔向前。

几千匹马的嘶叫声和万把铁锤落地般的马蹄声，惊动了正在吃草的牛羊，随着阵阵“哞哞”的乱叫，牛羊四处奔逃。牧民们闻叫声走出帐篷，以惊奇、疑虑、恐惧的目光，窥视着这些头戴八角帽，双腿骑在马上，身背钢枪大刀的远方来“客”。

顿时，平静如画的草原男女老幼，议论纷纷，牧民们有的慌慌张张躲进帐篷，有的急促赶着牛羊向就近的沟洼处猛跑，有的恶狠狠地向红军举起了猎枪。

许世友估计群众可能误会了，立即叫司号员发出号令，通知部队停止前进，请几位带路的通司（向导）一齐向牧民群众喊话：

“老乡亲们，不要开枪，我们是北上抗日的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红军是救国救民的‘菩萨军’，主张穷苦人当家作主，反对压迫人民的国民党军阀和帝国主义！”

“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提倡信教自由，保护藏回蒙民的利益！”

“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这个地方距离甘孜不远，群众对红军秋毫无犯早有所闻，一经通司的喊话说明，惊慌、紧张、敌对的气氛很快缓和了下来。

牧民们听说红军要筹集粮食过草地北上抗日，纷纷献出自己的牛羊、青稞、豌豆、酥油、奶渣、土豆……。按当地的价格，许世友命人一一购买，不欠分文。许多群众不愿收钱，战士们再三向他们说明：公买公卖，不侵犯群众的利益，红军有铁的纪律，不容违犯。

第一天的筹粮进行得比较顺利，沿色曲河两岸筹集了 400 多头牛，1000 多头羊，还有一部分粮食。许世友第一次看到，那样大的羊，人骑上去还能跑得很快。有些战士看着筹集到那么多的牛羊，高兴得连马也不骑了，得意地骑着牛羊，唱着牧歌，走在返回驻地的路上。

深夜，窗外雨声淅淅沥沥，奔波了一天的骑士们，早已进入梦乡。许世友和各团的指挥员还在研究第二天的行动方案，从各团汇报的情况看，筹集

的牛羊和粮食还远远达不到上级的要求。从一般牧民群众那里虽然可以筹集到一些牛羊和粮食，但数量很有限，而占有大批牛羊和粮食的土司头人，大多不愿出卖，或者勉强卖给，也是少量的，还是完不成任务。红军既不能强买，更不能去抢，只能做耐心细致的宣传说服工作。

许世友决定第二天再找土司头人交涉。

刚刚躺下休息大约半小时，骤然而起的一阵枪声把许世友惊起。哨兵大声说：

“师长，反动土司兵来袭击我们了！怎么办？”

许世友出门一看，反动土司兵正像一群野鸭子似的扑来。看来，这些反动土司软的不吃要吃硬的，许世友立即指挥部队上马出击。

这些是反动土司豢养的武装，以能骑善射著称。但他们毕竟是乌合之众，没有策略，不懂战术，只懂吃喝嫖赌。骑兵师一次飞马冲杀，就把他们打得像受惊的野鸡，纷纷逃生。

被抓到的几个俘虏，供出了反动土司的牛羊秘密转移点。许世友立即率部连夜搜索，按方面军总部规定“破坏抗日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财产一律没收”的政策，把反动土司的 8000 多头牛羊全部收缴。

骑兵师在许世友的率领下，继续北上，7 月 13 日顺利抵达阿坝。

阿坝位于大草地的南部边缘，是红四方面军过草地的必经之地。这里的土司头人叫墨桑，极其反动。他获悉红军要经阿坝北上，阴毒地把当地的群众统统赶走，将粮食和牲畜全部转移到外地去了。

当许世友骑马进入阿坝时，只见镇内大街小巷都空荡荡的。好容易找到两个年长的藏民，了解到一些敌情。

藏民们轻声告诉许世友：

“土司有好几千人的武装，武艺高强，横行无忌，无恶不作。他们夜间射击比赛打香火，有的连打三枪不中，即被视为废物，装进麻袋投入河中，不准抢救。”

依据藏民提供的情报，许世友决定分兵搜查，从洞里、地窖里找到了隐蔽的 600 多头牛羊和 1 万多斤粮食。但始终未发现土司武装。

15 日，天下着毛毛雨，骑兵师继续向东前进。抵达麦加而康、觉儿黄、赛苟共巴地区时，风停雨住，太阳西沉。

突然，约千米处火光闪闪，狼烟滚滚，不时还传来战马的嘶叫声。经派便衣人员侦察，始知那是驻扎的土司武装部队，约四五千人，正在围火做饭烤绵羊肉吃。这样多的土司武装，屯住在阿坝通往查理的要道上，显然是妄图阻滞红军前进。

必须搬掉这块“挡路石”！

但是号称人马 3000 的骑兵师，经过长途征战，已经有大量的减员，若硬拚，势必付出较大的代价。因此对摆在面前的敌人，最好智取，不宜强攻。

说起许世友，在一些人看来，他仅是靠着一身高强的武艺和不怕死、敢冲锋建立了赫赫战功。其实，古今中外的任何战将，仅靠匹夫之勇，都难以建立显赫的功业。还必须足智多谋，善于指挥。许世友也是一个善于谋略的人，他和参谋长召集 3 个团的团长商量后决定，趁敌人尚未发现红军行迹，毫无戒备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采用奇袭的战术破敌。

夜，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骑兵师分多路迅速隐蔽地接近敌营。

敌兵们喝得昏头昏脑，为驱赶来偷食的野兽，在周围点起了无数的小火

堆，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蒙头大睡，马匹零零散散地拴在中间的野藤上。

预定的时间到了，许世友命令吹响攻击的军号。随着号音，指战员们鞭催战马，首先扑向火堆，甩出一批手榴弹，随着爆炸声，燃烧着的火焰腾空而起，火星直冲天空。敌人的马匹被炸惊了，嘶鸣着四处来回乱窜。许多敌兵当场被炸死，没被炸死的，也被惊马踢、踩得叽哇乱叫。

许世友高举鬼头大刀，率队左冲右杀，上劈下砍，将敌人大部歼灭。

这是骑兵师组建后打的最大的一仗，也是最顺手的一仗，缴获了近百匹马和一批枪枝弹药及食物。

红军这支组建不久的骑兵部队，一路上经过大小 72 次战斗，没打过败仗，虽然最后只剩下 200 多人，也不是盛名之下的那个骑兵师了，但为后面前进的大部队筹集了二三万头牛羊和大批粮食，完成了上级赋予的“筹集粮食，侦察道路”的光荣任务。

张学良身边的共产党员

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毅然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几十年来，张、杨两将军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千古功臣，参与西安事变的许多人物，亦常见诸报端。然而，有一位与张学良有着特殊关系、运用特殊方式为西安事变做出特殊贡献的人物，至今尚鲜为人知。

此人就是解方将军。全国解放后，他曾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任参谋长，协助彭德怀元帅统领百万大军；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是刘伯承元帅的得力助手。“文革”后，又任解放军后勤学院副院长。西安事变中，他是张学良将军的联络参谋，中共地下党员，时年 28 岁。

要叙述解方这段经历，不能不先交代一下他和张学良的关系。解方原名解如川，字沛然，1908 年生于吉林省东丰县一个地主家庭。他资质聪颖，记忆惊人，4 岁开始读书，14 岁考入奉天三中，与张学良之弟张学铭为同学。当时，奉天三中是重点中学，以办新学著称。解方思想敏锐，成绩优异，为人谦和，性格活跃，打球、游泳、演戏，样样拿得起来。入校不久，便成为学生中的佼佼者。

1927 年初春的一天，即将高中毕业的解方正在宿舍看书，一位同学找到他说：“沛然，张大帅要送一批学生到日本学军事，张学铭也去。他让我转告你，最好能和他一起去。”

听到这个消息，解方颇感惊讶。他和张家素无联系，虽说和张学铭是同学，但不在一个班，平时也没有交往。此事又从何说起呢？思忖片刻，他让那位同学转告张学铭，自己准备报考医科大学，将来当个医生，济世救民。

张学铭得知解方的想法后，径直来找他，热诚地说：“沛然，同学中我最佩服的就是你。我们一起去，相互有个照应。学成回来，也好共同为桑梓出力呀！”见解方沉默不语，张学铭便把张学良搬了出来，“我已把你的想法告诉了大哥，他让我转告你一句话。”

解方曾在奉天的一些集会上见过张学良。这位 20 多岁的将军，英气勃勃，风流倜傥，是东北青年人的偶像。听说他对自己有话，忙问道：“汉卿将军有何指教？”

“他只说了四个字。”张学铭一字一顿地说，“大医医国！”

“大医医国？”解方不觉心头一悟，陷入了沉思：当今国家内有兵连祸结，外有强敌欺凌，人民身处水火，苦不堪言。张家父子为振兴东北集团，官费派留学生赴日本学习军事，看来是想整军经武，有所作为。自己体格强健，精力旺盛，如果能学一身本领，将来为外御强敌，内平战乱作出一番事业，也不枉为七尺男儿啊。想到此处，这个处事果断的年轻人一改初衷，当即表态：“行，我去。投笔从戎，效命疆场！”

很快，他和同学孙铭久陪同张学铭乘船东渡，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1930 年，解方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

此时，张学良由于东北易帜有功，后又在蒋、冯、阎大战中提兵入关，支持了蒋介石，已被蒋任命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北平分会委员会会长，掌握了东北、华北军政大权，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他安排张学铭为天津市长兼警察局长，解方也担任了天津特务总队主任。他和贾陶、孙铭久等协助张学铭大刀阔斧地整顿保安队，令世人刮目相看。1931 年底，他们成功地粉碎了日寇在天津的暴动阴谋，受到张学良的嘉许。1934 年初，张学良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时，又安排解方在东北军 51 军参谋处当科长，实际为张的联络参谋，并交待军长于学忠、参谋长刘忠干，要解方参与中枢，所有军中要事通过解方与他联络。解方也以他勤业谋事的干练进一步得到张学良的器重。一时间，年轻的解方成了东北军中的佼佼者。

可是，面对中国的现实，喜读书、爱思考的解方不但没有踌躇满志的感觉，思想上却越来越苦闷了：张学良一失东北，二陷热河，当了蒋介石的替罪羊，受到国人唾骂，仍然执迷不悟。在红军进入西北之后，又被蒋介石委任为“西北剿总”代司令，带领 20 万东北军真刀实枪去打红军。难道他看不清寇深祸急的逼人形势？难道他看不透老蒋坐收渔人之利的险恶用心？每次从兰州 51 军回西安，解方都要对张学良坦率陈辞，而张学良总是说：“要相信我会有办法！”有时说得多了，张就不耐烦地挡回去：“我都知道了！”照这样下去，东北军还有什么希望？个人又能为国家民族做出什么有益的事情？多少个深夜，他苦苦思索，辗转难眠。

1935 年底，张学良派解方到广西考察民团情况。解方从西安出发前，见到了曾在天津共过事的密友贾陶。贾当时担任张学良特务团的副团长。两人谈到当前的形势，贾陶感慨地说：“张副司令就不如李宗仁、白崇禧明白，人家把蒋介石看透了。张副司令才傻呢！‘九·一八’事变听蒋介石的，一枪不放丢了东北，好多部队也没有撤进关里来。现在又执行老蒋的命令，调这么多部队打红军。打又打不赢人家，一接火就丢了两个师。人死了，枪丢了，政府又不给补，我看迟早得把东北军拼光拉倒！”

解方说：“我这两天又详细读了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人家讲的道理，真叫人心服口服！”

贾陶像猛然想起了什么，一拍解方的肩头说：“你说起共产党，有个共产党就在咱们跟前！”

“谁？”

“苗勃然！”

解方一听，两眼射出灼热的光芒。苗勃然是几年前他和贾陶在天津遇到的共产党员。“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和这两个年轻人交谈抗日救国问题，对他们的思想有很大影响。听说苗勃然就在西安，解方如大旱之望云霓，拉上贾陶就赶往东关苗的住处。一见面，他们就把心中的苦闷向苗勃然抖落

出来。

苗勃然首先为他俩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国际国内形势，指出当前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要抗战就必须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亡国政策。接着又详细讲了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讲了东北军抗日复土的使命……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苗勃然对国际国内形势鞭辟入里的分析，共产党救国救民的主张，使解方和贾陶茅塞顿开，当即提出入党的要求。

苗勃然望着这两位热血青年，鼓励说：“你们的愿望很好，只要有实际行动，党组织是会看到的。”

“那就给我们布置任务吧！”

“你们要利用和张先生的关系，经常向他反映东北军的苦处和厌战情绪。张先生聪明过人，恐怕他不肯眼睁睁看着东北军拼完拉倒！”

回到贾陶的庄处，俩人仍然激动不已。贾陶向解方透露说：“这几天，东北军的家属来西安的不少，几乎天天有人来总部门口求见张副司令。我们应该让张副司令听听父老乡亲的呼声。”

隔天，解方按贾陶约定的时间，有意识地把张学良请到总部门前的广场上。广场上黑鸦鸦的人群，全是东北军的家属。女的抱着小该，老的拄着拐棍，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一声声熟悉的东北口音传到张学良耳朵里：

“我们不明白，放着占领家乡的日本人不去打，为什么要跑到这儿来卖命？”

“我们的男人让红军打死了，吃没吃的，穿没穿的，住没住的，张副司令要给我们想办法！”

“少帅不能忘了张大帅是怎么死的呀！”

听着这一声声哀婉、泣诉又带责问的乡音，张学良深深感到愧疚。回到总部，他对解方说：“沛然，我现在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了！我决定把个人积蓄都捐出来，成立难民村，安置这些无衣无食的同胞。”

“这也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关键是东北军今后怎么办？恐怕副司令比我考虑得更多吧！”解方乘机进言说，“我总觉得我们在这里打红军是死路一条，不得人心。东北是日本人抢的，不是红军抢的；老帅是日本人炸死的，不是红军炸死的。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硬要来打人家，这不是毫无道理吗？据我在下面了解的情况，弟兄们都想不通，都说副司令上了蒋委员长的当。要是我们停止打红军，北上抗日，收复失地，我想不光是东北父老拥护，全国民众也会支持！”

张学良沉默片刻，望着窗外说：“沛然，此事我岂没想过？今后你不要多向外人讲。你这次到广西，要特别注意李宗仁、白崇禧对抗日的态度。”

此后，解方奉张学良之命又一次出使广西，与李、白联络抗日大事，并接来李、白的联络员常驻西安。平时，每次从兰州回西安，解方也都按照党的指示向张学良反映东北军官兵打回老家去的要求，鼓动张学良抗日复土。张学良的思想由拥蒋抗日转变到逼蒋抗日，解方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36 年 4 月，张学良在我党多方面力量推动下，飞赴延安，与周恩来作了倾心交谈。周恩来高瞻远瞩的分析，人格的魅力，使张学良大为折服。从而坚定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信心。他下令东北军停止进攻红军，还为红军送去粮食、衣物和银元。应张学良请求，党中央又派刘鼎同志作为常驻西安的代表。

5 月中旬，在刘鼎同志建议下，张学良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镇创办了“军官训练团”，请蒋介石任团长，张自代团长。这个训练团，名义是培养剿共骨于，实际上是在部队中灌输抗日思想，洗刷陈腐作风。

解方被张学良召到西安参加了第一批集训。一见面，张学良就精神振奋地说：“你在奉天、日本上学，都小有名气，这次来训练团更要发挥作用，鼓动大家的抗日情绪，多组织大家讨论，每次讨论的意见都要整理出来送我看。”

解方把这一情况报告了苗勃然。苗首先告诉解方，党组织已于 4 月正式批准他为中共党员，然后又带他到东大街旅社见了党派来做东北军工作的总负责人刘澜波同志。刘澜波当即和解方等分析了张学良政治思想的变化，又研究了党在训练团进行活动的具体措施。

解方进入干部连后，以他坚实的军事功底，积极的抗日思想，很快赢得了学员们的信赖。他还发挥文艺特长，经常在课余时间教大家唱《码头工人歌》、《毕业歌》、《扬子江暴风雨》等歌曲。张学良得知后，高兴地鼓励解方说：“干得好！教唱一首歌，比我讲一次话作用都大！”解方除去教歌，还通过刘澜波从西安搞来一台留声机，天天放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响遍营区的歌声，或悲凉凄楚，或慷慨激昂，深深地打动着青年军官们的心，激发着大家的抗日情绪。

训练团学员住的是土窑洞。每个窑洞，宽约一丈五尺，长约五丈。窑洞里有挖好的土桌、土凳，学员吃饭就坐在这些土凳上。张学良经常来团讲话，吃饭也和大家一样，坐在土凳上边吃边谈。解方每次送给他的讨论意见，他都有亲笔指示，多是鼓励学员们抗日复土的话。解方就把张学良的指示一次次地传达给大家。

5 月底的一天，张学良来团里讲话，解方对他说：“副司令能不能和大家座谈座谈？弟兄们有好多心里话想对你讲哩！”

张学良痛快地答应了。当晚，解方和学员们围坐在张学良周围，讲家乡沦陷后的苦难，讲流浪关内的感受，讲中央军欺负东北军的气焰，讲东北军的前途，不少人讲着讲着失声痛哭起来。解方见群情激昂，便站起来高呼：“请副司令率领我们打回老家去！”

顿时，口号声响了起来：

“我们愿为抗日救国而死！”

“誓报国仇家恨！”

望着一张张激动的面孔，张学良情不自禁，眼泪刷刷地流淌下来。他猛地站起，挥动胳膊大声说：“大家的心情和意见我都理解。请相信我！我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我怎能忘记报仇雪耻，收复失地！大家不要急，要好好训练，作好准备，我一定带领大家走上抗日战场，披甲还乡！如不兑现，学良以头来谢国人！”

会场上，一时掌声雷动。

1936 年 10 月，张学良成立了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亲任会长。刘澜波、苗勃然、高崇民、贾陶、解方、孙铭久等都参加了这个组织。组织成立那天，张学良在他的公馆里带领会员宣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复土雪耻，披甲还乡！会后，张学良留下解方，交待说：“你速回兰州，尽快组建一个抗日同志会兰州分会，要把积极要求抗日的军官组织起来，我随时会给

你们指示。”又取出一本密码本，小心翼翼地交给解方，叮嘱说：“这是和我联络的专用密电码，紧要时刻会用到它。你要切切用心保存！”

解方返回兰州，立即着手筹建了抗日同志会兰州分会。主力团的团长李荫坡、张儒彬等，都被他发展为抗日同志会会员。

抗日同志会成为张学良发动逼蒋抗日活动的核心组织。

1936 年 12 月 12 日。黎明的寒风中，光秃秃、灰蒙蒙的兰州城正在懒慵慵地沉睡。寂静的 51 军军部一角，解方屋里却一直亮着灯光。这位年轻的中校科长思潮翻滚，不停地踱着步子。

这几天，他有点心绪不宁。

7 天前，蒋介石从洛阳来到西安，还带来陈诚、顾祝同、蒋鼎文、卫立煌、刘峙等高级将领。兰州绥靖公署、省党部的高级官员、51 军军长于学忠及该军 113 师师长李振唐、114 师师长牟中珩、118 师师长周光烈，也被蒋召往西安训话。解方从西安至兰州的往来人员口中，隐隐约约得知，蒋准备在西安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拟调其嫡系主力部队 30 万人开入陕甘，企图一举消灭红军。还听说蒋介石对张学良抗日的要求大加训斥，要张、杨服从命令，积极剿共，否则就要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

西安城，蒙上了一层神秘而险恶的气氛！

张副司令究竟是怎样看待当前形势的？解方边踱步边苦苦思索：假如他这次又服从了蒋介石的命令，那国家、民族将跌入苦难的深渊！他又逐项回顾张学良回国两年多来的举措。

“不，张副司令不会轻易受蒋介石驱使了！”可是，如果和蒋闹僵，东北军将向何处去？党的联合抗日的主张又如何落实？解方当时是 51 军唯一的共产党员；此时此刻，他多么期望得到党组织的指示啊！

解方推开窗户，凛冽的寒风钻了进来。启明星已在天边升起，灰蒙蒙的兰州城廓依稀可见。凭窗东望，他猛然觉得应该找个理由赶往西安，观察一下形势，听听刘澜波、苗勃然有什么指示。

他开始做动身的准备。

突然，“笃！笃！笃！”传来一阵紧急的敲门声。

解方打开屋门，只见一位年轻的电报员手拿一份电报，急急地说：“西安急电，让长官亲译！”

解方接过电报，一见那专用密码，立即明白发生了大事。他分秒不敢耽搁，即刻动手翻译。

“军事会议破裂，我与杨主任合作，于今晨 3 时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已将其及中央军政要员扣押……”刚译出这一句，解方便激动不已：“张副司令，干得好呵！”他一拳擂在桌子上，握笔的手也抖动起来。望着长长的电文，他马上又意识到：西安扣蒋，顷刻就会举世皆惊。张、杨如何善其后？兰州为西安后方，张副司令对 51 军有何交待？十万火急，要分秒必争！他立即揣起电报，敲开了通信营长冯梦瑞的门，让冯帮助翻译。冯梦瑞精通电讯，思想进步，抗日态度坚决，经常和解方一起谈论时事。他抢过电报扫了一眼，大喊一声：“嘿！”便和解方分头翻译起来。

随着两支笔“沙沙”作响，译电纸上出现了张、杨给全国的通电以及张学良的命令：

……速转达 51 军，立即在兰配合西安行动，切断绥署与南京之任何联系，将胡宗南部两团、绥署特务营及军统有关武装一律缴械，对重要人员限

制其自由。发表声明拥护八项救国主张……

解方揣起电报说：“梦瑞，刻不容缓，你赶快准备，我这就去报告刘参谋长！”

参谋长刘忠干看过解方送来的电报，不由得脸色突变，口中连呼：“石破天惊！石破天惊！”一时竟呆立屋中。解方见天色已亮，催促说：“参谋长，事不宜迟，快做决定吧！”

刘忠干沉思有顷，脸色恢复了正常。他让解方速请参谋处长张熙光。

张熙光赶来看过电文，定定地望着解方问道：“沛然，你看怎么办？”

解方说；“这是张副司令的命令，自然要坚决执行！”

张熙光说：“用兵动武，事关重大，干了又如何善其后？”

解方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现在木已成舟，我们必须和张副司令同进退。如不先下手，兰州马上就会陷入混乱。兰州是西安的后方，稍有差错，局面就难以收拾！”

张熙光说：“军长、师长都不在，部队执行这样重大的任务，有无把握？”

解方说：“于军长已经在西安参加了扣蒋行动。他一向忠于张副司令，如果他在兰州，也一定会坚决执行张副司令的命令！三个师长虽然不在家，可参谋长都在呀！根据平时的了解，应当信任他们。”刘忠干和张熙光对视一眼，定下了决心：“干！祸福成败，在此一举！”

当下，刘忠干吩咐张熙光和解方：“你们立即拟定一个行动计划，通知各师参谋长、团长，下午 1 时在军部开会。我到省府通知周从政秘书长，让他也参与其事！”

解方参与拟定行动计划并参加了紧急会议。会上，张学良的电令一宣读，东北军军官顿时群情激昂，都表示坚决执行张副司令命令。接着，参谋处长张熙光宣布了各部队行动任务：（1） 113 师以足够兵力解决驻东校场的胡宗南蔡、徐两团并占领飞机场；（2） 118 师以部分兵力解决绥署特务营，另以一部兵力解决与军统有关的部分武装警察；（3） 118 师以适当兵力在城关内外巡逻，维持秩序，保卫全城治安；（4）将绥署高级职员暂集一处，照常待遇，限制自由，保证安全；（5）对兰州军统头目、警察局长史铭加以看管；（6）切断兰州对外电话联系，占领电台、电报局和报馆；（7）晚 7 时开始行动。

解方走出会议室，抬腕一看表，已是下午 2 点多钟。虽说天气阴冷，但这位 28 岁的青年军官却感到浑身躁热。驻兰州中央军及其他部队的情况他早就了然于心：除兰州城驻有胡宗南两个团、第 7 军炮兵团、中央军骑兵团外，兰州外围，静宁驻有毛炳文部，平凉驻有孔令恂、周祥初两师，岷县驻有鲁大昌师，天水驻有王均部第 7 师，青海、宁夏、河西一带驻有马家军……万一走漏消息，或今晚行动失利，或处置稍有不当，都会酿成大祸，危及西安！

他也知道 51 军忠于张学良，通过一系列的工作，抗日复土情绪高涨；也知道刘忠干胸有谋略，指挥晚上的行动不会出什么纰漏。但胡宗南的蔡、徐两团，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有一定战斗力。解决他们，113 师有无绝对把握呢？

“必须做到万无一失！”想到这里，解方以最快的速度赶到 113 师师部。师参谋长窦希哲刚刚给三位团长布置完任务，正趴在桌上看军事地图。他和解方是陆军士官学校同学，近来常谈论抗日救国的话题。一见解方到来，便拉上他审核行动方案。解方见方案周密细致，便提出到团里去转转。窦希哲

说：“没问题，弟兄们受够了中央军的气，早就红了眼，就等着这一天了！”

解方随即来到李荫坡团。李荫坡向他谈了进攻胡部蔡团的方案，握住他的手说：“沛然兄，我既然加入了抗日同志会，就不会给张副司令丢脸！你看好吧！”

解方和李荫坡研究过行动方案，又赶到张儒彬团。张儒彬递给他一张写了遗嘱的纸条，说：“万一我回不来，你就把它交给张副司令，就说我这个会员没白当！”

了解了 113 师的部署和士气，解方感到很满意。返回军部的路上，他猛然又想起一件事，便径直来到通信营。营长冯梦瑞正手拿话筒，口述命令。一见解方，便兴冲冲地说：“沛然，动起来了！参座刚来电话，命令立即切断兰州对外的一切联络！”

“梦瑞，事变一起，我们会不会和中央系统翻脸？”解方分析说，“朱绍良那个绥署，肯定收集了东北军不少情报。今晚一打响，我们就把它抢过来，看看都是些什么货色。为了稳妥，还是咱俩闯一趟朱绍良办公室。”

“不成问题。”冯梦瑞胸有成竹地说，“我再带上一个连！”

激昂的情绪在军营中流动。灰蒙蒙的天色下，“参谋造反”的行动计划在紧张而秘密地进行着。

解方返回军部，正要向刘忠干报告部队的情况，抬眼见绥署副官长杨祥华也脚步匆匆地走向刘忠干办公室。此人是朱绍良的亲信，万一被他看出什么破绽，晚上的行动就会毁于一旦！解方急中生智，赶上几步高声喊道：“杨官长来啦？快请进吧！”边喊边抢身在前，把杨祥华往屋里引。待杨走进屋，刘忠于、张熙光笑容可掬地起身相迎：“来吧，伙计！三缺一，专等你啦！”杨祥华狐疑地问：“我在街上看到部队有调动，好像是有什么事情？”刘忠干摆摆手说：“正常换防，咱们不必管他们。”说着，拉他坐在方桌边，又吩咐卫兵拿烟上茶。解方趁卫兵出去端茶的当儿，悄悄跟出来交待说：“看住此人，今夜不准离开这里一步！”

苍茫的暮色笼罩了兰州城，51 军军部门口，却是灯火通明，人来车往。甘肃绥靖公署参谋长章亮琛、秘书长翁燕翼及各处处长揣了 51 军的请柬，兴致勃勃地前来赴宴。刘忠干笑容满面，将客人一一迎进宴会厅。

正当酒酣耳热之际，东校场方面突然枪声骤起，一时举座皆惊。刘忠干不动声色地站起来，两手往下压压，平静地说：“刚才接到报告，外面发生了一点小事，大家不要惊慌。为保证诸位安全起见，现在请大家到下水巷营舍集体居住，不经允许，不要随便走动。”绥署官员一听此言，不由得面面相觑。他们明白：自己从现在起，失去了自由。

枪声一起，解方便和冯梦瑞、通信科长李翔云带了一支队伍冲进绥署办公楼，解方将重要文件、档案统统取出，带回了军部。后来一查，果然有不少中伤 51 军的“小报告”。从绥署回来，解方又赶往中央军第 3 军炮兵团外围，直接对团长喊话。该团团长也是解方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经晓之以利害，即命令全团放下了武器。

拂晓，城内外枪声渐渐停止了。清点结果，驻东校场的胡部两团及兰州附近的国民党中央军和特务武装全部被缴械。胡部蔡、陈两团长为黄埔军校生，有“黄马褂”之称。东北军官兵对其素无好感，这次又带队顽抗，因此被当场击毙。

早饭后，解方即代表 51 军对被扣押的国民党党政、军警人员进行宣抚，

同时建议以 51 军和甘肃省政府名义联合发出通电，拥护张、杨两将军的“八项救国主张”，随即将兰州事变的情况报告了张学良。

由于这次行动果断、迅速、周密，51 军很快控制了兰州的局势，市内秩序很快平静如常。兰州事变壮大了西安事变的声威，增强了张、杨两将军的军事实力和政治谈判地位。

兰州事变的第 4 天，于学忠乘张学良的座机飞返兰州。一见解方，便拉住他说：“沛然，你可是立了大功！要不是你那个密码本，兰州怕是一片混乱了！”原来，张、杨扣蒋之后，即将八项爱国主张的电文交给西北总部的交通处长蒋斌，令他即日通报全国，以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响应。不料蒋斌别有用意，竟偷偷将电文扣压下来，转而向南京方面报告，南京舆论界占取先机，切断了西北方面的一切通讯与交通，并伪造、加工各方面文电，讨伐张、杨。两天之后，张、杨才发觉通电根本没有发出，下令逮捕了蒋斌。大家听罢，都倒吸一口冷气：好险啊！如果不是解方有张副司令交给的专用密电码，及时得到张副司令的指示，那么，兰州的中央军就很有可能按南京的命令攻打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兰州一乱，局面恐怕难以收拾！

当晚，于学忠又告诉解方：张副司令让他乘这架座机即刻返回西安。解方正急于得到党的指示，便于当晚飞往西安。翌日，又奉张学良之命第三次飞赴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联络抗日事宜去了。

英姿勃勃的吴华夺将军

1955 年 10 月 1 日上午，天安门广场荡漾着欢乐的节日气氛，十里长安鲜花与彩旗交相辉映，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在蔚蓝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壮观。天安门上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红墙两端写着：“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等标语。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受阅部队指战员身着刚换发的新式服装，佩带着军衔肩章，军容威严地排列在无数红旗下翘首等待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时刻的到来，这给广场上的欢乐气氛平添了几分庄重。

9 时 50 分，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霎时，广场上欢声雷动。10 时整，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首都人民庆祝建国 6 周年大会开始！军乐团奏起了国歌，伴随着隆隆的 28 响礼炮。阅兵式总指挥杨成武上将陪同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乘阅兵车从天安门出发，检阅陆、海、空军各部队。

10 时 25 分，杨成武上将的指挥车从广场东开过，阅兵式的分列式开始了。指挥车后，吴华夺少将，以他庄严、威武的英姿，带领着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伴随着“进行曲”，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天安门广场。人们被他们的英姿吸引了，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毛泽东主席望着自己的军队，欣慰地向前迈了一步，挥起他那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巨手向指战员们致意。朱德、彭德怀、聂荣臻、陈毅、贺龙、罗荣桓元帅向他们致以崇高的军礼。

吴华夺举手向观礼台致敬，迈着雄健的步伐带着部队行进着。观礼台上，除党和国家领导人外，还有来自 50 多个国家的 2000 多位代表。他们看到中国人民正是依靠这支无敌的人民军队，防御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了独立解放。以奈温中将为首的缅甸军事代表团、以梅库尔·拉中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军代表团，以沃尔瓦中校、拉特科夫斯基上校为首的波兰军队代表

团，也庄严地向受阅部队致以军礼。观礼台上，缅甸、波兰、印度、苏联、丹麦、英国等 50 多个国家的大使、代办望着行进中的受阅部队也非常高兴地招手致意。美国青年代表也连称道：“这将是一支维护远东和世界局势的重要的军事力量。”阿根廷的《论坛》报社社长戈乐德曼举起相机，对着吴华夺将军拍下了一幅幅照片。

不久，英国、美国、意大利、比利时、法国、阿根廷、日本、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联、西班牙等国在主要报刊上都刊登了受阅部队的精彩场面。他们原以为，山沟里打游击出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会有自己的将军，更不能靠自己来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正规的军队。但是，当他们望着吴华夺将军那严整的军容和极其标准的动作时，禁不住问道：他是谁？叫什么？哪个军校毕业的？吴华夺——即使我们中国人，又能对这位将军了解多少呢？

吴华夺有着不寻常的成长经历。1917 年，他出生在大别山深处的新县陈店乡细吴村。父亲吴文保为人豪爽仗义，在当地颇有威望，为防匪安民在当地办起了红枪会。吴华夺 10 岁时家乡的共产党人领导了黄麻起义。吴文保的红枪会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红色补充军第 2 团，吴文保担任该团党代表，儿子吴华高任团长。1928 年冬，该团到光山县东区攻打地主山寨。这天，风雪交加，战士们冻得缩头耸肩，在崎岖的山道上行进。吴华夺也跟着部队一路急行军。父亲发现后，严厉地说：“你快回家去！”吴华夺趁父亲不注意又钻进队伍，倔犟地对父亲说：“冻死在外边也不回家了！”父亲无奈，只好脱下一件单衣给儿子包住头。就这样，吴华夺 11 岁就加入到红军的队伍中。

1929 年春，部队改编，兄长吴华高被编到红 28 团，吴华夺被分配到少先队学文化和军事。吴文保受党组织委派到地方工作。他不放心小儿子，临行前到少先队看望。吴华夺说：“你回你的，我是不回。”父亲望着刚满 12 岁的儿子，拿出刚买的布鞋给儿子穿上，慈爱地摸着他的头，端详着儿子那张满是稚气的小脸，动情地说：“以后千万要听同志们的话。”吴华夺“嗯”了一声，扑进父亲的怀里。从此，吴华夺再也没有见过父亲和兄长。吴文保牺牲在四川，吴华高牺牲在大别山。

吴华夺 14 岁时，被分配到红 25 军手枪团，担任警卫班长。在参加第一次战斗时，他看到数千人厮杀在一起，曾怯过阵。一位老战士大声叫道：“小子，你愣什么？冲啊！”他如梦方醒，杀入敌阵。事后，首长表扬了他。而吴华夺却惭愧地说出了实情。老战士望着这位红小鬼心痛地说：“要说怯阵，哪个没有，可你才十三、四岁呀！在家恐怕还穿开裆裤呢，敢拿小马枪上阵真不简单啊！”

时至今日，身为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的吴华夺将军忆及此事，还深有感触地说：“任何一个军人，都有个从恐惧到无畏的过程，天生的英雄是没有的。我从小就转战南北，在枪林弹雨里拼杀。是无数倒下去的战友，给了我勇气与力量，才使我这个山里的穷娃子，成长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

1956 年，吴华夺将军把他的童年生活写成了《我跟父亲当红军》，国家教育部把这篇文章选入中小学课本，作为传统教材，并被译成英文，作为大学英语教材。几乎所有解放后上过学的人们都读过这篇文章。他那充满传奇色彩的童年随着琅琅的读书声，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吴华夺将军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是在战火中度过的。1934 年 11 月

16 日，担任手枪团分队长的吴华夺随红 25 军北上长征。这支队伍有 3000 余人，《共产国际》第 7 卷第 3 期曾以《中国红军第 25 军的远征》向全世界报道：“这支以儿童军而著称的红军，指战员多是在战斗中牺牲的先烈的孤儿……他们中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只是 13 岁到 18 岁。”军长程子华 29 岁，政委吴焕先 27 岁，副军长徐海东 34 岁。当时的吴华夺年仅 17 岁。

是年 11 月 26 日，红军刚刚到达方城、叶县之间的独树镇，就与敌遭遇展开了激战。那天，狂风呼号，雨雪交加，红军陷入国民党庞炳勋部 40 军的合围之中，一时枪声大作，战士们的枪栓冻得拉不开。吴华夺灵机一动把小便解到枪上，推上子弹，随政委吴焕先杀入敌阵。战士们一个个如猛虎下山，越战越勇，敌人不得不丢下 500 多具尸体逃入方城。

1935 年 3 月，冬去春来，但这明媚的春光并没有给吴华夺带来一丝暖意，他被军部一小撮推行极“左”路线的领导人抓了起来，绑赴刑场。刚出庙门，他看到徐海东副军长的警卫员张学文，哽咽着说：“以后见到我的母亲，告诉他老人家，我不是反革命！”张学文见状，立即制止：“请等一等！”他立即向徐军长报告。

刑场上，执法队举起了大刀，张学文高叫：“刀下留人，军长有令！”在军部，吴华夺见到徐海东，像个孩子似的大哭起来。脾气暴躁的徐海东一脸冰霜，手提马鞭，暴跳如雷：“‘肃反’，这么小的孩子都不放过，他娘的！传我的命令，执法队撤回，被捆的同志放掉，谁再杀人，我就要谁的脑袋。把他给我叫来，我当面和他算帐，他娘的！背着军部搞这一套！”

被判死刑的吴华夺和战士们擦干眼泪，为了那红色的梦，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更加坚定了跟党闹革命的信念，踏上了北上的征途。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华夺担任新四军 4 支队 8 团 3 营 7 连连长，不久，即任抗日大队长和团长等职。1940 年 5 月，他率部到达淮南来安城郊。他得知日、伪军大队人马刚到此城，准备进剿我淮南根据地。“这个情报太重要了”他在院子里踱着步，反复推敲敌情，制定作战方案。敌有千余人，而自己的部队是刚组建的，但他仍下达了战斗命令：“同志们，先下手为强！攻其不备，歼灭敌人！”

凌晨 3 时，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包围了来安城，并摸进城内，快速猛捷消灭了伪军，将 700 多名日军逼进一个四合院内。日军拼命抵抗，吴华夺当机果断下达火攻的命令，一把火烧死日军 700 余，震动了日军总部。

此时的吴华夺多谋善断，机智勇敢，成为陈毅军长手下有名的虎将。1941 年秋，副军长张云逸把吴华夺叫进军部。把歼灭驻守永宁大桥之敌的重任交给了他。大桥守敌桂系 511 团 1 营，是桂系的军魂，营长韦刚自称是“钢中钢”。副军长的话音未落，吴华夺“啪”地一个立正，“请军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吴华夺深知这是块硬骨头。他经过深思熟虑，制定出了一个十分周密的作战方案。10 月 11 日，吴华夺率部进至永宁集。第二天深夜，他指挥部队采取全面包围，四面突击，大胆分割，主攻、佯攻结合的战术，将桂系顽军 511 团 1 营一块块分割包围歼灭，敌营长韦刚被击毙在水田里。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战后，新四军 2 师授予 11 团“铁锤子团”的荣誉称号。

吴华夺在战斗中茁壮成长，他带领的团队，敢于碰硬，勇于攻坚，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渐渐使吴华夺名声大噪，威震敌胆，誉满全军。

1955 年 9 月 17 日，秋天的北京格外美丽。盛大的国家授勋典礼在中南

海怀仁堂举行。年仅 38 岁的吴华夺，身着新式海蓝色军礼服走进怀仁堂。当毛泽东主席、宋庆龄副主席、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走上主席台时，台下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主席宣读了授勋命令和千余人的授勋名单。之后，将军们 10 人一排走上主席台，从毛主席手中接过勋章，吴华夺激动地向毛主席行军礼，从主席手中接过少将命令状和三级八一、二级独立自由、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勋章，成为我军最年轻的将军之一。授勋典礼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宣布；“国庆节，毛主席将在天安门城楼阅兵，调选一名将军作为阅兵的领队，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结束了有军无将的历史。届时将有来自 50 多个国家的 2000 余名代表也在观礼台上观礼。”台下 1400 余名将军欢声雷动。能在国庆大典中作为领队，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这无疑是将军一生中最高的荣誉。因此，众多的将军都希望自己能担当此任。

典礼结束后，中央成立了受阅部队总指挥部，由杨成武上将负责。总指挥部对每一项安排，每一道细节，选调的每一个战士都要经过几道审查。对于领队的挑选更是严格，要求年轻、威武、雄健，相貌威严而端庄，有标准的军人风度，并要有非凡的战斗经历。根据上述要求，总指挥部查阅了几乎所有将军的档案，最后选中了年仅 38 岁、11 岁参加红军的吴华夺。看过吴华夺的履历、军容、仪表，周恩来总理欣然点头称许。

此时的吴华夺将军，虽没有上过学，也不是什么军校毕业的，但他自幼在军营里摔打磨炼，那近 1.8 米的身材，那一张英俊的脸庞，无不透着军人所特有的刚毅、机智与干练。还有那一套标准的军人动作，稳健有力的正步，加上从事军事院校工作多年的经验，这是众多将军所无法相比的。

10 月 1 日 10 时 25 分。当杨成武上将乘坐的指挥车缓缓驶过，接受检阅的部队走过来了，吴华夺将军迈着标准的正步，走在受阅部队之前。经过天安门城楼时，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自己从一个“大”字不识的穷孩子，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父亲、兄长，无数的先烈没有活到今天，是共产党、毛主席哺育自己成长。他要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雄姿展现给党、展现给人民、展现给全世界。想到这里吴华夺将军更加精神抖擞，侧目、敬礼、拔正步，一整套动作熟练而威严，赢得了观礼台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民主人士、50 多个国家 2000 余名代表的阵阵掌声。也赢得了北京市 50 多万人民群众雷鸣般的掌声。

此后，吴华夺将军连续 7 次担任国庆典礼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的领队，接受领袖和全国人民的检阅。

岁月悠悠，吴华夺将军用对党和人民的一腔赤诚，谱写着自己的人生乐章，他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从大别山走向天安门广场，在十里长安街上留下了自己终生难忘的脚印，也把人民军队的严整军容，雄壮的气势，崭新的精神风貌，永远地留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并远播世界。

汪荣华与刘伯承半个世纪的情和爱

1991 年汪妈妈去外地，出于对刘帅和汪妈妈的热爱，接待单位兴师动众，夹道欢迎，她既不习惯也看不惯这种形式。她刚走进屋里，尚未落座，一位女领导干部热情地大声问道：“刘帅夫人在哪儿？刘帅夫人在哪儿？”汪妈妈站起身静静答道：“她不叫刘帅夫人，她叫汪荣华。我就是汪荣华。”是的，她就是汪荣华。刘伯承元帅的战友和妻子，一位始终保持着光荣革命

传统的红军老战士。

1987 年，汪荣华回到久别的故乡——安徽省六安县郝家集村。她的二弟，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普通村民。他在旧宅基地上盖起了新瓦房，汪荣华只寄了 500 元表示姐姐对弟弟的关心帮助，其他什么也没有。瓦房盖好，笔者去大别山，曾在他二弟家小住一夜。但有一间旧房未拆，至今尚存，我亲眼目睹。泥巴墙，茅草顶，墙土已剥落，茅草已难遮风雨。住在里面，白天能看见天，晚上能数星星。汪荣华已逾古稀之年，难得回来一趟，二弟说什么也得让大姐住在新屋，可她执意不肯，偏偏要住在破旧的茅草屋里。晚上，她目视屋内，一切是那么熟悉。泥墙，泥地，房梁，锅台。仿佛妈妈坐在灶口同意她上学读书的情景又浮现眼前……这一夜，她失眠了，人老了爱忆往事，

昔日的峥嵘岁月，血雨腥风的历程，历历在目，恍如昨天。

夜，静得出奇。静得可以听见淠河鼓浪的湍湍声。流不尽的淠河仿佛在诉说皖西人民的苦难与奋起，失败与欢乐；也在诉说淠河养育的儿女——红军女战士汪荣华戎马倥偬的岁月，诉说她与刘伯承元帅驰骋祖国大地半个世纪的情与爱，诉说她的婚恋，她的家庭，她的儿女们的生活……

草地，有悲壮的英雄交响乐；草地，也有浪漫的爱情奏鸣曲。

那是在 1935 年深秋，红四方面军二过草地时，由于粮食奇缺，饥寒交迫，红军病号日增，人员锐减，汪荣华所在的川陕省委工作队解散，她和另外几名女同志被分配到红军总参谋部四局工作，开始了和刘伯承的最初接触。但她第一次见到刘伯承却是在几个月前，中央慰问团来到红四方面军驻地杂谷垴慰问的那一天。

这是永远值得纪念的一天。1935 年 6 月 12 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夹金山下懋功胜利会师。两个方面军指战员欢欣地握手拥抱，联合举行了庆祝大会。可是，两军会师的欢乐气氛不久就被张国焘反党分裂行径冲淡破坏了。在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上，否定了张国焘向川康的计划，决定两个方面军继续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张国焘虽然最后举手赞成了中央决议，但在会后却玩弄花招，一再拖延。他公然在部队散布“谁的人多枪多，谁就应该当领导”，还指使别人借提意见为名，要挟中央“让张国焘当军委主席”。正是在这种矛盾复杂尖锐的时刻，中共中央为了团结和争取张国焘，派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及林伯渠、李富春等人组成慰问团，到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并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

那一天，阳光灿烂，碧空如洗。汪荣华当时任川陕省邮政局副局长（局长由省交通部长兼任），她在刚吃早饭时就得到通知，要她率领省邮政局工作人员整装列队欢迎中央慰问团。汪荣华匆匆吃过饭，便组织同志们来到山寨杂谷垴的街头。

街头站满了欢迎的人群，人们欢欣地露出一张张笑脸。来了！来了！中央代表团来了！顿时，人群里爆发出一阵阵口号声和热烈掌声，整个山寨沸腾了。中央代表团有十几位同志，其中有两位尤为引人注目：一位是头发斑白、有学者风度的林伯渠；一位是身材魁梧，戴着眼镜，有标准军人气质的刘伯承。汪荣华问身边的同志：“那个戴眼镜的是谁呀？”

“嗨！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刘伯承总参谋长啊！”

澳，他就是刘伯承！当时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直到两军会合，对刘伯承传说很多，谁都知道他是无产阶级的孙武。

汪荣华鼓掌欢迎中央代表团，注目看着刘伯承从眼前走过，她眼里充满

了一个红军战士对红军领袖的尊敬和爱戴。谁也没有想到，连汪荣华自己也没有想到，她会成为这位杰出的红军将领、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妻子和伴侣。

草地无垠，汪荣华和刘伯承的两颗心却渐渐相近。经中央与张国焘的多次斗争，北上的方针终于实施。一、四方面军在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下，分成左、右两路分别走向草地。朱德和刘伯承来到以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与张国焘一起率领红军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东进班佑地区向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的右路军靠拢。

左路军一过草地时，汪荣华被编入川陕省委地方工作队随军行动。草地，纵横数百里，茫无人烟。没有道路可走，一路沼泽泥潭，沼泽地的水大都有毒，连水也喝不上，加上粮食短缺，风餐露宿，病号日增。经过五天的艰难行军，左路军于 8 月下旬到达阿坝地区。就在这时，张国焘非但没有向右路军靠拢，反而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拒绝北上，左路军又往回开，南下川康，不得不第二次过草地。张国焘还亲自动员，召开会议，斗争和围攻坚持中央北上正确路线的朱德和刘伯承同志。

二过草地，苦上加苦。此时已是深秋，高原寒，秋风凉，汪荣华和广大红军战士一样，身着单衣，两脚成天泡在又臭又凉的水里，在沼泽地里艰难行军。草地气候多变，刚才还晴日当头，瞬即雨雪交加；还有难辨的泥潭，一不小心掉进去，顷遭灭顶之灾。有一天，汪荣华目睹一匹马陷进泥潭，不一会就只剩下一个马头了。二过草地，在渺无人烟的沼泽地，找不到一粒粮食，只好挖野菜充饥，有的野菜还有毒，一些同志把脸都吃肿了。最后连野菜也找不到了，只好找来一些牛皮煮着吃。不少红军战士由于饥饿疲累，伤病相加，永远倒在了草地上，没能再爬起来。活着的人也是历尽苦难，备尝艰辛。汪荣华至今提及，仍忍不住内心的气愤说：“在以后的岁月里，只要我一想二过草地的情景，就使我更加痛恨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径，他无辜害死了我们多少革命同志啊！”

草地给红军带来巨大损失，给汪荣华带来终生难忘的痛苦。但是，草地也给江荣华带来终生难得的爱情和幸福。

汪荣华到了四局工作后和刘伯承接触见面的机会多了，经常在一起行军。她看到刘伯承非常平易近人，办事严谨，知识渊博，又毫无官架子，令汪荣华和同志们对他十分敬重。一天，四局的同志不知从哪儿搞到两只毛茸茸的兽蹄，谁都不认识是什么。刘伯承提起兽蹄高兴地说：“呵！这是一对熊掌！是很名贵的东西，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哩！”说着他亲自动手，刮去皮毛，洗净砸碎，用脸盆当锅，熬了一锅熊掌汤，叫大家一起来吃，尝尝味道。虽然每人只分吃到一点熊掌肉，喝了几口汤，也吃不出什么味道，但在生活极为困难的草地，刘伯承和战士们同甘苦共患难的阶级友爱精神，使每一个同志的心里都热烘烘的。

在行军途中，刘伯承看到一些病号走不动路，或是掉队的同志，他总是把自己的马让给他们骑。有一天，汪荣华掉队了，刘伯承看到她行走很艰难，一步一步向前挪着。刘伯承便把马让给了汪荣华：“骑上马吧！”

汪荣华抬头一看，原来是刘伯承总参谋长：“谢谢首长，我能走，我行！”

“行啥子哟，骑上吧！”刘伯承带着浓重的四川话腔，充满对战士的关怀。

“不，首长骑！我会跟上的！”汪荣华笑着执意谢绝，笑容里显出倔强，谢绝中包含着敬意，说着明显地加快了步伐。

刘伯承笑着点点头，内心不无钦佩：这女同志硬是不简单哩！

能参加长征的女同志都不简单！在与汪荣华的不断接触中，刘伯承越来越了解她了，这位来自大别山的少女纯朴端庄，勤劳聪慧，14 岁就瞒着父母参加了红军，该是多么巨大的勇气和智慧啊！明明体力不如男战士，硬是几千里徒步行军，翻越大巴山，突破敌人围追堵截，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该是多么勇敢顽强和坚韧不拔啊！想到这些，刘伯承的心怦然而动了，他知道自己爱上她了，可是怎么说？当面谈，容易变成上下级关系，给姑娘带来压力，人家才 19 岁啊！不，要自由恋爱，自由恋爱！叱咤风云、身经百战的刘伯承决定以笔代言，倾吐心声，好让心爱的姑娘从容地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

到了宿营地，刘伯承处理完公事，自己研磨了一盘浓墨，提起毛笔，工工整整写起蝇头小楷来，别人还以为他又在抓紧时间练书法哩！他一连写了好几页，然后认真叠好装进信封，喊来警卫员黄兴正：“ 小黄，请你送封信给汪荣华同志。 ”

“ 是！首长还有什么指示？ ”小黄接过信问。

刘伯承随即嘱咐：“ 请你一定要当面交给她。 ”。

还一定要当面交给她？警卫员小黄似乎明白这封信的份量，立即点头跑步送去。

这是刘伯承生平第一次用蝇头小楷写的情书，也是汪荣华生平第一次接到情书。她拆开信一看，原来是刘伯承送来的求爱信！那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那笔尖下倾吐的炽热感情，令汪荣华怦然心动，脸不由刷地红了……

明月当头照，草地静悄悄。同志们以天作被，以草作毯，背靠背地休息了。可汪荣华怎么也睡不着，刘伯承又重现在眼前……

红军官兵几乎都知道刘伯承是川中名将，是“ 八一 ”南昌起义的参谋长，红军官兵更知道刘伯承直接或参与指挥了突破乌江、智取遵义、攻占娄山关、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和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抢渡大渡河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战役，是一往无前的常胜将军。关于刘伯承动人的真实故事，真是说不完，道不尽。

草地静悄悄，东方已泛白。汪荣华几乎是一夜未眠，越想越觉得刘伯承可敬可爱可亲。他能征善战，不正是自己崇爱的英雄么？他诚实朴素，不正是自己理想的爱人么？他对革命忠诚，不正是自己情投意合的伴侣么？她想着想着又觉得这件婚事不合适，文化水平没法和他比啊！资历也没法和他般配呀！拒绝吧不忍心，接受吧又自感不合适。可刘伯承还在等着回话哩！干脆把心里话掏出来，让他再慎重考虑考虑。她如约前去，当面说清，刘伯承一听不由地笑了起来：“ 这有啥子关系嘛！我们的结合是自由恋爱，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志同道合，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至于文化水平低一点，可以学习嘛，你自己努力，我还可以尽力帮助你。 ”

他看着她，觉得她是那么可爱纯朴。

她看着他，觉得他是那么诚恳亲切。

刘伯承和汪荣华彼此向对方献出了一颗真诚的心。

刘伯承深沉平易地对汪荣华也讲述自己的家史和个人经历。

原来刘伯承也是贫苦农民家出身！他原籍湖北荆州，后来移到四川开县赵家场定居，祖父带着 6 个儿子垦荒种地，当过吹鼓手。小的时候，穿着祖父穿过的破棉袄，光着脚板在地里干活。父亲排行老六，是家中唯一读过书

的人，但体弱无力难以胜任体力活，生活很困难，分家以后日子更难过了。但父亲是文化人，有眼光，为了儿子的前途，5 岁就把刘伯承送去读私塾。刘伯承个头没有巢子高，只好脚下垫两块砖头。由于私塾离家远，就寄宿在与父亲相识的和尚庙里。启蒙之后，才转到离家近的学校。尽管刘伯承勤奋好学，学习成绩总是第一，可地主少爷和富家子弟总是欺负穷孩子。13 岁那一年，父子俩一起进城考秀才，儿子名列第 2 团第一名，父亲列在第 14 团，父子双双上了红榜，似乎儿子的文才胜过了老子。刘伯承是小孩子，当然高兴得又蹦又跳，马上被父亲厉声制止了。刘伯承不明白父亲为什么生气，回到客栈却又大出所料，一进房门，父亲就抱起儿子，又亲又拍，又笑又流眼泪。然后父亲才说：做人要沉得住气，要喜怒不形于色，刚才看榜那个样子，太毛愣了，要不得。可是第二场考试，却被主考官取消了资格，理由是祖父当过吹鼓手，是“倡优之后”。不久，父亲去世了，刘伯承只好休学回家干活，借债为父亲办了丧事。母亲当时还怀着遗腹子，妈妈哭着说：生下来也养不活，只有送人。刘伯承说：妈妈不要哭，也不要难过，千万不要把他送人！我一定要把弟妹养大成人！然而家里只有两个劳动力，怎能养活一家 9 口人！旧社会，世道太不公平了！这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而是全社会、全民族、全中国的问题……

刘伯承说得娓娓平易。

汪荣华听得泪水盈盈。

刘伯承看看一望无垠的草地，又看看身边的汪荣华说：“正因为我们穷，活不下去，才起来革命，才走到一起来了。只要我们有共同理想，志同道合，就能结成革命伴侣，永远战斗在一起，白头到老！”

的确是革命才使他们“走到一起来了”。一个从瑞金杀出重围，历尽血雨腥风；一个从大别山冲破追剿，备尝人间艰辛。是命运，是姻缘，也是共同理想，使他们成为生死相依的夫妻，患难与共的伴侣。

1994 年 9 月，汪妈妈对笔者说：那时刘帅正遭张国焘的迫害，可是一点也看不出他有情绪，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汪妈妈还说：张国焘闹分裂，开会批判刘帅和朱总司令，要他们反对党中央毛主席，软硬兼施，逼他们就范。软的时候说好话，甚至流眼泪；硬的时候唆使手下的人把枪栓扳得哗哗响，进行威胁。在激烈的争吵中，刘帅和张国焘都拍了桌子，他一针见血指着张国焘说：“你在南昌起义就是机会主义，现在又想分裂红军！”这个话激怒了张国焘，他说：“不看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杀你头了！”刘伯承回答说：“革命怕什么杀头！”

“这时伯承因为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而被软禁，撤消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让他到‘红大’当校长，实际上是军事教员，因而我们也无法结婚。”

秋风送爽，大地铺金。1936 年中秋节前后，当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之际，在曲子镇——这个靠近清源河畔的甘南小镇，汪荣华和刘伯承结成了终生伴侣。从杂谷垴相见，到共同走过雪山草地，经历了人间罕见的艰难困苦，他们都感到是那样的幸福。

从此，汪荣华戎马倥偬伴刘帅，整整走过人生的半个世纪，他们生死与共，患难与共，始终是一对恩爱夫妻，模范夫妇。

汪荣华到延安不久，进入抗大学习，多么难得的学习机会。早在草地与刘伯承定情之后，她就努力学习文化，提高自己的水平。刘伯承只要有空隙，便帮助她学习文化、学军事、学政治，要求非常严格。如学习语文时，他要

汪荣华一定要做到广读、精读、多写；学习书法要注意间架笔势，认真临帖。汪荣华刻苦学习，刘伯承热情帮助，水平提高很快。

1937 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汪荣华和刘伯承婚后不到一年，又天各一方，共同投身到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中去。

刘伯承率 129 师东渡黄河，进入敌后转战在极度紧张的抗日前线，夫妻二人在战火中分离。他们成家没有家，一在延安，一在太行，只有彼此的心息息相通。

1938 年 5 月，汪荣华在延安抗大毕业，分配到 129 师随营学校任政治教员，夫妻才得以重聚。即便是此刻，他们也是各自投入自己的紧张战斗生活，过的是集体生活，吃大伙房的饭，只有星期六才到刘伯承这边来。刘伯承时下部队，时到前线，走时对妻子说一声“我走了”，便牵上骡子匆匆而去。短则数日，长则数十天才风尘仆仆地从前线回来，一身硝烟，一身汗湿，一身疲累。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岁月里，他们夫妇相继生了太行、弥群和解先，孩子生下来不久，就放在老乡家里，与普通老百姓一样，度过艰难岁月。刘伯承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以自己精深的军事理论和丰富的军事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首创了游击集团的人民战穹形式和确立了汲其宝贵的“敌进我进”战略思想和战略原则。

在解放战争中，刘伯承亲自指挥了解放战争的第一仗——上党战役，相继指挥组织了平汉战役、陇海战役、定陶战役、鄄城战役、滑县战役、巨金鱼战役等，直到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全歼黄维兵团，与三野共同举行渡江战役，然后横扫大半个中国，进军大西南，发起大陆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成都战役，给解放战争划上句号，可谓无往不胜，功勋卓著。可他们夫妻依然是时聚时别，居无定处，相见时少，分别日多。直到刘伯承赴南京创办军事学院，汪荣华于 1951 年初带着孩子举家迁到南京后，才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

她没有想到，刘伯承比战争时期还要操劳紧张。战争时期，刘伯承可以几天不睡，战斗结束，他能随便倒在柴禾堆里睡个够。可在军事学院则是天天紧张，日夜操劳，成天是办不完的事情，脑子里是想不完的问题。她看到了丈夫在南京最紧张、最操心、最苦最累的情形，累出了高血压、头痛、虚脱症，可有病还不愿意去医治。记不清有多少个深夜，刘伯承会在睡梦中突然惊起，披衣打开台灯，坐在桌前批改教案或是校译译作。江荣华既是贤慧的妻子，更是红军老战士，她知道丈夫的脾气，更理解刘伯承为了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军事干部的急切心情，从不阻拦。但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也出于对丈夫的关心和爱护，提醒劝说他几句，刘伯承也只是嘴里答应，身子却不动，照样干自己的事，汪荣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毫无办法。只是到了 1957 年春天，汪荣华看到刘伯承实在是太累，血压又高，经常头痛，才好说歹说将刘伯承劝到上海去检查一下身体，顺便休息一下。汪荣华万万没有想到，她和刘帅刚刚离开南京，国防部就来人写了专题报告，突如其来地开始了军事学院的所谓反教条主义运动，而且愈演愈烈。这次运动，持续一年半时间，直到 1958 年夏天，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全军一千多名高级干部开了近两个月的会，把全军反对教条主义运动推向高潮。

本来，刘伯承已请了病假，毛泽东也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可是在全军展开这样一场“路线斗争”，总得树一个靶子。毛主席说“可以不来”，可有人偏偏叫刘

伯承非来不可，专派二人去南京“请”刘伯承一定要出席会议做检查。刘伯承是军事家，长期的军旅生活养就了刚强的性格，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观念。他勇敢地舍弃自己，不顾病痛，不顾身名，拒绝了一切善意的劝说，抱病直赴北京。赴京的前一天，他不由思绪翻滚，彻夜未眠，左眼球红红的。在火车上又是一夜没有合眼，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青光眼急性发作，眼压高达 73 度，而正常只有 20 度。他不得不住进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做检查。

豪爽耿直的陈毅到医院看望刘伯承，看到老战友病成这种样子，还要做检讨，心里很是难受，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周恩来、朱德等知道刘伯承身体不好，都表明与毛泽东相近的意见，表个态就行了，不必上台检讨了，可是有人却打着“群众”的旗号说，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意见还是要他公开检讨。

进不邀功，退不避责，是刘伯承终生信守的原则；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的一贯作风。7 月 10 日，刘伯承径直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当由人搀扶，迈着缓慢沉稳步子的刘伯承刚刚出现在主席台角的时候，顿时全场起立，爆发出热烈持久的掌声，延续有半分钟才逐渐停息下来。这仿佛不是低沉压抑的检讨会，而是欢迎冲锋陷阵的英雄凯旋归来。一些将军看到刘伯承如此这般来做检讨，思绪万千涌心头，禁不住鼻子一酸，眼睛里滚出泪水。刘伯承检讨完毕，全场又爆发出持久热烈的掌声！

掌声里饱含着由衷的爱戴，掌声里包含着对与错，是与非。

1959 年 1 月，汪荣华和刘伯承举家由南京迁居北京。离开南京的这一天，军事学院的许多同志到江边为老院长送行，并要送过江去，一直送到浦口火车站。可刘伯承执意不肯，抢先和汪荣华上了渡船，向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

渡船向对岸徐徐驶去，送行的人们伫立岸边，默默无语望着一直站在渡船上的老院长身影渐渐远去。这位身经百战，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出任中国第一任南京市长，呕心沥血创办全军第一所高等军事学院，终生反对教条主义反被扣上“教条主义”的老元帅，就这样形影孤单地离开了虎踞龙盘的石头城。

1959 年 9 月，中央军委成立战略研究小组，刘伯承被任命为组长，徐向前为副组长。汪荣华担任刘伯承的秘书，她在工作和生活上，对刘伯承给予了巨大支持和深情关怀，使刘伯承相继写出了《回顾长征》、《我们在太行山上》、《千里跃进大别山》等三篇重要著作。说来令人心酸，也令人起敬。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严重困难期间，他们的生活，不是别人所想象的宽裕。汪荣华除了正常的秘书工作之外，还得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他们夫妻两人的工作，要保证 6 个孩子的读书上学，还要供养两位老人和负担她弟弟上大学。国家缺煤，暖气烧不热，冷得伸不出手。每次洗澡，都是汪荣华自己烧水。刘帅洗头遍，她洗二遍。生活供应紧张，元帅家也是菜缺荤腥。为了保证丈夫和孩子们能有一定营养，在大白菜收获季节，汪荣华去住家周围的田地里，捡回人家丢弃的白菜帮子，剁碎喂鸡下蛋。当她在田野里弯腰捡着白菜帮子时，谁能想到她竟是刘伯承元帅的夫人！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汪荣华和刘伯承一贯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始终保持着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他们夫妇对自己、对子女、对亲属，都是言传身教，严格要求，保持着革命的家教家风。

汪荣华和刘伯承一共有 6 个孩子：长子太行，二女儿弥群，三女儿解先，

小女儿雁翎。到南京后，又生了两个儿子：阿蒙和太迟。

1950 年，太行和弥群在北京上学。刘伯承从西南到北京开会。当对《中国青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审判后的谈话》，说的是一个教授的儿子犯了罪，受审后当教授的父亲发表了一篇谈话。由于时间紧迫，他把两个孩子叫到住处，首先叫孩子读这篇文章。晚上，刘伯承边吃饭边对孩子说：“ 由于爸爸为革命做了一点贡献，党和国家给了优厚的待遇。你们是子女，近水楼台先得月，你们沾光了。你们在北京，又住在叔叔阿姨家，又是客人，你们要求什么他们总是满足你们。在 这样优越的环境里，就会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头，容易产生骄傲自大的思想。其实你们真是一点本事都没有，千万不能学那个教授的儿子。 ”他语重心长地对孩子说：“ 我们是打扫舞台的，把三座大山推倒了，把舞台整理好，唱戏要靠你们，你们要唱好戏，就要好好学习，唱戏要靠真本事。 ”

孩子小，总有闯祸和调皮的时候。刘伯承常常指定孩子在课外背诵鲁迅的杂文，毛主席的讲话或是史记中的一些文章。太行由于玩心重，边玩边读书，有一次竟把书里的一页撕掉了半页。背书时刘伯承发现了，他并没有发脾气，而是耐心地教育孩子说：“ 书是老师，而且是一个百问不厌的老师，随便你问它多少次，书从来不会生气发火，总是耐心地回答你的问题，因此你要爱惜书。 ”然后他把被撕掉的半页书，用白纸补贴得整整齐齐，用毛笔一笔一划把缺页的内容写上去。

弥群和其他孩子一样，平时是没有零花钱的。直到小学快毕业时，妈妈每月给两块钱，还是周末只准坐公共汽车的车票钱。有一次汪荣华给弥群买了一支新钢笔，孩子不慎丢失了，不当一回事的告诉了妈妈。汪荣华非常生气，刘伯承知道后也很不高兴，他给孩子讲了一个故事：在战争年代里，他身边有个作战参谋，有一天突然在他面前哭了起来，于是就问参谋哭啥嘛！参谋说自己丢了一支红蓝铅笔。刘伯承拍拍弥群的头，语重心长地说：“ 人家丢了一支红蓝铅笔就哭起来了，而你丢了一支钢笔都不在乎，这是为啥子呐？因为你从小养尊处优，你东西多，这支钢笔不是你劳动得来的，因此你不心痛。而那位作战参谋从小在家打草喂猪，吃不上一顿饱饭，他认为一支红蓝铅笔来之不易。 ”

阿蒙是解放初期出生在南京。1967 年春天，刘伯承在南京治疗眼疾。在学业荒废的狂热年代里，阿蒙到了南京，来到爸爸妈妈身边。当时刘伯承给他规定两门功课，一是古文，一是书法。刘伯承说：“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 ”他自己每天早上 5 点钟起床，汪荣华就把孩子叫醒，让孩子背书习字。那时，刘伯承虽视力渐退，但记忆力仍十分准确。青少年时期读过的《古文观止》，几乎篇篇能背。每天早饭后，他都要检查阿蒙背书。由于阿蒙不用功，很怕检查，就把检查叫做“ 晨关 ”。每当早饭后，汪荣华总是敦促孩子去他爸爸那儿，阿蒙总要做个鬼脸，对妈妈说一句：“‘ 晨关 ’难过啊！ ”

一天早上，刘伯承指定阿蒙背诵《辨奸论》。可是孩子觉得这篇太难了，怎么也背不顺。于是就想出一个借口跑到林子里去玩，直到吃早饭时才回来，结果那一天“ 晨关 ”是怎么也蒙混不过去的。阿蒙就将事先准备好的托辞，对刘伯承说：“ 《辨奸论》是苏老先生影射王安石的。王安石主张革新、变法，所以不是一篇好文章，我不想背它。 ”说完之后又有些后悔，刘伯承虽然眼力不济，但阿蒙仍然感到爸爸的眼睛一下子就把自己看穿了，他心虚地

看着父亲宽阔的前额，心想不知父亲会怎样批评他。

不料，爸爸并没有揭穿他的心眼，却沉静地对他说：“你从小就想做个勇士，在北极阁山上乱跑，说要打狼。你现在大了，应该懂得勇敢就是不怕困难，勇者不惧嘛！只要你不怕困难，半个小时后，你一定能背下来。”

阿蒙有点“二憨子”脾气，如果有什么事，别人说他不敢干，他就偏要干。听到爸爸鼓励他要勇敢，不怕困难，就回到屋里，专心致志背了半个小时，终于把《辨奸论》背得烂熟。

在生活上，刘帅夫妇总是要求孩子们俭朴，跟普通工农子弟一个样。汪荣华也是很少给阿蒙零用钱，孩子们的衣服，都是汪荣华亲手缝制的，也是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为了买玩具，阿蒙每天都走路上学，节省下来的八分车票钱放到“爆噗”里。“爆噗”就是存钱的小泥罐，刘伯承说四川老家的孩子叫它“爆噗”，平时把零钱存放进去，过年时“噗”地一声把它摔碎，拿出里边的钱去买吃食和玩具。所以阿蒙也把小泥罐叫“爆噗”，新年到了，把它摔碎，阿蒙用这些钱去厂甸买风筝，买山里红做的大佛珠和一只新的“爆噗”，迎接新春的到来。

京城里的元帅之家，依然保持着故土的纯朴。

阿蒙上中学了，可穿的还是姐姐穿过的女式旧军装。有些同学取笑他，叫他“黄皮”，而且是“女黄皮”。他回到家里，跟妈妈嘟着嘴说：“以后我不穿这女式军装了，人家都笑话我。”

汪荣华看着孩子，个子都挺高了，穿的还是女式军装，不由也笑了起来：“是啊，你都大了，等这件衣服破了之后，就不再让你穿女式军装了。”她停了一会儿，想了想又说：“你在生活上要向你爸爸学习，你看他的棉鞋穿了好多年，补了好几次，不是还在穿吗？穿得干净整齐就行了。”

汪荣华讲的这双棉鞋，刘伯承整整穿了 15 年，鞋口坏了剖开换了个元口，再缝上里子，一块钱钉了个鞋底，一直穿着，直到刘帅去世。

汪荣华和刘伯承给子女们还立下这样一条规矩：结婚以后一律搬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去住，不要再和他们住在一起。儿女们都能理解父母的用心，自己结了婚，不应该再沾父母的光。1970 年以来，他们的 6 个子女先后结婚，都是住在本单位，只有节假日才回去看望父母。

长子太行同工人的女儿肖玉兰结婚后，住在工作单位分配给的一间 9 平方米的房子里，厨房、厕所公用。肖玉兰生了个孩子，她的母亲从湖南老家来照顾她，房子实在住不下，领导给他们换了一个 28 平方米的套间，厨房、厕所依然公用。

一天，汪荣华和朱德夫人康克清去看望太行一家。太行在延安保育院时，由康克清照管接送。太行是喊着“康妈妈”长大的。肖玉兰母亲对来看望的两位大姐说：“您看这么挤，没地方坐，没地方站。”汪荣华拉着亲家的手说：“单论住房子，城里甚至不如乡下，现在群众还有三代人同住一间房子的哩！”康克清也笑着说：“这比延安时候好多了。那时候，我把太行从幼儿园领回来，还不是我和朱老总睡床，他就睡在拼起来的椅子上。”

肖玉兰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军队医院工作，每天上下班在路上就得用三个多小时。太行工作单位离家较远，不能天天回来，生活上很不方便。她要求搬到医院住，但是医院解决住房也有困难。肖玉兰见自己提出的要求不管用，想请婆婆出面帮助解决，汪荣华听了后说：“这种事我不能管！”直到前几年工作单位住房有了改善，他们才分了一套营职干部住房。

二女儿弥群结婚时，只在机关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事后，刘伯承提出用一个星期天，全家欢聚，庆贺弥群夫妇新婚。不巧，弥群所在单位正好利用星期天组织义务劳动。她有些为难地把这事告诉父母，刘伯承风趣地说：“家规依从国法，个人服从组织嘛！”

汪荣华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至今还是大别山贫困老区的普通农民，没有因为她的关系得到特殊照顾。他们也曾向大姐提出过一些要求，凡是不符合原则和政策的，汪荣华是一件也不办。有人觉得她“绝情”，她却丝毫不徇私情。

刘帅夫妇的 6 个孩子没有辜负长辈的期望，他们都读完了大学，靠着“自觉、自爱、自强、自立”的独立人格力量，在各自岗位上贡献自己的才智。长子太行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64 届毕业生，始终安心本职，坚持在科研工作岗位上，现任空军指挥学院学术研究部部长。二女儿弥群是空军司令部某业务部门的一名领导干部，以吃苦耐劳，勤于钻研业务著称于同事之中，曾多次立功、受奖，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三女儿解先、四女儿雁翎是医生。五子阿蒙在高级军事机关当参谋，幼子太迟在军事机关工作。

刘伯承夫妇教子有方，博得人们的广泛赞颂，汪荣华被评为北京市“好家长”。

汪荣华对刘帅的关心是战友加妻子的深切关怀和柔情体贴，始终如一，斯世不变。

刘伯承在 1958 年遭到错误批判后，心情不好，身体日渐多病，只有妻子最关心、最理解。

1972 年刘伯承双目失明，伤残破损的身体每况愈下，只有妻子最体贴、最爱护。

1973 年，刘伯承丧失思维能力；特别是 1975 年以后，刘伯承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汪荣华不顾自己年高有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夜相伴，精心护理了整整 13 年！13 年的辛苦与焦虑，使汪荣华额头增添了道道皱纹，满头青丝变成了缕缕白发。

汪荣华，这位刘伯承元帅的学生、战友、妻子，与刘帅共同生活了整整半个世纪。1986 年 10 月 7 日，刘伯承元帅辉煌而艰难地走完了人生征途，她挥泪面对深情无语望着她的丈夫说：“伯承，你走了，永远地走了！我无法躲避开面对着的这个难以补偿的残酷现实。虽然，你没有像以往无数次分别的那样，对我谆谆地说过什么，但我心里明白，你留给我的是什么，更明白，我在送你远行的悲痛之余，应该多做些什么……”

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1934 年 10 月，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的红军和游击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主力红军转移前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项英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由陈毅任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以及项英任司令员的中央军区，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军区、红 24 师和红 10 军等部共 1.6 万人，继续坚持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斗争。

10 月上旬，红 24 师和各军区独立团，首先接替了红一、红三、红八、

红九军团的防务，积极抗击敌人。当红五军团完成阻击任务集结时，独立第13 团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掩护其集结与转移，独立第 3 团接替红五军团抗击国民党军的任务。留在苏区的部队还积极开展游击活动，伪装主力，迷惑敌人，迟滞国民党军前进，并严密封锁消息，实行坚壁清野。这些行动，都有力地掩护了主力红军的集结与转移。

当中央红军各部队，分别从 10 个渡口南渡于都河，向突围前进阵地开进时，留守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在有关地域封锁消息，断绝交通，消灭国民党地方武装“铲共团”，掩护主力红军的行动。10 月 21 日，中央红军开始突围，中央军区命令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率领独立团，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突围。11 月初，国民党粤军在南雄、大庾等地追击中央红军，信丰、南康、安远等地兵力甚少。中央军区遂令赣南军区独立第 6 团、独立第 14 团深入到上述地区开展游击活动，骚扰敌人，钳制粤军，配合主力红军转移。

留守的红军和游击队，还担负了收容伤病员、运送粮食弹药等任务。中央苏区先后收了数万名伤病员，一些轻伤员经过医治痊愈后加入了当地的游击战争，重伤员进行了分散安置。

在此前后，红六军团西征和红 25 军北上后，留在湘赣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与游击队，也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掩护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进犯中央苏区的敌人除薛岳纵队、周浑元纵队追击中央红军外，其余敌军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迅速占领了宁都、汀州、石城、兴国、于都、瑞金、会昌等地。到 11 月下旬，中央苏区的全部县城沦入敌手。

12 月初，陈诚指挥的国民党军 20 余个师 20 余万人，对中央苏区进行划区“清剿”，其余部队则在占领区内构筑堡垒封锁线，组织地主武装，建立保甲制度，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苏区中央分局领导人，未能接受陈毅迅速实行战略转变，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的建议，继续以大兵团作战方式进行阵地防御，使部队受到严重损失。仅 1935 年 1 月的牛岭战斗，红 24 师等部即损失 600 余人。此后，苏区分局、军区机关和红 24 师等被围困在于都东南部的壬风山狭小地区，同所属各地区的联系基本中断。

2 月初，中央苏区形势危殆，中央分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行动问题，一致同意突围转移，但对突围的方向意见不一致。有的主张向西，转至井冈山徐图发展；有的主张背靠于都向南发展。项英于 4 日和 5 日，连电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请求指示方略。

中共中央书记处于 5 日致电项英并中央分局，指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但“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的环境相适合”。还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革军委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英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军委分会讨论，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13 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央分局：部队要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时则集中起来，不利时又分散下去”，“占须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游击队应紧密联系群众，为群众利益斗争，在群众中站稳脚跟，取得给养，要恢复党组织，加强地方武装等。

中共苏区中央分局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将红 24 师等部分散突围到中央苏区及邻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部署是：红 24 师首长率师部和红 70 团，随中央分局、军区机关和项英、陈毅、贺昌等行动；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率红 24 师的红 71 团，向湘南转移；陈潭秋、谭震林率红 24 师 4 个连到闽西，同张鼎丞等部会合，在闽西坚持斗争；李天柱率红 24 师 4 个连，依托寻邬南部游击区向赣粤边发展；毛泽覃率红 24 师 1 个连，到闽赣边开展游击战争；独立第 6 团在中共赣南省委、省军区的领导下，在于都南部开展游击战争；独立第 7 团向闽赣边发展。从 2 月中旬起，红军各部分路突围。突围中，由于敌人的包围已经形成，大部遭到损失，少数部队转移到赣粤边、湘南、闽赣边、闽西地区，会合当地武装，开展游击战争。随部队突围的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何叔衡、阮啸仙、贺昌、毛泽覃、万永诚、李天柱等相继在战斗中牺牲，瞿秋白、刘伯坚被俘入狱，不久就义。

项英、陈毅等于 3 月底到达油山地区，同中共赣粤边特委、军分区会合。由于战斗中，电台被毁坏，同党中央等的电讯联系中断。

在此前后，赣粤边、闽赣边、闽浙赣、闽北、闽东、湘鄂赣、湘赣、鄂豫皖等苏区和游击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后实现了由苏区工作方式到游击区方式，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坚持长期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1935 年春，蒋介石为彻底消灭中央苏区、闽浙赣苏区和其他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先后调集数十万国民党军，会同各省的军阀、地主武装，采取“ 竭泽而渔 ”的手段，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对红军和游击队，实行严密封锁和连续“ 清剿 ”。在军事上，构筑堡垒封锁线，控制交通，扼守渡口，对红军和游击队进行“ 驻剿 ”、“ 堵剿 ”、“ 搜剿 ”和“ 追剿 ”；在政治上，推行保甲制度，在“ 宁愿错杀三千，不能漏掉一个 ”的反动口号下，实行“ 一家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 ”的反革命连坐法，离间人民群众同红军和游击队的联系，利用叛徒从红军和游击队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在经济上，强迫移民并村，实行计口售粮和配给日用品，企图困死饿死红军和游击队，达到抽水捕鱼的反革命目的。

在敌人的严密封锁和包围下，红军和游击队被围困在荒山野岭中，失去了一切正常生活条件，衣、食、住、行都到了极度困难的程度，正如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所描述的那样：“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满身沾野草。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夜难行，淫雨苦兼旬。野营已自无帐篷，大树遮身待晓明。几番梦不成。

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

敌人的暴行和困难，并没有压服和吓倒红军和人民群众，他们以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顽强的战斗，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敌人的军事“ 清剿 ”，恢复和巩固了各游击区，保持了革命的战略支点，保存了革命的骨干。赣粤边游击区，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不仅多次挫败敌人的“ 清剿 ”，巩固了油山、北山等游击根据地，而且还开辟了“ 三南 ”游击根据地。鄂豫皖边红 28 军在高敬亭等领导下，在大别山恢复巩固了鄂东北、皖西根据地，恢复建立了天台山、老君山、大悟山等游击根据地。闽西红军和游击队，在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领导下，恢复建立了龙岩、上杭等游击根据地，开辟了华安、

南靖和大埔新游击区。皖浙赣边红军和游击队在关英等领导下，坚持了赣东北、皖赣、皖南等老区，开辟了鄣公山游击根据地。湘赣边红军和游击队在谭余保等领导下，经过两年多艰苦斗争，恢复和建立了明月山、太平行、铁镜山、九陇山等 10 多块游击根据地。湘鄂赣边红 16 师在傅秋涛等领导下，巩固了以黄金洞为中心的根据地，恢复建立了大围山、药姑大山等游击根据地。浙南挺进师在粟裕、刘英等领导下，建立了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闽北红军独立师在黄道、黄立贵等领导下，以崇安、建阳游击根据地为依托，到外线开展游击活动，开辟了一些新游击区。闽东独立师在叶飞带领下，依托游击根据地，时隐时现，飘忽不定，巧妙地同敌人周旋，巩固与扩大了游击根据地。

南方 8 省 50 个地区（浙南、闽北、闽东、闽南、闽西、闽中、赣东北、赣闽边、粤赣边、湘南、湘赣边、湘鄂赣边、鄂豫皖边、豫南桐柏山、广东琼崖）的红军和游击队，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同人民群众甘苦与共，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不仅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牵制和吸引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长征，而且保持了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使红旗始终不倒，造就了多支英勇善战的部队，为革命培养保存了一批治党、治军和治国的人才，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南方 8 省 14 个地区（不含琼崖）的红军游击队约 1 万人，于同年 10 月开始分别集中于安徽歙县的岩寺，湖北黄安的七里坪等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尔后开赴华中敌后对日伪军作战。